

守 望

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李 斌 主编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内 容 简 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也面对着许多新的挑战。

新华社记者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号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等重大战略部署，选取“钢铁驼队”、中关村发展、传统村落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桥梁发展、水安全等重大问题，行万里路、访百十人，深入采访、精心写作，展现了一个个当代中国人的创业梦、村落保护梦、垃圾分类梦、桥梁强国梦……

本书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在唱响正能量的同时不回避问题，带领广大读者“感知”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守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本书是一部深度调查作品集，更是一部沉思录、一份建议书，适合对当下中国感兴趣的人们阅读。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 李斌主编.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8
ISBN 978-7-121-34798-6

I. ①守… II. ①李… III. ①新闻采访—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1135 号

策划编辑：朱雨萌

责任编辑：朱雨萌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9.25 字数：307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88254750。

| 编委会 |

主 编 李 斌

编 委 刘诗平 王 敏 熊争艳 顾瑞珍 杨步月

「前言」

感知中国 守望未来

李 斌

这是一部作品集，更是一部沉思录。

我和同事曾经想过好几个书名：《用心丈量：新华社记者眼中的发展之“痛”》《那么美，那么痛：触摸中国》……

现在的题目出自 2016 年农历新年后的“雨水”那一天——农历丙申年春节刚过，2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前往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实地调研，看望慰问一线采、编、播人员，向全国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要求、寄予厚望，其中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我们不就是守望者吗？

我们守望的不仅是公平正义，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的书名，便在和出版社编辑的反复交流中达成共识。

本书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在唱响正能量的同时不回避问题，带领广大读者守望和感知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

守望未来，就得守望这片大地。

作为面积只有 488 平方公里的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孕育了 300 多家上市公司，我们历时数月深入这块土地，探究其中蕴藏的创新密码，探究“创新赢未来”的奥秘。

我的同事们深入珠三角地区和东、西部省份，讲述“世界工厂”转身故事，描绘“去留之间的外资新版图”。

从海南到云南，我的同事们发现“中国旅游”遭遇“时间”尴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做出了“中国快步迈向‘旅游社会’”的重大判断，指出“旅游社会呼唤旅游业加速转型”，呼吁以法治刚性保障公民休假权利。

为了留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我们客观地指出了传统村落保护虽然首获中央财政支持，但仍“喜中有忧”，同时聚焦大拆建、假古董、过度化等传统村落保护三大怪相，告诉大家一些地方在保护传统村落上正在纷纷探索、破题，“粉墙黛瓦，将不只是在梦里”。

中国桥梁是否是高铁之后的又一张“中国名片”？我们的记者从南到北，把铁路桥、公路桥、跨海大桥、古桥等看了个遍，分析“中国高铁为何大桥为王”，探讨中国究竟是不是桥梁强国，呼吁“百年大计”要经得起“百年风雨”。

.....

守望的，往往是发展之“痛”。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叩问水危机，透视城市饮水安全三大焦点，呼吁用法治破解“多龙治水”之困。

2015 年，公路货运为每个中国人运货 22 吨，其背后是 3000 万名货车司机，再后面是一亿多人的幸福。我们聚焦货车司机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剖析车轮之上的“苦与痛”，呼吁消除痛点才能打通堵点。

垃圾围城究竟是不是一个可以打开的“结”？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发现“逾1/5的城市尚无规范垃圾处理设施”，指出每个人既是垃圾困局的制造者，也是买单者，透视“垃圾围城”六大焦点，质疑“起步20年垃圾分类缘何踏步不前”。

守望，是有温度的。

我们走进一位位达人，他们中有为民间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村落保护）多年都在呼吁的冯骥才先生，有发出“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感叹的中南大学“痴人教授”胡彬彬，有对水安全问题充满忧思的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有怀揣着垃圾分类梦的潮人“驴屎蛋”……

守望是不容易的，我的同事们往往不远万里，奔波数省的乡村阡陌、城镇厂矿之间，还要“守望”出新的理念、思想和可操作的政策性建议……

无论是发展之“痛”，还是聚焦人物，我们最终守望的是真相，是公平正义，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希望这种守望，能发挥一点点推动作用，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是人们认知的一点点提升、内心深处的一点点触动……

麦田，需要守望者。我们守望的这块“麦田”，就是脚下的这片大地……

翻开这本书，请跟随我们一起感知中国、守望未来吧！

李 斌

2018年5月

李 斌：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抗震救灾模范，新华社“十佳”记者。

策划出版中国首套“四极”考察丛书，独著《二探北极》，合著《你还是你吗？人类基因组报告》，主编《领跑力：企业、城市和国家的引领之道》《极度调查：告诉你一个“立体中国”》等书。

目录

第一篇

经济篇

守望“机遇之地” /002

导言 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 /003

去留之间，外资在华构建“新版图” /004

“世界工厂”正在转身 /011

外资在西部：昔日洼地，今日热土 /016

新兴行业里的外资企业：“不能错失中国机遇” /019

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 /22

守望中关村 /023

导言 “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024

梦想，从这里起飞 /026

创新赢未来：对话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郭洪 /036

晒晒中国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干货” /040

全速启动创新发展“新引擎” /043

草根创新创业大潮：重回激情燃烧的年代 /045

中关村创客扫描：梦想的火花，等待绽放 /052

丨 第二篇 丨

社 会 篇

守望“中国旅游” /058

导言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 /059

中国快步迈向“旅游社会” /060

旅游业思辨录：当中国站在“旅游社会”大门口 /062

“旅游社会”呼唤旅游业加速转型 /067

六大痛点透视：“人在囧途”，谁之痛 /068

酸甜苦辣，80万导游群体心声谁知 /073

对话5A级景区掌门人 /077

高票价为何依然门庭若市 /080

“中国旅游”遭遇“时间”尴尬 /083

以法治刚性保障公民休假权利 /087

放眼世界：旅游业的“他山之石”是什么样的 /088

丨 第三篇 丨

文 化 篇

守望传统村落 /094

导言 留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 /095

首获中央财政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仍“喜中有忧” /097

让民族文化根脉薪火相传	/099
传统村落保护三大怪相：大拆建·假古董·过度化	/100
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难	/103
粉墙黛瓦，将不只是在梦里	/106
住建部回应传统村落保护焦点问题	/110
谁来为古村“买单”	/114
三面残墙的启示	/116
走访古村：那么美，那么痛	/119
万里探访，不只是为了留住一抹乡愁	/121
人生何处不乡愁	/124
留住乡亲，留住乡愁	/128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要防止二次破坏”	/130
“痴人教授”胡彬彬：“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	/133

守望“金名片” /137

导言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	/138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进入“全面保护”新阶段	/140
“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	/142
“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政治账”	/146
496米的传承与创新	/150
让传统技艺的瑰宝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	/153
“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	/156
对话故宫博物院“掌门人”单霁翔	/158

Ⅰ 第四篇 Ⅰ

生态篇

守望水安全 /168

导言 “心腹之患”亟待举国关注 /169

叩问水危机 /171

城市饮水安全三大焦点透视 /177

全国水源地水质逾一成未达标 /182

国家出台规划保护 365 个水质较好湖泊 /184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水安全忧思录 /186

正视水安全“新常态” /189

用法治破解“多龙治水”之困 /191

守望“垃圾围城”现象破解 /193

导言 化解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 /194

逾 1/5 的城市尚无规范垃圾处理设施 /195

垃圾围城忧思录 /197

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也是买单者 /203

“垃圾围城”六大焦点透视 /205

垃圾出城记 /209

潮人“驴屎蛋”的垃圾分类梦 /211

起步 20 年：垃圾分类缘何踏步不前 /214

垃圾分类不能停留在“开始起步” /220

垃圾焚烧“中国式困境”调查 /222

让垃圾焚烧成为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227

电子垃圾，日本的“稀有金属矿” /230

I 第五篇 I

交通篇

守望大国桥梁 /234

导言 中国是桥梁大国或强国吗 /235

桥梁跨度“第一”的背后：中国是桥梁强国吗 /236

“中国造”海外大桥十大“名片” /239

“百年大计”要经得起“百年风雨” /242

中国高铁为何“大桥”为王 /243

10万危桥：公路桥梁进入“建养并举”新时代 /246

城市桥梁：是“地标名片”，还是“病灶梗阻” /250

“孤岛贫困”热盼多修“村桥” /255

古桥现状调查：留住“人间彩虹” /259

守望丝路“钢铁驼队” /266

导言 铁轨上的亚欧大通道 /267

丝路上的“钢铁驼队” /268

中国更多列车驶向欧洲 /276

守望公路“搬运工”的未来 /278

导言 谁“解”3000万全社会“搬运工”之痛 /279

“十二五”发展甩挂运输节约物流成本近300亿元 /281


2015：公路货运为每个中国人运货22吨 /282

公路货运业：如何重塑新生态 /283

车轮之上的“苦与痛” /288

消除痛点才能打通堵点 /293

后记 众声喧哗中，找出症结所在 /294



第一篇

经济篇

守望“机遇之地”

➤ 导言 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

➤ 去留之间，外资在华构建“新版图”

熊争艳 王 希 王优玲 许 晟 王 攀 康 淼 石志勇
杨 迪 周 蕊 刘巍巍 林建杨 王亚光 王秀琼

➤ “世界工厂”正在转身

王 希 熊争艳 叶 前

➤ 外资在西部：昔日洼地 今日热土

杨 迪 熊争艳

➤ 新兴行业里的外资企业：“不能错失中国机遇”

贾远琨

➤ 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

王 攀 王优玲

导言 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

回望改革开放近 40 年，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截至 2015 年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83 万余家。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 1/2 的对外贸易、1/4 的工业产值、1/7 的城镇就业和 1/5 的税收收入。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

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当下，外资之于我国的意义发生什么变化？外资在产业流向和区域分布上有什么特点？

2015 年年底、2016 年年初，新华社记者深入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走访外资企业、工业园区、研究机构和有关主管部门，展开调查，探究“世界工厂”的现状和未来，眺望外资在华的新图景……

去留之间，外资在华构建“新版图”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在华外资动向引人关注：

服务业外资占比连续 5 年超过制造业，成为外资在华“蓝海”。

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释放改革红利，引资高地效应凸显。

中国已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美、日等国对华投资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

对外资而言，中国是否还是机遇之地？在中国经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际，外资扮演的角色有何变化？

新华社记者前往广东、上海、江苏、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采访各级商务主管官员，对话电子、汽车、工程机械、医疗保健、化工、物流等行业的跨国公司负责人，探究研判外资在华的现状和未来。

总体乐观，投资增长，何来“撤离潮”

东莞南城宏图路，原诺基亚的标志性工厂，已在 2015 年春季关停。记者在这里看到，昔日的工厂生活区中，每层楼的宿舍已被打通，改造成办公写字楼——一个能容纳近百家电商企业的产业园已具雏形。

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资将目光转向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地区；美、德等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归，一些企业也在回流。类似诺基亚工厂关闭的消息，一度引发了外资“出逃”的议论和猜想。

“东莞确实有诺基亚工厂等一些外资企业关闭外迁，但并没有形成‘撤离潮’。事实上，低端代工生产企业的关停，淘汰了落后产能，为引进更多优质项目腾出了空间。”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

2015年，东莞共有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只占东莞外企总数的3.3%，是2008年以来外企“倒闭”数量最少的一年。从行业细分看，它们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电子及仪器制造业、塑料制品生产和金属制品企业分别占44.8%、9.9%和8%。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5年东莞新签外资项目440宗，合同利用外资50.6亿美元，增长17.2%。其中，超千万美元项目达93宗，涉及商业、金融、物流、医药及先进制造业。

在我国利用外资第一大省广东，借力自贸区和CEPA（《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2015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增长15.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

在北京，借着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的东风，科技服务等六大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2015年新批准设立外企1068家，吸收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增长10.2%和62.5%。

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引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共设外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4458.1亿元人民币。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区吸收外资占全市一半。

“不到两年，我们在湖北襄阳工厂投资近10亿元人民币，生产两款国产化车型，产能规划达6万台。这只是起步，未来我们有更多投资计划。”时任东风英菲尼迪有限公司总经理戴雷说。

“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把亚太创新中心建在这里，又正筹建全球肺癌研究中心，并在西安高新区兴建全球最大的制药生产基地。”强生中国区主席吴人伟说。

“再过几个月，我们追加10亿美元投资的上海研发中心将投入使用。该中心将与在美国、瑞士的研发中心同步研发。”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说。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跨国公司负责人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与官方数据相互印证。

据商务部统计，2015 年我国吸收外资比上年增长 6.4%，达到 1 262.7 亿美元，规模再创新高；新设外资企业 26 575 家，增长 11.8%。

全球 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资踊跃，其中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等在华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超过 1 亿美元。

外资“版图”发生变化

2015 年 11 月，苏州金鸡湖畔，中国台湾诚品书店在大陆第一家店开业。

这个位于苏州工业园区、面积达 5.6 万平方米的综合体，有书店、文具店、咖啡馆、餐饮、展览馆等。该店与全球 2000 多家出版社合作，带动两岸三地 5 万多种书籍跨海交流，开业 20 天就吸引了百万人次到店。

“对于大陆的阅读与文创产业，我们深具信心。”诚品总经理李介修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创立已 22 年的苏州工业园区，长期以来吸引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时任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韩江说：“2010 年开始，合同外资中服务业超过制造业，2016 年新增外资服务业已超六成。”

包括文化创意、研发设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引资额不断攀升，是我国外资结构发展的新趋势。

自 2011 年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已连续 5 年成为吸引外资的“冠军”行业，2015 年占比达到 61.1%。

中国美国商会 2016 年 1 月发布的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 496 家受访企业中，各行业企业对中国市场增长总体持乐观态度。其中，3/4 的服务行业企业表示乐观。

“服务业外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是我国服务业外资准入放宽使然，另一方面

反映出我国依靠低要素成本与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阶段基本结束，要进入一个质量不断提升的新阶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晓红认为。

在制造业外资总体规模下降的同时，高端制造业占比呈上升态势。2015 年，高端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 9.5%，在制造业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升至 23.8%。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传统制造业外资流入基本为“零”，外资产业链呈现由低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的态势。大量跨国公司加快布局，在华设立研发设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跨国公司总部等。

从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地区各显所长，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引资特征日益彰显。

“总部经济”成为上海名片。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底，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分别达 535 家、312 家。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最多的城市。

“研发中心”多扎根北京、上海、深圳。目前，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超过 2400 家。研发辐射范围由早期的主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拓展到面向亚洲乃至全球，一些研发中心呈现向研发总部升级的趋势。

自贸区集聚高端产业。商务部外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对外开放的制度高地，四大自贸区吸引了一大批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外资。

“新生外企”涌入长江经济带区域。该区域 2015 年新设外资企业 11 974 个，占全国总量的 45%，区域内外资结构逐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

中、西部引资兼顾传统与新型业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全国比重已超 10%，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进展明显。同时，电子、汽车、航空航天、医药制造、现代农业等高端产业和服务外包等新型业态也在中西部地区初具规模。

“促转型”呼唤“优外资”

对于苏州工业园区的引资趋势，韩江举了一个独特的例子：园区内一家著名韩国电子企业连续两年销售收入以每年 40% 削减，但利润却以每年约 10% 增加。其中有何奥秘？

“这家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利润薄的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把研发中心、超薄和触控等高端新产品放在园区。这种做法挺有代表性。”韩江说。

苏州工业园区的这种变化，折射出在华外资战略转型与我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契合。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说，以外部竞争倒逼国内经济改革，通过外资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深度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是新时期我国依然重视外资的主要原因。

为提升外资质量，2016 年，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商务部将在深化外资审批体制改革、拓展自贸实验区制度创新试点领域、出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各领域扩大开放、完善营商环境等方面发力。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众多外资。

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2016 年，其商会会员企业中近八成是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比 10 年前增长约 50%。

东莞商务局 2015 年年底对当地 2500 家外企所做调查显示，2016 年，22.1% 的企业有增资计划，43.9% 的企业计划加大研发投入，60.5% 的企业要开展在中国的内销业务。

市场准入不断扩大，将拓展外资在华发展空间。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

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条件”。

深耕中国 40 余年的工程机械巨擘卡特彼勒，2004 年成为工程机械行业首家在华开展融资租赁的跨国企业，创新性地向客户提供像按揭买房子那样的融资支持。

“我们在中国市场享受过‘改革红利’，相信以后会在中国进一步开放中获得更多机遇。”卡特彼勒全球副总裁兼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其华表示。

一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推进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希望中国继续加强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执法环境、提高侵权行为的成本。”陶氏化学亚太区首席技术官姚维广说。施耐德电气中国区副总裁王洁等跨国公司负责人也希望中国的投资政策更加稳定。

创新，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外资的机遇。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超过 90% 的受访企业认为创新对其企业在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硬币的另一面，挑战依然严峻。

2015 年，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新加坡仍是我国吸收投资的重要来源地，而美、日、英等部分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在下降。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葛顺奇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美、英、德、法是对外投资大国，4 国多年来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四成左右，但这 4 国却是对华投资的小国。

数据显示，这 4 国 2015 年对华投资之和约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 5%。

“中国应加大外商投资体制改革，减少投资准入限制，提高负面清单含金量，吸引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葛顺奇说。

外资来源地更加多元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目标之一。

“以前，人们通常认为，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中国投资才是外资，未来这个理念要转变，外资的来源地会更加多元。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它们会跟中国产生更大经济协同作用。”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说。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此言不虚。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达 84.6 亿美元，已超过美、英、德、法对华投资之和。

谁能预料，“一带一路”这条跨越时空的彩练，未来将给中国开放型经济带来多少机遇？

“世界工厂”正在转身

这里是中国制造业重镇，“世界工厂”的名号蜚声海内外。

这里曾诞生全国第一批“三来一补”工厂，中国经济从此与世界有了割不断的脐带。

能否率先在后金融危机的转型“阵痛”中转身？低成本优势渐失后，外资“撤离潮”是大势所趋还是言过其实？“世界工厂”未来将为世界提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来到广东省东莞市调查。

外资有来有走，实现“量质齐飞”

岁末年初，已近午夜时分，地处广深经济走廊中段的东莞市常平镇上，仍有不少大货车满载货物呼啸而过。

这是一座靠制造业起家的城市。

2015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迈入了“6000亿元俱乐部”，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并非只是一句玩笑。

“世界工厂”招牌的背后，占东莞对外贸易额和工业增加值六成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企一样，他们正承受着当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种种压力。唯一的不同是，这种“不适”感或许来得更早一些。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我们走访企业时就发现订单下滑，因此预判外贸可

能会遇到困难，而当时内陆地区出口普遍还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当地政府商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在对对外经贸领域具有这种“风向标”作用，东莞外资企业的风吹草动总能引发外界聚焦，“倒闭潮”“撤资潮”等报道也屡屡见诸报端。

对此，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说，东莞有外资企业倒闭外迁是事实，尤其是诺基亚东莞工厂、联胜电子等个别大型工厂关停结业格外受到关注。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来看，都属于正常范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搬迁潮”。

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2015 年东莞共有 362 家外企关停外迁，其中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此前三年，东莞关停外迁外资企业数分别为 569 家、454 家、434 家。

事实上，“倒闭”的最高峰值出现在 2008 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东莞 857 家外企关停外迁。之后，关停企业数量逐年递减。

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会发现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有“生”有“死”实属正常。1979—2008 年，东莞累计吸引外资企业 2.7 万余家，2008 年实有约 1.2 万家。这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前，平均每年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自然消亡 500 家左右，占总量的 4%~5%。

“东莞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慢慢积累形成的。这里产业链成熟，上下游配合默契，而东南亚除了人工成本低一些外，在产业的成熟度和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无法挑战东莞。”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

外资仍在不停地涌入东莞。2015 年，东莞实际吸收外资 53.2 亿美元，增长 17.5%。其中，外资在科研技术行业投资增长 135%，在金融行业的投资增幅高达 696%，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成为“吸金大户”。

东莞百利达健康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草彊和彦，是当地日商协会的副会长。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年东莞日资企业有来的也有离开的，但总体并没有突出变化。

尽管成本上升让很多企业有了压力，但聚集的上下游企业、较低的物流成本、细化的分工服务等因素，牢牢地吸引着一大批外资企业，他们选择了留在东莞。

草彊和彦本人就有亲身经历。为了开拓亚洲市场，他所在的企业两年前曾考虑

再建设一个工厂。草彡本人率队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考察了一圈后，公司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决定将东莞工厂产能每年扩大 10%。

“这些国家虽然土地和人工便宜，但产业配套都比不上东莞。比如在越南，我们这样的健康器材，找不到合适的包装材料，而在东莞，这种厂家很多，价格便宜，质量也能满足各种要求。”一个小小的包装盒，道出了东莞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所在。

转型大势所趋，创新破解困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东莞是低端制造业的乐园。“玩具之都”“家具之都”“鞋业制造中心”……这些标签所代表的，是过去 30 多年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相结合后，取得的骄人成绩。

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减，东莞早期在“孔雀东南飞”背景下形成的劳动力“洼地”效应逐渐丧失。目前在东莞，企业需要为一线普工每人每月支付 3000~4000 元的成本，相当于缅甸、越南等地的 2~3 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的外资企业倒下或离开，同时更多更强的企业不断成长，迎来一轮新的生命周期。

龙昌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落户东莞的“三来一补”外资企业。走进龙昌位于东莞常平镇的注塑车间，一台台机器手正在紧张地工作，它们一刻不停地打开注塑机舱门，将刚刚成型还发烫的塑料玩具部件拣出来送上传送带，同时将边角料投入收集筒等待再次利用。

“1 台机器手就可以替代 1 个分拣工人，不仅精确度高、稳定性强，还避免了分拣过程中的烫伤事故。”企业项目经理张利民介绍说，近年来市场的变化逼着企业“机器换人”，2015 年年底企业自动化率达到 40%左右。

除了依靠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外，这家全球知名的玩具制造商还与国内大专院校合作成立智能技术研究院，进军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高端科技领域，奋力向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颠覆了人们对制造企业机器轰鸣、粉尘滚滚的刻板印象。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也给东莞与全球前沿科技结合带来了机遇。

在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年来汇集了一批中外创新型科技企业，将工业机器人作为发展方向的李群自动化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夏天，由李群自动化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机器人月饼包装线投产。8台李群机器人组合而成的包装线可以实现分拣、装盒、封箱等多项工艺，每小时上千盒的产能，全程只需4人监管，在节省人力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包装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据李群自动化总经理石金博介绍，目前已经有食品企业闻讯而来，要求订购这样的包装线。

从手机、电脑到数控机床，从汽车零部件到机器人、智能设备，东莞制造业出现了对包括外资在内的低端产能的挤出效应，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劳动密集和技术、资金密集型并重，加工制造业层级逐步提升。

竞争日趋激烈，提升自身“磁力”

“从长期发展看，企业向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搬迁是个发展规律。我们当下需要做的是，提高在东莞的运营效率。”已在东莞耕耘20多年的利威鞋业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查克·吉里思说。

利威的母公司美国布朗鞋业拥有百年制鞋历史，是全球最大的鞋业贸易公司之一。近年来，东莞在其全球布局中的角色不断变化，最初主要集中在制造环节，现在则成为布朗鞋业在全球最重要的设计研发中心。

“我们几年前关闭了在台湾地区的办公室，意大利设计部只剩20多人，东莞公司则不断扩容，现在的600多名员工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如此，吉里思还是坦言，过去几十年，企业从美国迁到中国台湾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也越来越贵，不排除以后会外迁到东南亚。

东莞人自己对未来引资比较优势的变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方见波说，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甚至组团到东莞来“招商”，印度等国更有更充足的劳动力，越南将受惠于区域自贸协定红利，而且这些新兴国家都在仿照中国成功的范例引进外资。从内部看，除了成本上升吞噬利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东莞毗邻港澳的位置优势也在弱化。

不过，在硬币的另一面，东莞多年来积累的庞大制造能力，以及产业配套齐全、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格局优化等条件，依然对外资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在时任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看来，更重要的是，东莞培养了熟悉国际市场、国际规则的人才队伍，不断传承着老一辈敢为天下先的“精气神”。

因此，即便在引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东莞市近年来引资“提速提质”，呈现出优质大项目多、现有企业增资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局面，2016 年还吸引了总部经济、服务业等多宗规模超亿美元的大项目。

统计显示，外资企业在东莞增资扩产总额从 2008 年的 17 亿美元提升至 2015 年的 42.9 亿美元，平均增资项目规模增长了 2.9 倍。由此可见，企业扎根东莞发展的意愿依然强烈。

徐建华表示，外资过去在东莞经济起飞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利用外资仍是东莞加快融入国际产业链、提升产业层次的重要路径。

在东莞采访期间，外企里涌现的“高精尖”研发机构令记者印象深刻。“十二五”期间，东莞外企新设立研发机构 943 个，新增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 1379 个。

还有一些行业翘楚，专注研发创新，极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有专家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隐形冠军”的不懈努力，东莞现代产业才能葆有竞争力。

“东莞的转型升级主要是产业的转型升级。”徐建华说，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东莞将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实施“东莞制造 2025”战略，抢占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

外资在西部：昔日洼地 今日热土

据四川省商务厅统计，截至 2015 年年底，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299 家来到四川，即全球商业巨擘近六成已在这里投资。

“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驻四川，表明曾经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等障碍日渐消除，投资这里的价值将不断凸显。”普华永道成都分公司合伙人徐闻分析。

谁能想到，1985 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 8 个年头，全国已有 6000 余家外商投资企业，四川才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饲料企业。

外资在四川 30 多年的变迁，正是外资“掘金”中国西部进程的缩影。

中国的开放始于东部沿海，对于来华投资的外商而言，中国西部的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偏居一隅、交通落后而一度“养在深闺人不识”。

2000 年 10 月，中国宣布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在西部举办的首个国际性会议“中国西部论坛”吸引了 100 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参加，其中近 40 家外企由总裁、副总裁亲自赴会。外资大举“西进”由此开始。

曾经，西部凭借资源和成本优势激发了外商投资设厂的热情；现在，尽管成本优势正在缩小，但西部拥有 3.6 亿人口市场，产业链日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短板”逐渐补齐，加上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有待释放的巨大红利，它的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

近两年，多个重磅级、平台级的外资项目在广袤的西部落地。

在西安，总投资达 75 亿美元的三星高端闪存芯片项目在 2014 年 5 月投产，2015 年总产值已突破百亿元。

在重庆，微软公司与当地签署合作协议，围绕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共建微软重庆互联网研发产业基地，进行互联网产品的研发、应用、推广及互联网企业的培育、孵化。

在新疆，德国巴斯夫公司启动了总面积达 1700 亩的可生物降解农用地膜试验项目，用于推动当地的棉花、玉米、甜菜等作物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投资了两个化工项目。

在贵州，美国高通公司已把在当地建设大数据产业所需的服务器芯片的制造基地提上议事日程……

巨头落户，随之产生“连锁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一并发展。

重庆是绝好的案例。在 2009 年引进惠普 2000 万台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和富士康产业基地两大项目后，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直辖市，短短几年时间已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形成了 5 家品牌企业、6 家代工企业和 800 多家配套企业构成的产业集群。现在，全球每 3 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 1 台产自重庆。

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日渐兴起，已带动越来越多跨国企业进入西部。

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制造（3M）公司在华投资，过去主要布局在东部，2015 年却先后在成都、西安设立中国区西部技术中心和西北研发中心。

“西部先进制造业逐渐成熟是公司加快拓展西部的重要动力，未来还将加强西部的资源布局。” 3M 中国西区总经理林隆盛坦言。

除制造业外，服务业成为西部吸引外资的又一重点。

世界最大独立医疗器械企业美敦力已选择成都作为一项新技术的全球首个生产基地，并设立子公司进行市场拓展。该公司研发了一种可携带式肾透析设备，可以将肾透析治疗引入社区，解决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终末期肾病患者面临的治疗难、治疗贵等问题。

“这款产品将率先投放在印度和中国市场，成都是这两大市场的‘支点’，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也因为这里有需求人群和科技、医疗、产业政策等匹配的社会资源。” 美敦力大中华区传播和政府事务高级总监吴伟农说。

有分析认为，如果说上一轮对外开放中，外商来华投资主要看中“世界工厂”的成本优势，如今他们正在瞄准中国推进城镇化释放的巨大消费能量。发展不足的西部，在城乡居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有着更为迫切的消费升级需求，“世界商店”磁力强大。

徐闻认为，随着西部城市更加宜商、宜居，外资企业梯次向西部转移的势头不会改变。

当前，西部地区正迎来吸引外资的最佳时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处在开放大通道上的西部地区，一跃从开放“末梢”变成向西、向南开放的“门户”。

渝新欧、蓉欧、长安号等中欧、中亚班列，凭借空运 1/6 的价格、海运 1/3 的时间，正在成为货物贸易的最佳选择；“过境 72 小时免签”相继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实施，令西部与世界的商务、文化交流更加紧密；西部首个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开工在即，将于“十三五”期间投入使用……过去，交通与区位的制约是西部开放引资的最大掣肘；如今，这块“短板”正在补齐。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的发展空间拓展到更深入的地区和空间，“向西开放”迎来黄金时期，中国西部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兴行业里的外资企业：“不能错失中国机遇”

3D 打印、跨境物流、机器人制造……这些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产业，外资企业是热情的参与者。它们为什么来？看好中国什么？又给中国带来什么？新华社记者走进 3 家新兴行业里的外企，一探究竟。

比利时 3D 打印公司：“中国智造”带来广阔市场

“中国制造业升级给 3D 打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广阔市场。”上海玛瑞斯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琴恩说。

诞生于西方的 3D 打印技术，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我国医疗、航空航天、汽车、设计等领域。拥有 26 年历史、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玛瑞斯公司敏锐地嗅到这一商机，并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 3D 打印公司之一。

2014 年 5 月，玛瑞斯先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6 个月后，又成立其中国首家分公司。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200 多种产品的产量排在全球第一。‘中国智造’对品质的要求很高，激发了企业对 3D 打印技术的兴趣。”琴恩说。

玛瑞斯进入中国市场后，主要服务于医学及工业领域。目前，已经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儿童医院等合作成立研究中心，有数十家合作伙伴。

对于 3D 打印企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是生命线。玛瑞斯曾经非常担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令我意外的是，政府部门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这打消了我们的顾虑。”琴恩说。

玛瑞斯与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合作，联合打击盗版；向合作伙伴推荐正版软件，

使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迅速走上正常轨道。

“面对新技术，欧洲政府要花很长时间论证、评估，还可能因为风险太大而放弃，而中国则是边做边修正，效率很高。我对发展前景充满期待。”琴恩说。

中央财经大学跨国公司课题组副教授李煜伟表示，3D 打印是满足复杂零部件的制造，3D 打印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结合已成为当今制造业的发展趋势。3D 打印能改善生产工艺，有助于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

全球快递巨擘：既深耕大都市，也布局中国二、三线城市

“尽管近年中国进出口数据出现一些起伏，但中国市场仍有旺盛的跨国运输需求，我们的这一基本判断没有改变。”联邦快递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陈嘉良说。

虽然一些低端制造业在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但在华运营 30 余年的联邦快递仍将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亚洲枢纽，并增加在中国的投入，不仅在上海、广州建立快件运转中心，还布局二、三线城市。

联邦快递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全球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的积极性较高，有 62% 的企业认为他们未来 5 年内会开展跨境业务。而在出口市场选择上，除传统的欧美市场，还有印度等新兴市场。

陈嘉良说：“中国当前处于转型期，尽管传统进出口产品有所减少，但电子产品等对时间和安全要求高的产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

不久前的“双十一”，联邦快递十分忙碌。“双十一”是中国境内的购物狂欢，随着代购、海淘等购物方式的兴起，跨境消费的比重逐渐提高。从选购物品种类上看，国外消费者更青睐中国的电子产品，而中国消费者更青睐国外的奢侈品。

“中国倡导转型升级，意味着将更加重视高端科技产品 and 设计研发，空运和特种运输的需求会增加，对于从事高端快递业务的联邦快递而言，这是巨大的机会。”陈嘉良说。

李煜伟表示，随着我国放宽外资服务业的准入门槛，越来越多外资进入服务业。像联邦快递等外企加快在中国布局，说明中国运输服务业潜力巨大。

德国机器人制造商：机器人最大应用市场的机遇不可错失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近年迎来“井喷”。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全球机器人四大巨头之一的库卡公司看准时机，于 2012 年在上海开设除德国外的首家海外工厂。

记者来到这家现代化的工厂，2 万平方米的厂房宽敞明亮，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业机器人、控制台，主要用于汽车焊接及组建等工序。该工厂年生产能力达 5000 台，占库卡全球生产总量的 1/3。

“过去我们的客户，一个厂用几台、几十台机器人，现在一个订单都是几百台。机器人的用量、适用范围都在扩大。我们的客户不仅有宝马、奔驰等全球知名车企，也有中国本土企业。”库卡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孔兵说。

专家分析，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尤其是企业和市场对于产品质量稳定的需求的提高，中国的机器人市场会越来越大。

孔兵说，机器人是个充满希望的行业，中国国内也有很多机器人企业发展迅猛。未来，建设自动化物流、无人车间等是机器人应用的趋势，市场前景光明。库卡要加强在中国实施本土化战略，并将以中国为立足点，辐射亚洲。

李煜伟说，机器人其实并不神秘，就是自动化。目前，长三角地区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外资机器人制造商进入这里，可带动技术进步。另外，由于机器人行业还没有统一标准，外资尽快进入这个行业，意在抢占建立行业标准的先机。

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

外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外资须“登高望远”，加快顶层设计，切实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助推经济腾飞。

登高，意味着要站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高度，对外资的选择目标性更强。目前，外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 1/2 的对外贸易、1/4 的工业产值、1/7 的城镇就业和 1/5 的税收收入。尽管外资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来者不拒”的时代已然远去，“超国民待遇”也成为历史。因为面临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不能再依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而是亟待从技术进步和创新研发中汲取增长新动力。利用外资势必要与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同步走。事实上，这样的变化已经初见端倪：当前，服务业外资占比已经连续 5 年超过制造业，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等传统基础产业中，新增外资基本为零。

望远，意味着应从实现中国经济长远持续发展的角度，不断深化改革，营造良好氛围，让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这就需要革除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弊端，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为高质量的外资提供了更大力度和更具灵活性的支持政策，如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并逐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等，正是此中要义。

当然，打造利用外资的“升级版”，在保护外资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充分发挥政府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勇于向冲击法律底线的垄断行为“开刀”。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2015 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再创新高，新设外资企业呈增长态势。事实证明，中国依然是吸引外商的投资热土。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快顶层设计，顺势而为，把握机遇，切实让外资助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守望中关村

导言 “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 梦想，从这里起飞

张宿堂 陈新洲 李 斌 肖春飞 张 舵 李峥巍 余晓洁

▮ 创新赢未来：对话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郭洪

陈新洲 张 舵 李峥巍

▮ 晒晒中国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干货”

李峥巍 高 亢

▮ 全速启动创新发展“新引擎”

余晓洁 李峥巍

▮ 草根创新创业大潮：重回激情燃烧的年代

陈新洲 肖春飞 李峥巍

▮ 中关村创客扫描：梦想的火花，等待绽放

高 亢 李峥巍

导言 “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走向“强起来”时代的最关键一招。

因为没有创新这一驱动力、第一动力，一个国家就不会真正有未来。

中国近代为何陷入落后挨打的惨痛境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技落后、创新停滞。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加快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步伐，力争在一些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一些区域成为创新型城市或创新型区域。

这里面，中关村，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解剖意义。

作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迄今已经孕育了 300 多家上市公司的中关村，究竟有着怎样的创新密码？给人以怎样的启示？带着一系列问题，2014 年年末至 2015 年一季度，我们历时数月深入调研，解剖“中关村样本”。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到 90 年代的一区五园，到 2009 年正式成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再到一区十六园，中关村示范区已覆盖北京 16 个区县，并初步形成了由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新型孵化器及创客组织、创业文化六大核心要素，以及市场、法治、政策环境有机组成的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这样说。

一个“村”，折射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这个“村”，就是人才驱动、创新驱动的中关村……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村”——中关村，它的精神将给这个国度注入更多活力。

梦想，从这里起飞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无数怀揣创业梦想的人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寻觅生存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要素……

“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2013 年国庆前，习近平总书记一连用 3 个“不能”，再次吹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号角。

政府与市场——市场力量推动科技创新的样本

启示一：在中关村，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携手同行”，越来越多的资源要素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圈，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为什么在美国硅谷没有一个管委会，政府似乎也没有做规划，却产生了高科技产业的集聚？背后推手是什么？本质原因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很早便引起时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郭洪的好奇，也成为中关村一直探索追问的话题。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雷毅有几次跟中关村管委会相关领导去外地考察对接项目，对此深有感触：“不管跟哪个领导出去，企业名单在主桌上，领导的名字在副桌上。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关村，企业是主体。”

中关村鼓励创新，管委会是什么角色？

中关村给出的答案是：中关村管委会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行政审批权，也没有独立财政，只能是创新创业的服务者。同时，政府必须冲在一线、给出支撑，弥补市场机制不足，让市场资源有的放矢。

“一笔天使投资可以拯救一个团队，也可以创造一个产业。”科技创新小企业、

新想法急需天使投资持续供血。然而，现实情况是投资机构往往惧怕承担风险，国内天使生态并不成熟。中关村登高一呼，提出创设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市场化手段与投资机构共担风险，调动投资人热情。

以“天使投资”为例，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关村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与14家天使投资机构合作，设立14只基金，总规模达13亿元。其中，中关村引导资金承诺出资1.3亿元，政策资金被放大近10倍。

把政府的资源与市场的资源集成打包，给创新者提供一站式、自助式的服务——中关村还成立了中关村发展集团这个资源平台。

“只有政产学研用互动变多，科技创新才会带来效益。”时任中关村发展集团董事长于军说，集团在政府、市场、创新主体、科研院所等各方之间协同服务，放大政策支撑、撬动资本市场的力量，给创新企业带来更多支持。

企业成为中关村自主创新的绝对主体，也成为享有中关村创新服务的主体。

“创业回到中关村，政府部门会问‘我们能帮你什么？’”从硅谷回国创业的何搏飞感慨地说，类似“How can I help you?”这样的说法在国外一般都是服务员、银行柜员用的，隐含的主语是“你”，说话者把自己的身份放得很低，足见中关村在服务创新主体上的意识转变。

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点亮更多创新创业梦。

2014年6月12日，曾经专营图书的海淀图书城步行街正式改造成中关村创业大街，联想之星、天使汇等知名创业服务机构入驻。每天，这里都有若干场创业活动：对创业者而言，一天内既可与创业明星互动，也能参与创业沙龙，更能从项目路演中汲取养分。

当时负责街区运营的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秦君说，将核心区传统零售地标变身创新创业地标，这是中关村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的点睛之笔。

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到90年代的一区五园，到2009年正式成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再到一区十六园，中关村示范区已覆盖北京16个区县，并初步形成了由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新型孵化器及创客组织、创业文化六大核心要素，以及市场、法治、政策环境有机组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成的中关村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90 后’创业者、领军企业骨干创业者、连续创业者、海外创业者成为中关村 4 支创业大军。”郭洪说。

2015 年 2 月 4 日，中关村发布了“创业中国引领工程”，推动大众创业。

创业者超过 20 万人，以创新型孵化器为代表的“众创空间”超过 500 家……到 2020 年，这里将成为全球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高科技创业者实现梦想的首选地。

“我们干的事情，就是把一切阻碍创新的桎梏解除，推翻‘五指山’、松开‘紧箍咒’。”郭洪说，对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充满信心。

信念与突破——创新自信的样本

启示二：“要创新！要创业！要实现梦想！”在这里，能够看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自信。

什么是创新？行走在世纪之交的中关村，人们会指给你看，创新曾经是那条闻名遐迩的“电子产品一条街”。然而，今天的中关村人会给你更多答案：创新是小米手机、“万能芯片”和新型肿瘤标志物热休克蛋白 90α……是一群敢于突破的狂人，是一种不轻言败的信念。

从“跟随他人步伐”，到“自主创新研发”，中关村对创新的理解逐步加深，这和她一路上培育传承的创新自信密不可分。

中关村的自信来源于人才汇聚，来源于“土壤肥沃”，也来源于精神传承。这一切构成了中关村所独有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2014 年售出 6112 万台手机，含税收入 743 亿元……创业以来，小米科技实现了从行业追赶者到全行业追赶对象的转变，平均每 11 名员工实现 1 亿元收入。

“从现在起，我们向前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行业新的历史！”2015 年年初，小米创始人雷军在致员工的信中鼓励大家“去到别人梦想都未曾抵达的地方！”

梦想，来源于最初的创始团队：5 个“海龟”，3 个“土鳖”，平均年龄 43 岁——拥有微软、谷歌任职经历的林斌，曾在摩托罗拉担当研发重任的周光平，曾负责谷

歌地图 3D 街景等项目的洪锋……行业顶尖人才汇聚中关村，铸就了小米的“超豪华”阵容。

在郭洪看来，小米的快速成长恰巧是中关村创新生态系统的最佳例证。“中关村有诸多创业领军企业，形成了创业系，如百度系、联想系、腾讯系、华为系。这些领军企业不断催生新的创业者，也不断给创业者提供市场，在创业生态中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和小米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产业内“最好的人”早已汇集中关村。

“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对此深有体会。“今日头条依托的推荐引擎技术并不普遍，国内精通的不足百人，北京中关村占了绝大多数，其他城市很难找到。”在尖端人才的助力下，“今日头条”创业两年多，累计用户超过 2.4 亿，每日活跃用户超过 2000 万。

创新自信也有赖于中关村创新创业精神的“薪火相传”。

从陈春先、柳传志，到张朝阳、李彦宏、王志东、徐小平，再到张一鸣、许单单，无论商业成功还是失败，创业成为中关村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2008 年，以创业培训为使命的“联想之星”问世。柳传志形容此为“用联想总结的实践经验，告诉你如何做企业家，或者是否适合做企业家。”如今，“联想之星”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创业培训、天使投资平台。

“联想之星就是通过天使投资和培训孵化，帮助这些规模很小的极早期创新型企业定战略、找资源、找人才。”联想之星孵化器投资部副总经理周自强说。

在中关村，联想的做法并非个例。“中关村创新创业基因是代代相传的，在这没人愿意‘老老实实’的，有机会就想去创业。看看微软、百度已经培育出多少人才就知道了。”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长夏颖奇说。

这群“不老实”的创业者还包括像徐小平、雷军这样的“明星天使”，他们“现身说法”，帮助判断、评估甚至投入年轻人的创新梦，形成了充满“正能量”的创新创业明星导师机制。

“中关村创新创业的未来属于 80 后、90 后，他们在人生的最佳时期、创新创业的黄金年代，中关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搭起平台、做好服务。”秦君说。

专注于穿戴式设备、虚拟现实领域的蚁视科技的覃政；致力于打造“图像识别的新一代引擎”的旷视科技创始人印奇……不久前，《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榜单中，在北京的创业者占13位。

这是《福布斯》中文版与美国版连续第4年一起寻找并发现各自国家最优秀的年轻创业者……

人才汇聚、鼓励创新、包容失败、文化传承，越来越多的创新思维正在中关村萌芽，越来越多的“瞪羚”正从中关村起步，越来越多“拿得出、叫得响”的品牌正与中关村紧紧相连。而中关村则收获着她独有的创新自信。

传统与竞争——中国商道的样本

启示三：跨越传统与现代、融合梦想与情怀的创新创业梦，铸就了中关村的创新商道样本，更折射着几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科技报国、实业报国的雄心。

1984年，已经40岁的柳传志决定“下海”。当时，柳家7口人一度蜗居在一间12平方米、类似自行车棚的房子里。逢年过节，柳传志都起大早去菜市场外排队，一开门就往里冲，为的是在凭票定量供给的食品之外多买一只鸡。

生活的窘迫让人突破自我，而国家产业的落后激发爱国热情。

在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上，柳传志曾动情地说：“每每听到国际上有人说中国只会简单的制造，我就很是不平；而当听到有人说，‘中国用堆积如山的衬衣换别人一架飞机，还得了便宜。’我就更是血往上涌。”

过去30年，柳传志将始于中国科学院大院一间小平房里的小公司，变成全球最大个人计算机（PC）制造商。人们无法不感叹：时势造英雄。

柳传志创业十年后的中关村，1993年，当王志东创办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时候，谁能想到这将开启中国互联网时代。

“全球华人，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背景如何，但大家谈起中国饮食，谈起金庸小说，谈起中华历史，就有说不完的话，我希望有一个中国的网站，成为全球华人的网络家园。”

有了这个梦想，王志东当年数次赴美，不仅带回 650 万美元的投资，更明确了公司要向互联网发展的方向。1998 年，四通利方完成与美国华渊公司的合并，新浪网诞生。

“老爸，那时候，你汽车不大会开，英文也讲不好，怎么就让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投资？”游走在繁华的“中国硅谷”，仰望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儿女时常这样发问。王志东笑而不语，心中却充满了不断实现梦想的幸福感。

改变自己、改变中国、改变世界，这是梦想的魅力。

如果把梦想比作光束，那么俞敏洪将自己的梦想照进了别人的现实，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虽然过程曲折离奇，但他仍然锲而不舍。

“雄鹰靠着翅膀可以飞到金字塔顶端，蜗牛一定会掉下来，再爬，再掉下来，继续爬，终有一天会看到与雄鹰同样的世界。而我，就是那只一直不停爬着的蜗牛，别人 5 年做好，我花 10 年干成。”

从柳传志到王志东、俞敏洪，知识精英的人生轨迹已经和 30 年前完全不同，路径越来越多元，但内心报国的热情同样炙热。

2009 年，已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邓兴旺做出回国创业的决定时，包括妻子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不解。如今，从生物学教授到企业家，邓兴旺在知天命的年纪，完成了人生的新挑战。

“中国种业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非常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中国的生物育种技术水平提升上去。就算不赚钱，也要坚持。我是农民出身，如果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对不起他们。”这位从湘西小山村里走出来的科学家说。

当创业报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共识，用有限资源实现无限梦想的过程，便成为这个时代最美的风景。

中关村培育创新，也培养出一种“守规则、重道德、讲诚信、善公益”的企业文化、商道样本。

利亚德的总部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并不起眼的厂房中，这个由旧的衬衫厂改造而来的写字楼却成了全球 LED 领域的重要创新之源。

在过去的几年中，利亚德为国庆 60 周年庆典、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APEC 北京会议，以及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德国议会、美国丰田中心等重要仪式、场所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利亚德”为世界所认识。

“‘利亚德’是个洋名吗？”记者问。

“不是洋名，纯粹的中国商道，意思是‘利益亚于品德’。”利亚德董事长李军回答说，要立足竞争异常激烈的 LED 产业，不仅需要加强自主技术创新，还要看重企业道德带来的“国际认同”和“品牌尊重”。

“做一个企业，不光看你是否赚钱，还要看市场对你的认可、用户对你的评价和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自豪感。”李军的坚持获得了认可，如今利亚德已在全球 5 地设立了控股公司，年订单超 5 亿元。

从 1988 年财务软件研发做起，王文京创办了亚太地区最大的管理软件提供企业“用友”。王文京和“用友”成功的关键，公司名字就是生动的阐释，“做用户之友”。

把客户当作挚友，对客户信守承诺，助推“用友”赶搭技术革新的每一次浪潮。目前，“用友”已拥有全球 200 多万家用户。

越来越多的中关村科技企业开始意识到诚信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意义。

在新东方位于中关村核心区的总部大楼内，俞敏洪依旧一身体闲装扮。他习惯说，改革开放让自己成了富豪，可他要做个有良知的心灵富豪。为此，俞敏洪一直寻找着商业运营和理想情怀的“平衡点”。

无论是李军对“利益亚于道德”的坚守，或是王文京要成为用户挚友的心声，抑或是俞敏洪想做个“有良知的心灵富豪”的理想，中关村创业人给现代商业竞争文化加上了人文注脚，续写着创新企业文化的道德样本。

中国与世界：中国梦的样本

启示四：面对科技创新发展新趋势，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中国不能在这场科技创新的大赛场上落伍，必须迎

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

中关村不是“硅谷”，但却跑到了世界科技前沿，成为与“硅谷”比肩的科技创新“新一极”。这其中广纳贤士、延揽人才的政策“梧桐”效果突出。

坐落在北京北郊一处僻静园区内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几乎会让每个访客惊叹：该所成立5年内被《科学》《细胞》《自然》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刊登的论文已达19篇。

在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中关村核心区内，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为伴的各类科研院所校有200多家，联想、百度等高科技公司1万多家。这样的密集度，全球少有。

距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不到十公里，就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2013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走出红墙，就是来这里学习，引起海内外关注。

国际科技革命正催生产业格局发生大变革，科技创新令各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关村创新创业者们对此感受强烈。

专门投资原创发明和知识产权的北京智谷公司总裁林鹏说，海外高科技公司新一轮的创新布局正在向我们大军压境。如高通公司，每年投入几十亿美金研发通信技术，同时通过专利许可收回60亿~70亿美金，形成研发—技术垄断—专利收费的良性循环模式。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正在催生一批创新驱动的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勾勒出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蓝图。

漫步在中央领导参观学习过的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从全球最大的LED显示屏，到3D打印的飞机关键零部件；从大型尖端医疗设备，到每平方厘米管壁上分布有80亿~90亿个小孔的污水渗透膜……上千项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产品是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实力代表。

在展示中心的一角，停放着大基医疗公司的最新医疗设备。“我们这台最新研发的PET-CT机有两项专利填补国际空白，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产品已经销售到美国费城癌症中心等国际著名医院。”大基医疗公司董事长孙启银说。

中关村的创新创业速度引发海外关切。《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记者特

德·格林沃尔德写道，全球有许多城市都试图复制硅谷，吸引众多的科技创业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只有一个已经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北京。

“海归”正在纷纷归来——在美国错失“教授梦”的沈月雷，索性利用个人所长创办了一家专门研发生产基因敲除小鼠的公司。一直以美国为重心的沈月雷，为了降低成本，将部分环节搬回了国内，结果大大超乎他的预料。

“除了学校和科研单位，没想到 2010 年以后回来的海外人才比 2010 年前十年回来的都多，其中不少在生物医学领域工作，形成了国内巨大的市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今，沈月雷的公司在中国越做越大，已把总部从美国搬到了北京。

中关村已经有像沈月雷一样的海归创业者 2 万人，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也被吸引而来。例如，网秦公司先后把三星 Galaxy 之父奥马尔·汗和原索尼创意设计中心负责人尼可拉斯·努列招至麾下；前谷歌高管雨果·巴拉则加盟小米公司。

全球知名的科技投资管理公司以色列英菲尼迪集团董事总经理胡斌说，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中国节奏。我们在全球管理 15 支基金，有 13 支设在中国，连我们的老总都把家从以色列搬到了北京。

如今，中关村延揽国际人才、吸纳全球智慧的步伐正加速向前。一大批企业开启了海外建设研究院、研发中心的进程，让全球智慧汇聚中关村。百度在硅谷成立实验室，吸引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吴恩达加盟；格灵深瞳在硅谷等地设立联络研发机构……

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中关村正在从追随者、同行者转变为领跑者，创新创业的中国梦正在跨越肤色和国界。

每到春天，中关村湿地依旧会吸引不少大雁、黑天鹅、白鹭等珍稀鸟类前来栖息。

它们为何选择了这里？答案是：“是因为这里符合它们的生态需要，是它们的栖息地。”

中关村又是谁的栖息地呢？是那些为了中国自主创新、怀揣着创业梦想的人的“栖息地”！

这片“栖息地”正在扩大：2014年12月，国家决定将“中关村试点政策”推广复制，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015年2月5日，全国第一个以科技园区上市公司为样本编制的股票指数系列——中关村A股综合指数和中关村50指数正式发布，旨在发现价值、打造中国创新型经济晴雨表。

缔造了联想、百度、小米等优秀企业的中关村，仍在不断追梦、筑梦、圆梦……

创新赢未来：对话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郭洪

中关村，这个看起来与传统村落相去甚远的“科技村”“创新村”，正通过创业助澜新一轮创新潮的到来。2014年，在时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郭洪看来，下一波浪潮中关村要做的不是拥抱，而是要触摸浪尖、引领潮流。近期，新华社记者就此与郭洪进行了一次对话。

“这一点与硅谷很像”

记者：中关村常被比作“中国硅谷”，在您看来，中关村与美国硅谷最相似的是什么？

郭洪：中关村不仅是科技创新中心，更是最具吸引力的科技创业中心。创新要通过创业来实现，这一点与硅谷很像。

硅谷是大家公认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可它并不是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最多的地方。其实，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技术、发明创造，很多也不是在硅谷率先出现的，但硅谷40%的从业人员来自全球，全世界人带去了创业的梦想，通过创业活动，带去了全球的思想、资源，吸附全球的技术。

我们一直在讲科技要和经济紧密结合，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事实上，这背后最重要的是创业活动。中关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创新创业的中心，通过创业来带动实现创新。

中关村有个“21 岁现象”

记者：许多年轻人选在中关村创业，当中不乏在校创业者、毕业创业者，中关村为何能吸引年轻人在此创业？年轻人敢于创业又有何意义？

郭洪：先说两个“现象”。中关村有个“21 岁现象”，不少学生大三时就开始创业，他们是互联网的一代，创造力强，思维方式和国际接轨，做事不墨守成规，因为年轻也不惧失败，这些人当中很可能会产生中国的乔布斯。例如，赵柏闻 16 岁就开始世界前沿基因技术的研发，现在他 21 岁，在中关村创办了“量化健康”。中关村还有一个“知春路现象”，在这条街上从东到西每一个写字楼都挤满了新的创业企业。天使投资人和创业投资机构在这条街上挨门挨户地搜索有没有好的项目可以投资。可以说中关村的这些现象是全国独有的。

年轻人创业的意义恰如一位美国专栏作家所说，“美国应该惧怕中国什么？是下一代年轻人的创业。”如今，当你走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经常会碰到同时举办的七八场创业活动，创业氛围非常活跃，参会创业者绝大多数都是 90 后，很多 90 后创业的领军人物也都在中关村。

不断有“种子”

记者：中关村要如何继续领跑全国？中关村持续创新的关键是什么？

郭洪：我们来看一组数据：联想从诞生到实现 100 亿元的销售收入用了 20 年；百度用了不到 12 年；小米公司才用了不到 3 年。这说明中关村创新环境在显著改善，创新效率也在不断提高。这种提升，与中关村持续打造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分不开。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是领军企业这一要素，它在不断地催生和培育新的创业企业，形成创业系，如百度系、联想系、华为系；它也不断地给创业者提供市场，所以在创业生态中它们是有机的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认为，中关村创业生态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自我进化功能。比如我了解到，某公司在中关村设立了最顶级的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的人才流失率

为 10%，这对这个公司来说是件值得忧虑的事，但对于中关村的创新创业来说并不算坏事，因为很多流失出来的人才成了中关村新的创业者；再如摩托罗拉移动遭遇困境后，他们在中国的研发团队成员许多都去了小米。雷军认为，小米能迅速成为中国智能手机的领军企业，与来自摩托罗拉、微软、谷歌、金山等企业的人才分不开。中关村的生态系统，是以创业为核心的，可以不断有“种子”，不断“生根发芽”，这也是中关村持续创新的关键所在。

中关村引领未来

记者：全国 1/3 的创投发生在中关村，这对创新创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关村聚集这么多的“天使”“孵化器”？

郭洪：“1/3”是什么概念呢？拿硅谷比较一下，它每年获得的创业投资占全美的比重也是 1/3。美国是一个创新型国家，硅谷是全球创新中心，这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创业投资投的是未来，创业投资活跃，意味着正在赢得未来。

天使投资人就好比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腐殖层。中关村现在活跃的天使投资人有 2000 多位。他们很多都从创业者成长为企业家，再从企业家转型做天使投资人，帮助创业者从概念到公司。

中关村还产生了一个新的业态叫创业服务业，以车库咖啡、创新工场、微软云加速器、36 氪、1898 咖啡馆为代表的创新型孵化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创新型孵化器不比房屋面积大小、租金收入多少，比的是创业服务的水平和创业服务收入多少，比的是所孵化的企业是否站在制高点引领未来，比的是你能不能看到未来 3~5 年的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比的是未来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比的是这些。所以，我们的同志在写中关村介绍时，说中关村拥抱未来，我说不对，应该是中关村引领未来。

“不仅是北京的，更是全国的”

记者：在您看来，中关村是北京的中关村，还是中国的中关村？它对全国各地

创新来说有什么意义？

郭洪：中关村不仅是北京的，更是全国的。2013 年，中关村企业技术合同成交额 2484.1 亿元，占全国的 1/3，80%转移到京外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中关村领军企业在京外设立的分支机构有 9200 多家；中关村也与全国 61 个地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也提出一个观点，如果三地之间的合作还是与其他区域一样，转移几个项目，落地几个项目，或者简单地共建一个园区，恐怕是想窄了、想低了；更重要的是联合共同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实现“长板理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这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非常关键的方面。

晒晒中国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干货”

北京中关村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有人说中关村是电子产品“集散地”，有人讲中关村是小企业的“快车道”，还有人把中关村比作中国未来十年的“瞭望塔”……

中关村究竟有哪些创新人、创新事、创新企业？它又有何魅力吸引全球创新人才汇聚？新华社记者带你发现“村里”的“干货”。

政策“松绑”的探索之旅

1988年，中关村前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设立。中关村从那时起展开了鼓励创新政策“先行先试”的探索。

为科技成果处置权“松绑”。

“800万元以下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处置，部分转让收益留给科研单位。”这一政策解决了高校科研成果不能随意处置的局限，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股权激励，让创业者有其股。

“示范区内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可以无偿授予激励对象一定份额的股权或一定数量的股份。”政策解决了只有成果无力产业化的难题。

统一监管“新三板”，小企业的快车道。

中关村探索依托证券公司代办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系统，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新三板”探索获得企业好评。政策让科技企业触摸资本、动

力充足。

鼓励草根创业的生态系统。

简化的注册审批手续、创新型孵化器汇聚、天使创投引导资金等系列举措奠定了中关村“创业高地”的地位。中关村创业大街、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科技金融一条街，连同中关村软件城构成了“中国硅谷”鼓励创新的黄金聚集区。

科技企业与科研成果“高地”

40 余所高校、206 家各级科研院所……区域内丰富的智力资源、创新资源让中关村创新活力迸发。

“联想”——中关村创业传奇。1984 年成立；1996 年国内销量第一；2004 年将“IBM”的部分业务收入麾下；2014 年将摩托罗拉纳入版图；今日坐稳全球 PC 市场第一宝座。

“小米”——中关村式成长速度。小米用 4 年时间跃居全球仅次于三星、苹果的智能机厂商，系统用户超 7000 万；2014 年小米销售了 6112 万台手机，含税收入 743 亿元。

“微博”——中国移动互联启蒙产品。140 个字掀起全国“刷屏风暴”。2009 年中关村创业企业新浪推出“微博”，全国用户达 5.36 亿。微博成为中国网民上网主要活动之一，也吹响了移动互联的前哨。

“京东”——神一样的速度。作为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中关村创业企业京东在物流、产品等领域持续发力，受到好评。自 2004 年以来，连续多年维持高速增长，并成功叩响海外资本市场大门。

“百度”——布局硅谷的中国“引擎”。百度这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平台，将自身定义为一家“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技术型公司”，在美国硅谷成立了深度学习研究院，国际顶尖专家吴恩达参与研发。

中关村还拥有大量高质量科研突破、科技成果，走在我国乃至世界前沿。

清华大学首次发现全新肿瘤标志物。2013 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热休克蛋白 90 α 是一个全新的肿瘤标志物。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纳米能源研究可实现一举一动皆发电。国家首批“顶尖千人计划”入选者王中林院士在纳米摩擦发电机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实现摩擦、拍打皆可发电。此技术可获得包括海洋水能发电的“蓝色能源”，获得国际学界认可。

细胞凋亡与新型实验性肿瘤治疗药物。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潜心研究人体细胞凋亡，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研发出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实验性肿瘤治疗药物，成果受到全球科研领域的瞩目。

创新人才“强磁场”

创新驱动的根本在于人才驱动。中关村汇聚了大量科学研究领域的顶尖人才，也吸引了全球科技产业创新前沿人才，形成了创新人才强磁场。

施一公，2014年3月，施一公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颁发的2014年爱明诺夫奖，因其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他成为爱明诺夫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的第46位得主，同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邓兴旺，他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教授，蜚声国际。但他放弃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回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在中关村无名兴旺担任首席科学家，促进中国农业生物进步。

近年来，一颗颗产业新星、行业明星也漂洋过海扎根中关村。

雨果·巴拉是美国谷歌公司Android产品副总裁，在把安卓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平台后，他选择来到中关村创业企业小米科技担任副总裁，负责国际业务拓展。他对媒体说，小米是个很独特的公司，自己很享受在这里的日子。

奥马尔·汗，前三星移动首席产品和技术官，他加入了中国网秦移动，消息震撼产业界。素有三星“Galaxy之父”之称的他将如何与中关村创业公司一同创新，外界充满期待。

赵勇，曾就职美国谷歌公司，提出Google Glass谷歌眼镜概念并将其变为现实，他回到中关村创办30多人团队的技术密集型企业格灵深瞳，锁定人工智能的下个千亿级市场，获得比尔·盖茨及大型美国跨国公司的认同。

全速启动创新发展“新引擎”

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从曾经的“电子一条街”到如今的“创业大街”，中关村处处充满创新的活力，成为“创客”们筑梦、追梦、圆梦的家园，更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范例。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中关村用 30 年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示了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急需“新引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人才，这就需要点燃人们的梦想，释放人才的活力。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的要求，把“科技成果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受益可提高至 50%”“开展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推动转制科研院所引入社会资本”等激励机制落到实处，必将极大地释放人们的创新热情，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是体制机制。中关村所走过的道路表明，发力做好服务型政府用权的“减法”，为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人才、融资等生态环境，才能换取创新创业的“乘法”。《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反垄断执法，打破地方保护，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定和做法，改革产业准入制度，制定和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等，按照这些要求，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才能形成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以良性的市场竞争培育起激励创新的良好环境。

草根创新创业大潮：重回激情燃烧的年代

代表中关村的，是柳传志、李彦宏、雷军等“大佬”吗？

是，但不仅仅是。

代表中关村的，还有正在创新创业的大学保安、住在洗浴城大厅的研发者、辍学创业的大学生、开发盲人专用智能手机软件的盲人……

走进中关村，仿佛突然时光回转，穿越到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都揣着梦想、自信、勇气，书写着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一个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故事，今天仍在中关村真实上演。

“中国硅谷”的创业众生相

2014 年 9 月，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荇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他就从这条短信开始，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沈孟民，曾在安徽靠卖二手挖掘机挖到人生“第一桶金”，购了车、买了房；也曾到深圳想在低价手机上大展拳脚，但却屡屡碰壁，几近赔光；2012 年，他来到北京中关村，想要研发基于安卓的固定电话。为此，他白天泡在车库咖啡，晚上泡在一家洗浴城，一住就是一年多。

“他当时只有卖车剩下的几万块钱，每天很晚才从咖啡店离开，然后我就问他住哪啊，他告诉我，住在洗浴城大厅，他说办个会员卡折合一天 30 块钱，还包自助夜宵、早点。”苏荇说。

“住了一年多一点，那些服务员就以为我真的是个老板，进去他们还喊‘沈老

板回来了’。”沈孟民回忆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懂技术的沈孟民从零开始“猛补”产品技术，几个月就成了产品技术经理，期间多次“试错”调整，最终创办了“机友圈——工程机械行业圈”，将移动互联网和挖掘机结合起来。沈孟民的创业故事也翻开新的一页。他给苏荇发短信说：“我成功了，获得了 100 万元的投资……”

几经波折，哪怕是睡在洗浴城大厅一年多，哪怕是一败再败，也没能浇灭“创客”们的创业梦。而在北京中关村，这样的“梦”还有很多……

“保悦益听”，是一款盲人用的智能手机软件，通过手势功能进行屏幕操作和菜单选择，并对所有的操作和菜单选项进行语音提醒。通过这款软件，盲人朋友可以无障碍地使用智能手机，顺畅地与外界沟通。

曹军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从小就双目失明，还曾经以按摩为生。曹军在妻子的帮助下学会了上网，但他想要做到的更多，希望能像正常人一样发短信、聊 QQ。

开发软件不是曹军的强项，他找到了当时在大公司做技术研发的朋友冀东。冀东开始对此并不感兴趣。曹军说：“你现在的工作能让多少人记住你？如果你来我这工作，开发一套帮助盲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软件，你将会改变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会被每一个盲人记住。”

“曹军的 QQ 好友列表有近一千人，我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盲人在网络空间是有生活的，我如果通过智能手机让他们沟通得更加顺畅，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冀东回忆说。

先让盲人朋友使用智能手机，再让盲人朋友使用 QQ，曹军与冀东开始了一次的尝试与探索。

研发并不顺利，几番辗转，曹军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写信给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表明了自己急于合作研发针对盲人群体的 QQ 的愿望。

邮件发出后没多久，马化腾派程序员与冀东进行技术对接，经过沟通和努力，用了半年时间研发出了专供盲人朋友使用的 QQ 系统。随后，通过百度的支持解决了语音输入的难题。他们又与百度地图、UC 浏览器、墨迹天气、虫洞语音等相继签约达成合作。

冀东主持开发的盲人地图，让盲人通过公共交通将自主上下班成为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连接器将盲人群体和社会群体资源连接起来，让更多盲人朋友更好地生活、工作，更加全面地融入社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回顾这段创业路，曹军说，中国的盲人大约有 1100 多万，现在已有 5 万多盲人朋友使用我的产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每个盲人朋友都能免费使用这款软件，让盲人朋友无障碍、顺畅地与外界沟通。

中关村有个“21 岁现象”。21 岁正好是大三学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又有融入社会的想法，就开始积极参与创业的实践活动——他们的选择为今日中国写下了最好的注脚，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浪潮已经到来。

当“创新创业”成为价值选择

“在中关村，一个牌子掉下来砸到 10 个人身上，以前有 9 个是大学生，现在有 9 个是创业者。”说这话的是 Golsense 和 Wifipix 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闫文闻。5 年前，闫文闻从外地来中关村创业，先后做了帮助矫正高尔夫打球姿势的穿戴设备、室内定位等项目。

在中关村，创新创业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价值选择。

已经发展壮大、扬名全球的企业虚心倾听新的想法，持续转型、再次创业；获得高成长的企业敏锐洞察风向，努力深耕、持续创新；哪怕是初创团队，“创新创业”也成了每天叫醒他们睁开双眼的第一声闹铃……

来自安徽省临泉县的张超峰在北京大学做保安，因为发现了城市大龄未婚青年的交友需求，他创办了一个相亲网站“亲啊亲”。

别人叫他“张总”，他会说：“我做这个网站不是为了做老总，我是为了帮助大家找对象。”

张超峰说，自己 30 多岁才结婚，也曾有一些婚恋网站寻找女朋友，但整体感觉体验不好。他认为：“在这个婚恋网站上面我感觉我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感觉别人可以随便看我的资料把我给 Pass（淘汰）掉，但是我是普通会员，我看不到别人的资料，我觉得不公平。”于是他立志要做个“公平的”婚恋交友网站。

为此，张超峰投入很大，几乎是他当时全部家当。“我总共花了三万多块钱，相当于我一年多的工资！”张超峰说，“我相信创业的理想，就是一颗种子，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它埋进土里，做起来，炫出自己。”

“我觉得他都没想过准备的事儿，或者说他在花自己的血汗钱进行创业的准备过程。”苏荇评价说，正是这股拼劲、这种动力，才构成了创业的基础。

说到创新创业，中关村创业的第一代“旗手”——联想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感到了压力。他认为，移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所有的行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波浪潮的冲击，这个创业浪潮中，“跟不上就会被甩了”。

联想在创新，小米在创新……在创新创业大潮中，压力无处不在，机遇也无所不在。

林兴陆算是互联网创业中的传奇人物了，他初一辍学、用 26 个英文字母学会编程、写软件、当网管，他是 DoNews 这个中国最大 IT 写作社区的发起人……

在互联网圈子里打拼了 20 多年的林兴陆有很多创业赚钱的机会，很多次有设计游戏的朋友找他一起创业，他认为赚钱很重要，但是要选对方向，林兴陆的女儿“替”他做出了选择。

人生角色的转变往往会让人多一个看世界的视角，初为人父的林兴陆认为儿童教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女儿两岁的一天，我兴致大发，给她做了一些识字卡片，女儿玩得很高兴，也高兴地认识了一些汉字，看着女儿开心的笑脸，想到了父亲的责任，一时间我觉得儿童教育是一个可以追寻的方向。”林兴陆回忆起是女儿的笑脸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方向。2011 年，做儿童教育软件的想法在林兴陆的头脑中发芽。

林兴陆做了第一款产品“儿童动物世界”，一上线便很快有了 30 多万的下载量。在用户的肯定下，2012 年 1 月林兴陆辞职创业。

林兴陆的团队可以做技术支持，但是在内容支持方面需要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他发现，与其辛苦谈内容合作，不如专注做工具或平台。2012 年 6 月，“儿童音像馆”上线，“当用户下载量达到一定量时，会产生一定的品牌效益，再与内容提供商谈合作，会容易很多。”林兴陆想明白了，只有自己变强大了，才有资格

与他人谈判。

在发展过程中，林兴陆也不断在丰富、调整规划，儿童音像馆的后续发展将实现线上线下一起互动，在 App 产品基础上设计实体玩具，形成品牌优势。

做让孩子喜欢、家长放心的产品，而不是让孩子沉迷、家长头疼的游戏。年少时的林兴陆坚定地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今天为了宝贝女儿，为了中国更多的儿童，他选择了有意义的事业创业。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运营方、清控科创原董事长秦君看来，以往说到创新人们会想到科研创新，现在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可以说是以创新衡量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创新理念早已深入渗透中关村的各个企业和每个创业者。

当创新创业深入人心，中关村创业大企业、持续创业者与年轻“创客”也形成了独特的互动效应，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创业氛围。

时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郭洪说，中关村总是产生时代性的公司，比如联想、新浪、搜狐、小米、京东，这些领军企业在不断催生和培育新的创业企业。

“因此，有的大型科技公司说人才流失率有 10%，很苦恼，但中关村却感到很高兴，因为诞生了大量创业者。”郭洪说。

迎接创业浪潮 中国需要更多“中关村”

上海张江、深圳前海、杭州滨江、武汉东湖……各地纷纷吹响创新创业号角，一场别开生面的创业竞速赛正在全国拉开。

种种迹象表明，作为我国自主创新的“试验田”，北京中关村在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强音中，还将继续领跑。

从 1988 年中关村前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算起，中关村走过了近 30 年的创新创业路。它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前哨战、科技体制创新的试验田，也是中国创新思维的大本营。

然而，一开始中关村的创新路并不顺遂。它遇到了体制难题，如科技成果该如何处置、科研队伍怎么创业；它也遇到了市场难题，如科技小微企业轻资产配

置面临“融资难”；它还碰到了观念难题，“创业就是不务正业”的偏见成了致命打击。

面对这一切，中关村的出路只有一条——创新。创新机制以打通阻力，创新科研以促成实力，创新思维以保障动力。其中，思维创新尤其重要。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关村新思维、新思想实际上是在改变中国。

思维的改变，为中国科技创新带来新的可能。在这方面，中关村创业者最有发言权。新思维赋予柳传志和联想以力量，先后将 IBM 的部分业务，以及摩托罗拉收入麾下；新想法赋予雷军和小米以成长，创业 4 年跻身全球第三，年销售突破 700 亿元。

在中关村，创业也不再是“不务正业”，而是变成寻找“风口”的新探险，让创业者充满动力。赵勇与格灵深瞳，在中关村等待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的下个千亿“风口”；亿赞普的罗峰用“海选网”开启跨境电商的新市场，主动创造下个“风口”。

今天，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必然驱动力。而作为肩扛“先行先试”重任的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的“敢于打破陈规”“永远跑在前头”的接力棒需要传递，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自主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个 10 年。

必趣网的团队算是在中关村创业团队里最年轻的。

创始人张果，1991 年出生，2011 年，大二的张果不满足于在学校里的小买卖，要学习更多东西，要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拳脚，于是辍学来到了北京中关村。

张果选择了在车库咖啡开始创业路。

有个细节很有趣，张果喜欢第一个踏进车库咖啡的感觉，享受车库赠送给早到的创业者的免费咖啡。

为此他要很早起床，乘地铁一路到海淀图书城，那时候恐怕区域的写字楼还没“睡醒”。他感觉，早点到车库咖啡会给自己心理某种积极暗示，“嗯，今天没

来晚，加油！”

他怕迟到，喜欢赶早，为的不仅是车库咖啡为鼓励早到的人而赠送的咖啡，更是为了争分夺秒追赶创业快车；这似乎恰如他如此急切地辍学，只为更专心地追赶创业的那艘舰船。

在各种研究、调查之后，张果确定从必趣网开始创业。必趣网的定位是专注于评论的个性化微视频推荐平台，口号是“必评论，趣分享”。“我做的是一个微电影的聚合平台，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用户可以看到好看的微电影，公司、导演可以更好地知道观众的喜好。”

打开必趣网网站，点击想看的微视频，在观看的同时可以看到网友们的评论：“我们注重的是分享，分享开心，也分享思考。”

中国需要更多的中关村，它的创业精神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创业，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优势所在。”一位外国记者结束中关村的采访后感慨道。而在郭洪看来，创新必然是创业的产物。未来的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创业企业带来的创新活力。

中国需要更多的中关村，它鼓励创新、包容失败文化的氛围将为创新带来更多可能。“中关村现在的文化越来越千奇百怪，人们对原创想法越来越具容忍度。”王德禄评价，这是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所必须具备的要素。

中国需要更多的中关村，它的创新路径、创新道路必将引领国际技术趋势。从前国人讲创新，凡事必提欧美；如今我们话创新，北京中关村已经具有与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同等的重要性。

过去的30年，与其说中关村在摸索中前行，不如说它在为大众创业时代的到来播撒创新创业的种子，提前谱写草根创业的新乐章；而未来的数十年，中国将创新创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更多的“中关村们”与创业者们将收获果实，奏响乐章。

中关村创客扫描：梦想的火花，等待绽放

“今天我是来中关村取经的，也是来‘踢馆’的，欢迎大家以后有机会来武汉光谷创业！”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这是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地带的车库咖啡里普通的一天。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一定会留下印象深刻，贴满了各种招聘和创新成果照片的信息墙，柜子上摆满了奇形怪状的东西和一台 3D 打印机。跟往日一样，有十几个创业团队在这里“喝咖啡”办公。正午时分，又到了每天惯例的路演时间，话筒里一个清脆的声音把陶醉在繁忙工作气氛中的年轻人唤醒，讲话的人叫梁春。

梁春曾是一名创业者，来自位于武汉东湖的一家创业孵化器。创业成功的他如今在武汉光谷做创新投资，中关村的创新氛围和生态圈令他着迷，这是他每年都要来很多次的地方，他说：“中关村的创新生态圈日新月异，我每次来这里都有崭新的体会和感受。”

把创新的种子带回家，让“创新驱动”的鲜花开满全国，有梁春这样想法的人，如今有很多。记者在中关村调研数月发现，无论是季节的交替变化，还是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中关村这片热土上，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总是那么火热。

这里是起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梦想从这里出发；创新没有终点，只有划向梦想彼岸的无数风帆。

起点的召唤：50 岁开始创业

邓兴旺，他从山沟里走来，考上北大，只身赴美求学并获得巨大科研成就，获得过世界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 Kuhmo 奖，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

50岁那年，他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摘下世界著名生物学家的光环，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创业。

“我是农民的儿子，应该把我所学的真正为我们的农民服务，为我国的农业做出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几年前，他回到湖南老家探亲，发现故乡的农民对现代农业缺乏基本常识，而且在现有技术水平上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已接近极限，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这是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中国对高科技、规模化种业的迫切需求，而这正是他的强项——他的前半生都在学习、研究基因育种。

作为学者的他，尝试过以学者的身份参与国内研究所的工作，但他很快发现，很难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于是决定“下海”。

他曾考察过国内几个地方，最终还是选择在中关村落户创业，回到了北大——他的起点。

“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以来，非常重视科研创新，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里创业的决心和动力。”邓兴旺说。

从学者转型商人，他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公司创业之初。“刚开始创业时，我连如何注册公司、股份设置，甚至去哪里租办公场地都是两眼一抹黑。”邓兴旺说，中关村管委会非常贴心地给予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如帮助解决办公地点，“手把手”指导如何注册公司、财税如何申办等。“很多环节我们还没有想到，有些问题还没有出现，他们就已经打电话提醒我们了。”

如今，邓兴旺创办的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有限公司，聘请了袁隆平院士担任高级顾问，还吸引了2位“千人计划”学者、3位海归高级工程人才和4位中关村高端领军研发者，成为行业内顶尖的新兴科技公司，研发出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为提升我国核心育种技术、保障粮食食品安全作出了贡献。

“在我心中，中关村不仅是一个物理地点，更像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一个家庭，它帮助有梦想的人在这里扎根发芽，让梦想茁壮成长，在这里得到自我升华。”邓兴旺说。

我和宠物有个约定

与邓兴旺这样 50 岁才半路出家的创业者相比，记者在中关村遇到更多的是来自祖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今天，大家热议最多的话题莫过于互联网。数据显示，在中关村 95% 以上创业者项目都与互联网有关联。

“我要做宠物界的‘春雨医生’。”高茂翔就是走在从传统行业接入互联网创业前列的一位年轻人。

1987 年出生的他，来自江苏徐州，年纪不大，经历不少。初次见面的人，会被他俊朗、老成的外在所吸引。

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他曾经经营过漫画社，组织各种社会活动，赚点外快。他还曾计划留学，但中关村的创业氛围让他停住了出国的脚步。

素来喜爱宠物的高茂翔，养了 2 只小狗。某次一只狗莫名生病，他在网上搜寻宠物医院，才发现国内几乎很难找到正规的宠物医院，而且网上搜寻不到相关的医院链接和靠谱的宠物健康问诊信息。

这触发了他的灵感，看到了宠物市场的巨大潜力，马上借钱和一位同样喜欢宠物的发小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做陌生行业我们吃了不少苦。”由于房租较贵，宠物医院的地址最终落在北京北五环外，各种执照、招聘等都是从零开始。

思路敏捷的他，很快就捕捉到在实体医院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属性，将大有所为。北大是他的母校，他疯了似的扎根中关村，向专家请教方向，与投资人谈判找融资。

“中关村以往给国人的感觉是个电脑集散地，如今早已不是这样了。许多卖电脑的店铺都改成了创业孵化器。”他作为第 36 支创业团队，入驻北大孵化器。短短半年时间，团队已经成型，并已联络 23 家知名宠物医院合作。

2015 年 5 月，他的宠物问诊平台 App 即将面世，其功能不光包含宠物医疗问

诊和医院评价，还植入宠物百科、社交等崭新功能。

“在这里，大街小巷到处是谈论着创新、创业的年轻人，创投几乎遍布每栋大厦。人才汇聚和丰富资金如此集中，是我选择在这里创业和公司发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他说。

我在地下室等着你

时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告诉记者，中关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知春路现象”，在这条街上创业者扎堆。因为天使投资人和创业投资机构会在这条街上搜寻好项目、选择投资对象。

第一次见到宋法亮，是在知春路旁边小巷里的一家饭馆。饭店虽小，却远近闻名，生意很好，因为这里有机器人“服务员”。

这位 83 年出生的山东小伙，每天和他的团队就在这家小饭馆里试验着他的机器人，这两台机器人可以给顾客端茶递水、送菜送饭，萌萌的样子深受顾客喜欢，尤其是孩子们。

自 18 岁上大学那年开始，宋法亮就没“闲”过，一直在创业。大一他做了家广告公司，带领 48 个人发了半年广告和传单；大二在校园里做外贸生意；大三他又打起公交车、出租车座椅广告的主意……

“虽然我尝试过很多种创业，但能做出令大家满意的家庭服务机器人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他说。

偶然的时机，宋法亮得到来北京工作的机会。在工作中，他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刚到中关村，这里创新和创业的氛围让我意识到之前都是小打小闹，这里才是真正的造梦工厂。”


宋法亮和 5 个小伙伴组成了蓝巨人机器人公司，将他之前创业所得的几十万元全部投入，在中关村开始了为梦想而打拼的再创业。

知春路的房租不便宜，他在一栋居民楼里租了个地下室，有 10 平方米左右。

昏暗的地下室里摆着两台已淘汰的机器人原型，桌上、地上散列着各种电机、

零件。“这里夏天很凉爽，冬天就有点冷了。最主要的是便宜，而且不会噪声扰民。”他笑着告诉记者，有时忙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就直接吃住在地下室。

“有好几个投资人都来过这儿，但再没有回来过。”宋法亮并不沮丧，在他看来创新好比无尽的寂寞长跑，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时间去沉淀和得到认可。宋法亮相信，在中关村只要努力，他的机器人就有机会登上世界舞台，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梦想的火花将一直闪烁在这间小小地下室里，等待绽放那一天。”



第二篇

社会篇

守望“中国旅游”

✎ 导言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

✎ 中国快步迈向“旅游社会”

王 蔚 王 敏 周慧敏

✎ 旅游业思辨录：当中国站在“旅游社会”大门口

王 敏 王 蔚 张紫赟 鲁 畅 潘 强 周慧敏 赵丹丹 罗 鑫 庞明广

✎ “旅游社会”呼唤旅游业加速转型

罗 鑫 王 敏

✎ 六大痛点透视：“人在囧途”，谁之痛

周慧敏 王 敏 潘 强 王 蔚 鲁 畅 张紫赟 赵丹丹 罗 鑫 庞明广

✎ 酸甜苦辣，80 万导游群体心声谁知

鲁 畅 潘 强 庞明广

✎ 对话 5A 级景区掌门人

潘 强 赵丹丹 鲁 畅

✎ 高票价为何依然门庭若市

潘 强 鲁 畅 周慧敏

✎ “中国旅游”遭遇“时间”尴尬

张紫赟 罗 鑫 王 敏 赵丹丹 周慧敏 王 蔚 潘 强 鲁 畅 庞明广

✎ 以法治刚性保障公民休假权利

张紫赟 潘 强

✎ 放眼世界：旅游业的“他山之石”是什么样的

鲁 畅 赵丹丹 潘 强

导言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旅游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旅游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研究旅游业发展，出台相关文件；许多地方将旅游业列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旅游业？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方位？

“人在囧途”，中国旅游业有着怎样的发展痛点？

一些地方的旅游产品，高票价为何依然门庭若市？

酸甜苦辣，80万导游群体的心声谁知道？

假期究竟是“宅”在家里，还是外出旅游？

弹性休假的路线图，该从哪开始？

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法律、政策措施，才能加快“旅游社会”的到来？

带着一系列问题，专题小分队深入北京、海南、云南、广西、安徽、湖北、吉林等多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寻找答案。

中国快步迈向“旅游社会”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旅游业已经从奢侈消费发展为百姓常态化生活选项。新华社记者赴全国多地调研发现，我国正快步迈向“旅游社会”。

对“旅游社会”，业界学界给了4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一是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二是个人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三是居民旅游需求旺盛，旅游成为大众化、常态化生活方式；四是旅游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全社会都是旅游环境，需要按照“大旅游”来管理。

根据国际旅游规律，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就会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楼嘉军认为，我国正处在从必需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过渡的重要阶段，旅游活动既是享受需求，也是发展需求。

我国从1995年5月1日起实行5天工作制，全年双休日有104天。1999年起实施黄金周假期，此后经过调整确立法定节假日11天，数量居于全球中等偏上水平。此外，还有根据工龄设置的带薪休假制度。专家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公共假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国际上看，衡量一个国家旅游消费普及率的重要指标是国民出游率，中等发达国家居民平均每年出游超过3次，发达国家居民平均每年出游8次以上。2015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突破40亿人次，人均出游率达2.98次。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从国民年人均出游率看，旅游已成为我国百姓常态化的生活选项。游客从过去关注景点，逐渐转向慢游体验城乡生活，与城乡居民共享常态化生活空间。

据统计，目前 96% 的国内旅游、65% 的出境游是散客自助游。专家认为，我国旅游业已基本实现了休闲化、大众化和社会化，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和基本权利。

旅游正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旅游扶贫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力量，“十二五”以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 1000 万贫困人口脱贫，占全国贫困人口的 10%；通过旅游外交，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and 关注。

旅游业作为综合性产业，产业链条长、产品形态多，对餐饮、住宿、交通、零售、文化、金融、电信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拉动作用。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 1 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 4.3 元。

来自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2015 年旅游业对全国 GDP 的直接贡献为 3.32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4.88%；综合贡献为 7.34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10.8%。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 7911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10.2%。

曾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现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的李金早提出，我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全域旅游是把一个区域整体作为功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建设，实现景点内外一体化，做到人人是旅游形象，处处是旅游环境，是空间全景化的系统旅游。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旅游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不少问题，全社会对“旅游社会”的认识和管理还远远跟不上。

“不少旅游热门城市外来游客数量超过当地居民人数数倍。旅游将倒逼社会和城市管理的变革。”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石培华认为，面对“旅游社会”的到来，城市容量要考虑旅游形成的大客流，交通、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要进行综合规划和管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戴学锋认为，急需改革创新旅游业和城市管理模式、机制，建立与旅游发展相协调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机制；加强旅游综合执法，形成旅游、交通、公安、工商、质检、环保、卫生、文化等部门联动的治理体系，也显得尤为迫切。

旅游业思辨录：当中国站在“旅游社会”大门口

2016 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 3.02 亿人次，占全国人口比重近 1/4。

2015 年超过 40 亿人次国内旅游，相当于全国人均出游 3 次。

旅游业对全国 GDP 的综合贡献占 GDP 总量的 10.8%，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10.2%……

从北京到海南，从广西到云南，从安徽到湖北，从上海到吉林，新华社记者一路采访、一路追问，对旅游业的认识不断深化：旅游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现象；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人们的一种基本权利……中国已经站在“旅游社会”的大门口，只有重新认识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创新管理方式，中国旅游业才能释放更大的潜力，在为经济提供新动能的同时增加人们的获得感，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添砖加瓦”。

小产业，大账本

春节出发前，东北的赵女士为全家赴海南的假日行做了详细的游玩攻略，涉及机票、酒店、包车、餐饮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我都要仔细研究，出了问题就玩不好。”她说。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然而，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全社会对旅游业带来的深刻变革和影响的认识还远远不足。

在人们的印象中，旅游是小产业，是“闲”出来的产业；在国家统计局多年的统计年鉴中，旅游业的统计口径只代表“旅行社”业的相关数据，直到 2015 年才

针对旅游业开展了一次专项统计，行业统计从小口径向全口径迈进一步；在很多地方，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往往不会考虑旅游业，各部门征询意见时往往忽视旅游业。

“到一个地方，人们通过旅游近距离接触各个行业。然而，人们往往看到房地产、汽车等支柱产业的增长，却忽略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增长潜力。”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石培华说。

据介绍，旅游业的关联产业超过 110 个，且近年来对相关产业贡献不断凸显，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 90%，对民航和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超过 80%，对文化娱乐业的贡献率超过 50%，对餐饮和商业的贡献率超过 40%……“一业兴、百业旺”，更重要的是，旅游业改善着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对安徽九华山友谊土菜馆的老板陆军良来说，这个春节过得特别繁忙与充实。随着祈福迎新走俏旅游市场，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了佛教名山九华山。“初五当天山上来就来了 9 万人，我家土菜馆也是人流不断”。他在餐馆内打造了一个怀旧风格的音乐餐吧，和其他农家乐相比有了竞争优势，一年经营收入几十万元。

以农家乐为切入点，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正风生水起。据统计，“十二五”以来，全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 10% 以上的贫困人口脱贫，总数达 1000 万人。很多农民在开展旅游经营中视野开阔了，市场观念增强了，谋生本领提高了。

据介绍，2015 年全国旅游总收入达 4.13 万亿元，完成旅游投资 10072 亿元，同比增长 42%。国家旅游局预测，未来 3 年，我国旅游直接投资累计将超过 3 万亿元，并将带动 15 万亿元以上的综合投资。

旅游，是开放的窗口、友谊的纽带。近年来，很多国家争相出台吸引我国游客的政策，要求与我国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合作。2016 年春节前，很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出招吸引我国游客。通过旅游，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日本东京浅草寺前，仲见步行街悬挂起金猴图案；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演绎着“大圣归来”灯光秀；阿联酋迪拜地标建筑帆船酒店秀出中文书法“猴”和“猴年吉祥”字样……

“旅游业既拉动投资又拉动消费，富民富财政，融合度高、覆盖面广、拉动力强。我们一定要建设好这一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李金早表示。

小管理，大社会

三亚，我国南部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很多游客冬季到这里休闲度假。

三亚本地常住人口约 70 万，2015 年接待游客 1500 万人次，是常住人口的 20 倍；2016 年春节 7 天假期接待游客 83.9 万人次。

“家里只有一两张空桌，可是来了三四桌甚至更多的客人，该怎么办？”这是三亚管理者经常要思考的难题。

过去，进入一个城市，游客活动在左边，是景区、购物点、大巴车等；当地居民在右边，是超市、菜场、百货店等。如今，游客关注度已从景区景点转向社会生活，进入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

交通管理、食品卫生、服务质量、电力供应、污水排放、垃圾处理……“他们既是游客，又是市民，包括公共服务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督促着社会管理的提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郑聪辉说。

不仅是三亚，很多旅游热门城市外来的游客数量超过当地居民数倍。广西桂林阳朔县 30 多万人口，每年接待游客约 1300 万人次；云南西双版纳 110 多万人口，每年接待游客约 2000 万人次。

这样的挑战越来越多。伴随着居民“有钱有闲”，有旺盛的旅游需求，旅游正渗透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业界学界指出，从多种指标看，我国站在了“旅游社会”的大门口，急需重视、应对。

“一直以来城市管理主要面向生产、生活，旅游带来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提出了新的挑战。”石培华认为，要探索管理方法和体制机制的新方式，投入相应的资源。

目前，几乎所有的省区市都将旅游业列入战略性支柱产业，85%以上的城市、80%以上的区县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然而，记者了解到，多地未对此给予相应的规划。

在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中，普遍没有考虑旅游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城

市公共设施规划主要考虑常住人口，缺乏对外来游客需求的全面考虑。多地旅游部门反映，他们做的旅游规划往往是自弹自唱，“说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

李金早指出，我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全域旅游是空间全景化的系统旅游，要跳出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游。

“青岛大虾”“哈尔滨天价鱼”闹得沸沸扬扬，背后反映出工商、物价、旅游等多头管理，未形成合力的体制现状。旅游行政执法手段分割，已经很难适应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和旅游业综合发展需求。

“旅行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指望旅游部门一家来管，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形成合力。”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在云南，西双版纳成立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由发改委、公安、工商、质检、卫生、文化等 11 个部门联合建立旅游发展委员会综合协调机构。截至 2016 年，全国已有 10 个省区市实现旅游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三亚、桂林、厦门等地率先设立旅游警察。上海、三亚、张家界等地设立了旅游巡回法庭。

2016 年 2 月 19 日，国办印发通知，强调要加快建立权责明确、执法有力、行为规范、保障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进一步解决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旅游者权益等突出问题。

小休闲，大课题

“出门找厕所”关键时刻急煞人。针对这项最基础、最紧迫的需求，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颇具声势的“厕所革命”。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各地已完工的厕所 22009 座，占全年总计划的 104.67%。

“如厕非小事，政府要下决心解决此类问题。”李金早表示。

从身边具体事出发，政府、学界、业界越来越关注旅游业大课题。

做好旅游统计工作。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旅游业统计是一个世界难题，目前我国多部门对旅游的统计远远不足。家底不清，家境不明，如果有一本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就业、税收、

结构调整的明晰账，规划部门制订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会更加科学。

为此，国家旅游局于2015年12月成立了数据中心，负责旅游行业统计和经济核算工作，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旅游统计严重滞后于国家旅游发展战略的局面。据悉，各地也将相应建立地方旅游数据中心。

力促旅游消费转型升级。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达1.2亿人次，出境人次和消费均列世界第一。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继续保持世界主要旅游消费群体称号。

记者在三亚免税店发现，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很高，但由于限制购买品种、次数、金额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购买需求。专家指出，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旅游购物的税收政策，采取综合手段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加大旅游业创新驱动。

“旅游既是典型意义上的新消费，更是再生意义的新生产。这种新生产是对人的活力进行再造，必须加强旅游业的创新。”中青旅董事长康国明指出。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大到景区建设，小到旅游商品生产，目前雷同、低质现象突出。时任三亚市政协副主席郑钢说，必须加强创新，创造更丰富多彩、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提升全民文明旅游素质、更加科学合理的休假制度安排、推进旅游管理改革创新……

2016年，我国与联合国旅游组织共同主办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在意中国、审视中国。中国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世界、融入世界、影响世界。”李金早说，我们要不断总结、与时俱进，深化对新常态下旅游业地位和功能的认识，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

“旅游社会”呼唤旅游业加速转型

我国快步迈向“旅游社会”。应对“旅游社会”大考，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旅游管理创新，以旅游业加速转型适应旅游消费新需求。

旅游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对于这个综合性与系统性很强的市场，仅靠某个部门来进行监管，可谓独木难支。受到持续关注的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折射出我国旅游市场监管能力不足的问题。应对“旅游社会”大考，急需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推进综合整治和联合执法，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形成监管合力。

新旅游法已出台，但“依法治旅”的力度仍显不够。一些旅游经营者依法经营意识淡薄，存在“一锤子买卖”心理，只顾眼前利益，枉顾长远发展，对游客“宰一个算一个”，破坏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应对“旅游社会”大考，还需提高违法成本，加快建立诚信体系，建立健全黑名单制度，在旅游行业营造诚信经营的良好风尚。

进入“旅游社会”，旅游业的形象越来越影响一个城市的形象。不少旅游热门城市外来游客数量会超过当地居民人数数倍，如果城市容量不考虑旅游高峰形成的大客流，从交通、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进行综合性、前瞻性规划和管理，就会造成人满为患的尴尬。因此，应对“旅游社会”大考，应在城市公共设施规划中充分考虑外来游客的需求。

在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型的过程中，游客既是旅游休闲的享受者，也是社会责任的践行者。游客的行为关乎国家的文明形象。因此，应对“旅游社会”大考，游客也应避免不文明旅游行为，以良好的旅游行为展现文明风采。只有政府部门、景区、经营者、游客多方各负其责，一个具有高品质休闲氛围的旅游强国才能早日建成。

六大痛点透视：“人在囧途”，谁之痛

2016年春节黄金周，我国超3亿人次出门旅游，然而人在旅途，却常常成了“人在囧途”。

被寄予厚望的我国旅游业究竟面临哪些痛点？新华社记者日前赴海南、吉林、北京、云南、广西等多个省区市调研，剖析制约旅游业发展的深层次痛点，探索跨入“旅游社会”的应对之策。

时间之痛：逃离黄山能否逃出“黄金粥”

“人山人海”“挤得疲惫不堪”“进退无路”……春节黄金周，一位游客用《黄山逃亡记》记录下期待已久的黄山之旅如何变成“痛苦之旅”“逃亡之旅”。

不只是黄山，全国各地景区“爆棚”无一幸免；不只是春节，每年的“十一”黄金周、“五一”小长假，“人堵、车堵、心堵”成为人们出游的真实写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缓解黄金周旅游高峰带来的种种弊端，需要旅游、交通等部门未雨绸缪，需要旅游企业及时合理疏导，但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落实带薪休假，实施弹性休假制度。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表示，旅游是综合性消费，除了金钱，还有时间。当前主要问题在于休假制度根本不能满足大众需求。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认为，只有科学调配，错峰高峰、避开人流，才能保证休假和出行的基本舒适度。

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张吉林说，由于带薪休假落实不到位，人们旅游主要靠公共假期，加剧了出行拥堵和景区拥挤。“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应该出台弹性休假

和错峰休假制度，具体怎么实施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而定。”

前不久，国家旅游局提出，要推动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在保证每周法定 40 小时工作制、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员工错峰休假、弹性休息，探索夏季“2.5 天休假模式”。业内人士指出，只有把休假的时间交给个人“私人定制”，黄金周人山人海、拥堵不堪的局面才能破解。

市场之痛：“一盘大虾”谁来管

出门，中国人讲究的是“穷家富路”，然而，旅途中的一些花费，却让人生了几分惧怕。

2015 年 10 月，一盘“青岛大虾”引起广泛关注。2016 年春节期间，“哈尔滨天价鱼”事件炒得沸沸扬扬。在旅途中遭遇“黑店”，到底该找谁投诉？旅游、工商还是物价部门？谁该为此负责？当遭遇相关职能部门“踢皮球”，人生地不熟的游客又该怎么办？

李金早直言，“青岛大虾”事件反映的是工商、物价、旅游等多头管理，未形成合力的体制现状。今天的旅游管理体制、旅游行政执法手段分割，很难适应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和旅游业综合发展需求。

“当旅游成为老百姓生活的常态化选项，游客进入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时，各级党委与政府部门、旅游监管部门要适应旅游开放与共享的需求，打破过去封闭、部门分割的状况，创新旅游监管职能。”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针对“多头管理”现状，一些地方加强了探索和尝试。2015 年 10 月，三亚成立了我国首支旅游警察队伍，综合协调处理旅游纠纷；国家旅游局也正谋划在全国推广“工商旅游分局”，把工商的专属职能因地制宜融入旅游市场监管中。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要求加快建立权责明确、执法有力、行为规范、保障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进一步解决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侵害旅游者权益等突出问题。

消费之痛：购物狂潮为何留不在本土

中国人过一次春节，受到世界的普遍欢迎：中国游客涌入日本免税店“爆买”，购物就像周末逛超市；中国游客大举赴韩扫货，韩国百货店销售额最高增长70%……据统计，2016年春节中国出境游人次约600万，出境花费或达900亿元。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超过13%。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境外旅游消费继续位列世界第一。

“这实际暴露出我国旅游业供给侧出了问题。”中国旅游智库秘书长石培华说，在当前百姓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国内产品供给不足，尤其是新产品、新业态结构性短缺，缺少精致的生活用品，整体质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如何引导巨额消费回流值得思考。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月亮说，海南离岛免税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和探索。在限品种、限额度的情况下，三亚免税店2015年免税销售额达40多亿元，增长势头非常好。这证明我国消费需求确实旺盛，免税购物大有潜力可挖。

中国旅游智库主任魏礼群认为，应适应居民旅游消费升级趋势，开发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其中，应大力开发旅游购物，新增进境口岸免税店，吸引出境购物回流。

竞争之痛：游客缘何被“卖来卖去”

目前，96%的国内游、65%的出境游都是散客自助游。散客时代给旅游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加上在线旅游企业的竞争压力，旅行社低价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2015年以来，几起“恶导游”事件引发公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低价恶性竞争带来的是强制购物，云南等地比较典型，购物店返佣高达70%，旅行社完全靠购物来“赌团”。

记者调研发现，在低价旅游团中，游客往往被“层层转卖”。在热门旅游目的地，地接社为了招揽游客形成恶性削价竞争，以低价从组团社手中“买”团，然后

再将整个行程“卖”给导游，甚至将行程分段“卖”给不同的导游。导游“买”团后自然承担很大压力，只能通过让游客大量购物来收回成本，赚取利润。

不仅国内游如此，出境游也不例外。“五六年前，跟团去美国旅游的价格是2万~3万元，现在3999元就能去。”一名导游表示，当前很多旅行社都要求导游接团出行前缴纳“人头费”，靠什么把这些钱“赚回来”，是导游在行程中考虑的首要问题。

价格战表面看来是给了游客实惠，而实际上，不管对旅行社、导游还是游客，背后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这颗“毒瘤”不除，旅游行业永远不会风清气正。

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合执法力度，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应提高旅行社准入门槛，改革导游管理体制，加强行业自律，还要引导游客形成成熟的消费心理，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素质之痛：文明出行何时蔚然成风

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乱扔垃圾、乱涂乱画……黄金周集中出行也使游客素质得到集中体现。随着我国出境游客越来越多，文明出游也成为对国家形象的一个重大考验。

为了遏制不文明行为，2015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4批“黑名单”，共计16名游客上榜，其中12人涉及扰乱航空秩序。

国家旅游局表示，长期以来对游客文明旅游主要以宣传引导为主，出台游客“黑名单”制度，目的是希望通过公布不文明游客起到震慑作用。

针对不文明行为，多个部门也开始了联合行动。2016年2月初，国航等5家航空公司表示，将建立“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对不文明旅客采取一定的限制服务措施。“黑名单是‘长牙齿’的，进入黑名单的游客将要为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买单。”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指出。

收益之痛：景区何时摆脱“门票依赖”

大年初一，来自河南的两家 7 口人意图逃票进入云台山景区，结果被困在悬崖峭壁之上，经连夜救援终于被安全救出。一些网友表示，说到底还是因为票太贵，如果门票便宜，谁还冒着风险去逃票呢？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我国的景区，尤其是 5A 级景区门票太贵却是不争的事实。黄山门票 230 元，九寨沟门票 220 元，武当山门票 243 元……5A 级景区平均票价已经迈入“百元时代”，有的甚至超过 300 元，拖家带口出游仅门票费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

大好河山、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遗产本属于公共资源，理应全民共享。然而大部分景区收入主要靠门票，而不愿意深入挖掘景区内涵，拉长产业链。

“现在一些旅游景点的高票价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相背离。”李金早表示，要改变我国旅游过度依赖门票收入的局面，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要实行分类改革，公益性景区要低价或免费开放，市场性投资开发的景区门票价格也要限高，坚决遏制景区门票上涨过快势头，打击乱涨价和价格欺诈行为。

国内也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2015 年 9 月，三峡大坝景区率先对中国游客实行门票免费。“与其利用垄断性资源圈地收费，不如做好服务让游客心甘情愿为你掏钱。”时任宜昌市旅游局局长孔磊说。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变“门票依赖”现象，地方政府要树立公益观念，破除利益藩篱。

酸甜苦辣，80 万导游群体心声谁知

“干着教授的活，拿着农民工的工资，担负着全团保姆和心理医生职责，随时面临各种危险……”这是业界对导游的评价。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 2 月，全国持有导游证的人数约 80 万，但 4 万亿的旅游市场规模分给导游群体的寥寥无几。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旅游市场竞争加剧，导游生存状态急剧恶化，“三无问题”（无合同、无工资、无社保）、“两黑一差”（黑导购、黑购物点、服务差）时时困扰着他们，他们的酸甜苦辣迫切需要社会的倾听、关注。

行业有潜规则：“我也是受害者”

2016 年春节前夕，一则西双版纳地接导游因购物问题斥责游客的视频在网络上曝光，“白吃白喝白住，你们问心无愧？”视频中，大声咆哮的女导游和大巴车上沉默的游客形成鲜明对比。

2 月 1 日，当地旅游部门对事件作出处理，涉事导游何某被吊销导游证，组团的旅行社被吊销经营许可证。

按照规定，自处罚之日起，何某 3 年之内不得重新申请导游证。她告诉记者，自己从 1999 年开始做导游，做了 17 年，没有一起投诉，还被评过西双版纳的优秀导游。

“旅游产品有很多种，游客既然选择了低价团，也应支持我的工作。”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何某表示并没有强迫游客购物，行程结束后也没有对她进行投诉。“导游的工作是承上启下，游客住什么酒店，用什么餐，我们没有决定权。我只是一个

小导游，也是个受害者。”

“现在的旅游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若不是先搭钱进去，没有哪个导游会去计较那几百块钱。”调研过程中，多位导游、领队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业者越来越多，加之在线旅游通过“烧钱”抢占市场，低价竞争在所难免。

“组团社用低价吸引游客，再按人头卖给地接社，地接社有‘赌团’的性质，先垫付交通、酒店和餐饮费用，通常这笔钱就要由导游先垫付。”从事出境游近10年的导游王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欧洲30人团为例，出发前导游就要先垫付人头费、当地酒店税费等近4万元。“不交这笔钱就领不到活儿，能不能挣回来、赚多少，全靠导游的‘本事’了。”

规定难执行：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交保险、纳社保

4年辗转3家旅行社，胡伟还是在第3个“本命年”到来之前提交了辞呈。从业十几年来，胡伟始终坚信会“干不动导游了”再离开，但兜兜转转，起起伏伏，“这几年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游首当其冲，一切的负面结果仿佛都要由我们买单。”他说。

胡伟是导游专科出身，在他的印象里，导游要学的是历史、文化、外语，以及如何通俗有趣地为游客讲解。“入行后才发现，导游要学的是怎么‘忽悠’游客买东西、收回扣，别‘白忙乎’好几天，最后让同行、司机都看不起。”

采访中，胡伟用手机刷着朋友圈：“这个2015年离职了，那个也准备不干了，都说活儿难接……”这几年他看到很多为导游呼吁工资、社保的文章，旅游法也规定“旅行社应当与其聘用的导游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规定都有，但很难执行。”他有些无奈。

记者在多地调研时发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遇到法律规定的情况，一些旅行社反倒要求导游自缴一大笔钱，成了“自己给自己发工资、交保险、纳社保”。“导游只能个人缴纳33%的养老保险，这反而加重了导游的负担。”在云南省腾冲县，当地旅游局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很多旅行社都采用弹性用工制度，平时有三四个导游，一到旺季就通过签订临时的劳务合同吸纳二三十名导游。很显然，这些导游的薪资、福利等基本保障难以实现。”北京市旅游委副主任王粤认为，导游行业难以转变为“幸福行业”，带来很多问题。

行业中挣扎：诚信相伴、阳光导游

入职 13 年来，桂林导游刘萌刚于 2015 年站在了全国十位“最美导游”之列，他曾接待了近 2 万名国内外游客，无一例投诉，还赢得了包括多国政要在内的客人的赞誉。

刘萌刚还担任了桂林导游协会会长。早在 2005 年，他倡议全市导游拒接花钱买团的“填坑团”。“如果带零负团，肯定是想尽一切方法使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用心服务于游客。不接‘填坑团’，是从源头上消灭诱导客人消费的心理需求。”他举例说，“我不喝酒，自然无酒驾！我不出门，哪来闯红灯？”

在刘萌刚看来，导游行业是“外交名片”。他曾接待一对来自毛里求斯的母子。他们在桂林购买了约两吨重的石狮子，把 3000 美元交给刘萌刚，请他帮忙把这对石狮子运回毛里求斯。

刘萌刚依诺将石狮子寄出之后，联系对方要退回剩余的钱。对方来信说服他将余钱作为小费。女主人在信中写道：“非常幸运认识你，因为你的真诚，使我们很放心让你把物品托运回来。非常感谢你，并期待你有时间来游玩，我们可以当你的向导。”

采访中，这样的“阳光导游”不在少数，他们坦言，旅游正逐渐从奢侈品成为大众消费品，但“服务”的价值不能被低估：“东方之星”事件，人们关注导游漂流了 10 小时最终获救，却没人听到他说“客人已经睡觉，他还没有忙完，才得以在船沉的第一时间迅速逃离的细节”……

改变管理体制：自由执业、公开竞争

数据显示，旅行社组织或接待的国内旅游人次虽逐年增加，但其市场比重却在

逐年下降，2010—2014 年，其占比分别为 5.71%、5.19%、4.87%、3.95%和 2.8%，自助游、散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李金早表示，2016 年导游管理体制将从行政化、非流动、封闭式管理向市场化、自由化、法制化管理转变，并取消“导游必须经旅行社委派”的政策规定。

中青旅质监合规部总监李广说，导游自由执业从供给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旅游服务和产品，不仅能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也能进一步挖掘更多个性化的旅游需求，有利于激发市场潜力。

业内人士认为，放开导游自由执业，相当于允许导游干个体户，这实质上是让导游有权与旅行社公开竞争，直接提升了导游与旅行社之间的议价权，倒逼旅行社保障导游的收入。

三亚导游李某认为，导游、游客与旅行社是个平衡的三角关系。导游可以选择游客，游客也能挑选导游。这意味着导游要想揽到更多的活儿，就必须追求口碑效应，提高服务水平。

对话 5A 级景区掌门人

截至 2016 年 2 月，我国有约 200 个 5A 级旅游景区，它们犹如“皇冠上的明珠”，是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然而，近年来一些 5A 级景区的门票价格“节节高”，服务质量却下滑，一些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警告或取消资质。

5A 级景区如何发展，能否走出“门票依赖”怪圈？新华社记者与多家 5A 级景区掌门人面对面，回应民生关切。

如何应对“黄金周”

问题：黄金周人多、车多成为常态，5A 级景区如何有效应对？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总裁关鹏：南山是目前海南最受欢迎、客流量最大的 5A 级景区。2016 年除夕夜至大年初一，入园游客达到 5.6 万人次，全年旺季平均日入园游客 1.4 万人次。黄金周期间景区全员上岗，除夕至初一 24 小时营业，景区制定的安全预案包括了各种专项保障措施。

长影世纪城总经理赵鹏辉：长影世纪城是我国首家电影制片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电影主题公园。根据园区的接待能力，当购票人数超过 8000 人时开始预警，当购票人数达到 1.3 万人时则停止销售。同时，我们加大了智慧化旅游景区建设。如通过无纸化入园，减少因购票排队等候的时间；游客通过园区 App 即可知道各个项目的运行时间和状况，合理安排游览。

门票贵不贵？何时摆脱“门票依赖”

问题：我国 5A 级景区平均票价已经迈入“百元时代”。这些景区目前门票状

况如何？

关鹏：以南山景区的规模和承载量，从 2005 年开始执行了 10 多年的 100 多元的门票价格是适宜的。目前门票收入占景区收入的 46.5%。我们正在以佛教文化等为切入点，着力打造一批诸如禅修体验类的高品质休闲项目，给游客更加丰富的体验，进一步拓展产业链，丰富南山的产品内涵。

时任桂林市委常委、漓江风景名胜区工委书记周卫：漓江是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门票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景区财政收入逐年下滑。经市政府批准的游船游览线路游客量也呈严重下滑态势。漓江现行票价是 2004 年确定的，10 多年来成本上升，游船企业普遍亏损，旅游品质直线下滑。由于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滞后，国家旅游局在 2011 年对漓江 5A 级景区进行了黄牌警告和通报批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需要大量投入，漓江景区门票价格还要进行重新核定。

赵鹏辉：门票收入依然占景区收入的最大份额。2005 年开园伊始，门票价格就定为每人 240 元，10 多年过去了，门票还是保持原价。随着游客量不断增加，收益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我们一直不断对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进行改造升级。在开园初期的 14 个主要景点中，有 5 个景点进行了改造升级，还增加了两处室内场馆、两处户外景点。此外，投资 3.5 亿元的二期工程将于 2016 年上半年开园迎客。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2015 年故宫接待 1506 万余人次，对于越来越多的开放面积、观众、保护任务和日趋复杂的设施维护来说，故宫不能单一依靠国家财政的投入。近年来故宫在“数字故宫社区”等文创相关产业不断加大投入，收到良好的社会 and 经济效益。文创产品收益可以补充事业经费的不足，改善开放和工作条件。

旅游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当地百姓

问题：200 多家 5A 级景区中，自然风景区超过一半，且大部分风景区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存在，这些原住民大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景区在开发中，与当地百姓主要存在哪些矛盾？如何解决？

周卫：近年来，漓江沿线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数量不断增加。百姓“靠山吃

山”造就了独特的景区文化；另外，百姓生产生活对景区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以漓江为例，仅仅是小竹筏，2015年就超过了3000艘，大部分是不正规运营的。随着游客不断增多，涉及小竹筏的安全事故有所增多，小竹筏产生的水污染也不断加重。

原住民理应享受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利益，政府应加大补偿力度。漓江在门票价格改革过程前期，到沿线群众中走访调研，听取群众的声音，为统筹利益分配改革提供依据。对于门票收入，已经初步决定市财政非税收入的分成占70%，县区分成占30%，其中对县区转移支付总额的50%将用于统筹漓江景区内村民利益补偿的转移支付。此外，有关方面还将小竹筏缩减至1000艘，进行公司化规范管理，聘用当地持证运营人员。

高票价为何依然门庭若市

老百姓对旅游究竟愿意花多少钱？新华社记者在 2016 年年初的旅游业调研中发现，一些旅游产品价格虽然贵，但因其有特色、附加值高，仍然受到热捧，甚至“一票难求”。这些产品既是供给侧改革的样本，也是未来旅游的潜力和发展方向所在。

“一票难求”的背后

“1500 元一天，不仅可以享受射箭、单车、攀岩、瑜伽等多个项目，还可以品尝世界美食，欣赏雕塑作品。”桂林地中海度假村，来自北京的徐国林和家人不久前在这里度过了 5 天时光。

徐国林所说的度假村占地约 5.3 平方千米，是法国地中海俱乐部在我国开发的第一个全年开放的度假村。以“文化+运动+山水风光”模式吸引了大批游客。据介绍，2015 年 7 月以来，这里每天的入住率都达到 95%以上，2016 年春节和 2015 年暑假，330 间客房“一房难求”。

“中国游客远超境外游客，这是没想到的。”桂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调研员庞铁坚说，每天 700 多名客人只有 1/5 是境外游客。

江南水乡乌镇，“小桥流水、桨声舟影、白墙黛瓦”，岁月静好的千年古地，吸引了万千游客。蓝印花布、三白酒等传统工艺品与食品作坊，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香市”等民间节日，高竿船、箍桶、皮影戏、花鼓戏……生活中感受不到的美丽、惊喜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乌镇是中青旅等共同开发的，当时就想打造一个高端旅游产品，让四海宾客

在这里体验水乡文化、传统文化。事实证明，乌镇得到大家的欢迎，并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国明说。

如今“印象派”的歌舞表演非常流行，但越来越难满足挑剔的游客。

在三亚，宋城演艺打造了一种“文化体验旅游”模式，以“主题公园+文化演艺”的形式再现了当地千年的历史文化与传奇。游客既可观赏演出，又能亲身体验传统的黎族婚俗等。据统计，2016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三亚千古情景区共接待游客20.1万人次，其中散客占87%，共上演《三亚千古情》30场。

高品质缘何赢得青睐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追求高端旅游产品的人群逐渐扩大，这些产品既让旅游变得更容易、更方便，又更加倾向差异化或富有内涵的体验和服务。

个性化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2014年接待游客超过2200万，2015年超过2780万……近年来，长隆旅游度假区在主题公园领域多项指标上连续超越香港迪士尼。

“长隆度假区非常适合带着孩子前往。”2016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民孙佳一家三口“南下”广州，在长隆酒店的亲子房里，孙佳看到了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牙具、杯子、拖鞋和浴袍。“不管是游览还是住宿体验，度假区都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孩子们也很喜欢。”

高附加值的旅游伴随文化延伸。登上长城学八段锦、在古北水镇学打太极拳、在中医院学做秋梨膏、敷中药面膜……这些充满文化特色的活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在北京体验一把养生之旅。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中青旅等5家旅行社的13条中医养生文化旅游线路接受游客报名，且报名踊跃。

稀缺性让产品更“诱人”。不少游客将眼光投向遥远和神秘的南极。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发布的2014—2015年度数据显示，中国年度赴南极游客人数为3042人，仅次于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是南极第四大客源国。同程旅游网也宣布开启2016年南极邮轮之旅，将在两年内包船服务2个航次800人。

专题化和专业化。海边看日出，来一场海景婚礼，到海底餐厅共进烛光晚餐……海南三亚海棠湾十几家酒店打造出了自己的特色服务。

海棠湾旅游文体局局长叶凯中介绍，海棠湾的旅游酒店已进入了 3.0 版本，打造的“旅游+购物”“旅游+会展”“旅游+健康”产业等已日臻形成并凸显光彩。2015 年酒店接待量超过 200 万人次，涉旅业态总销售额超过 60 亿元。

高品质休闲游助推产业结构性改革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旅游+”是未来中国旅游改革发展的新趋势。作为新业态，高品质一站式旅游、文化体验旅游正为旅游转型提供了改革样本。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说，我国旅游在硬件方面出现结构性失衡，传统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型供给的变化。一方面，现有硬件设施严重过剩，如传统景区、饭店业等；另一方面，游客对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市场提供多元化、人性化的选择。

记者也发现，重要的是，旅游产品要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品牌。一名游客坦言，作为一个童话梦想的“彼岸”，迪士尼就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品牌。

“旅游转型升级不能再走低端路线，需要朝着品质旅游的方向发展。”时任三亚市政协副主席郑钢说，“以海南为例，留给海南的时间只有 10~15 年。如果不加强改革，不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游客就将转移到泰国、印尼等地，转型就难以成功。要多多挖掘有特色的旅游资源，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旅游休闲品牌。”

康国明说，我国旅游业已经步入黄金发展期、结构调整期和矛盾凸显期，只有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开发新模式，开创新业态，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才能全面提升旅游业竞争力，助推产业结构性改革。

“中国旅游”遭遇“时间”尴尬

假期究竟是“宅”在家里还是外出旅游？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休假出门旅游一趟容易吗？这些问题都让人纠结。

新华社记者于 2016 年年初赴京、沪、皖、琼等地调研发现，当百姓有钱有出游冲动后，时间却成为拦阻百姓出游脚步的重要因素。现实条件下，带薪休假该如何保障？弹性休假的路线图又该从哪开始？

休假之难：我的时间我做不了主

每个黄金周，出门旅游的人一堆牢骚，宅在家里的人等着“看热闹”。

据某地图大数据显示，2016 年春节期间，游客人数最多的景区为杭州西湖，309 万人次涌进西湖景区。“断桥真快被挤断了！可年假难休，明知道会暴堵，也只能硬着头皮举家出游。”湖北游客郝轩边说边抱怨，自己工作 10 年从未休过年假。

郝轩的经历是当前国人出游普遍缺少时间的缩影。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状况调查报告（2014）》显示，目前带薪年休假普及率低，全国只惠及大约 50% 的职工。这意味着有一半在岗职工难以休假。年假难休的另一面是，国人年休假时间明显少于制度安排时间。按照在职职工工龄分析，我国人均带薪年休假约为 10 天。而相关调查显示，我国人均享受带薪年假天数仅为 6.29 天，民营企业职工甚至不足 4 天，超 72% 未完整享受过休假。

“较之国有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个体户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带薪休假落实情况更差。”时任湖北省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赵芝斌告诉记者。

记者走访发现，别说带薪休假，对于一些民营企业的职工而言，法定的双休日、

节假日都难以保证。某房地产公司职工倪某吐苦水称：“公司规定，工作前3年禁止休假，并且周末只给休一天，也没加班工资。只有春节，是我全年唯一能休的完整假期。”

带薪休假遭遇“不能休”之痛，公共假日的集中休假则加剧了供给矛盾。湖北省旅游局政法处调研员陈同月说：“据测算，清明节等小长假，游客量比双休日高3~4倍，春节、国庆长假，游客量是小长假的5倍以上。”

假日里，景区人满为患、旅游价格飞涨……令人“不敢休”。“中国式集中出游，不仅使游客体验大打折扣，也迫使旅游资源在短期内承担巨大压力，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北京市民周某已连续两年在长假期间选择“家里蹲”。

备受期待的弹性休假，在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看来“真难休”。中部一省份旅游局2015年向该省政府报送了《关于优化休假安排激发旅游消费需求的指导意见》，倡导落实带薪休假，鼓励错峰休假、弹性作息等，然而迟迟未获通过。

时间之痛：为何不能“说走就走”

“年假难休，长假太堵，弹性休假迟迟没有实质进展。看起来假日不少，却不能‘说走就走’。”工作3年从未休过年假的安徽合肥一国企职工顾某无奈地说。

专家认为，“时间之痛”反映出社会还没有把旅游休闲看成公民的基本权利。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前关于带薪休假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明确，违规成本低且处罚执行难。因此，不少企业缺乏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自觉性，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是如此。

即使被督查发现了，真正按要求限期改正、支付赔偿金的很少。相关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中77%的未享受带薪年假人员未得到应有补偿，其中66%的未休假者没有享受到任何补偿。

同时，职工自身更看重加班工资兑现、社保参保等权益，不敢或不想主动提出带薪休假。“专项检查之外，劳动监察局就较少收到专门的带薪休假投诉。”赵芝斌说。

为缓解“时间难题”，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鼓励弹性作息。随之江西、湖南等地出台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小长假”措施。

然而，新浪网此前一项调查显示，高达60.7%的网友对这一弹性休假的落实并不乐观，认为实现“两天半小长假”的难度很大。

在走访中，游客、导游普遍反映，实施弹性休假缺少环境基础。一方面周五下午的4个小时从哪里挪。如果从工作日中挪取，周一至周四要每天工作9个小时，可操作性差。如果从带薪年假中挪取，相当于将长假打散，也不妥当。

能不能恢复“五一”黄金周来解公众的“长假饥渴症”？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认为，在带薪年假难以短期内实现的背景下，当务之急便是恢复“五一”黄金周，还可以在8月上旬增加3个法定假日，通过前挪后借，增设一个避暑黄金周。但也有专家对此提出异议，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认为，黄金周设立带来集中排浪式消费，存在安全隐患等诸多弊端。他建议，甚至应该取消“十一”黄金周，增加小长假，以促进旅游波峰波谷间大致平衡。

多省旅游局负责人坦言，取消“十一”或者重设“五一”假日，不仅仅是旅游行业的事情，更牵动着全国经济发展的大局。业界的存废之争恰恰折射出假期安排的现实困境。

供给之变：落实带薪休假 探索“弹性工作制”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戴学锋指出，当前国内1/3的旅游需求没有被释放，加大并优化时间供给，将进一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国明表示，是否增加假期，需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众需求综合考虑，既要纵向考虑我国法定节假日逐步增多的情况，也要横向比较与我国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情况，更需要平衡好经济发展同公民休闲娱乐需求的关系。

专家认为，我国法定节假日为11天，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时间之痛”的根源在于，时间管理的制度性安排太强，不利于个性化发展，需要加快实行时间供给

侧改革：一是重视并保护公民的“时间权利”，不打折扣保障带薪休假、双休等法定假日权利；二是更加灵活，给予地方放假权力；三是还给个人假日安排权利。

多地旅游、劳动监察部门相关负责人普遍认为，需要制定更严格的约束制度。安徽省旅游局监管处处长杨龙建议，可建立带薪休假落实情况的定期公示与披露制度，要求单位对落实不力情况进行说明，倒逼一些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仅仅保障带薪休假制度还不够，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魏翔副教授认为，可借鉴美国和欧洲的经验，增加地方政府安排假日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业内人士认为，由国家负责规定全体公民假日，除春节、国庆长假使用的天数外，全国法定假期的余量可由地方自主安排，缓解集中出游之痛。同时，给予地方增设1～2天地方假期的自由裁量权，用于设立地方新节日，或者与原有节日结合形成组合效应。目前，已有10个省份提出了增设地方节假日的意见，主要基于民族民俗、纪念日和适宜旅游出行等三方面考虑。

那么，2.5天假等弹性休假的时间从哪来？

魏翔认为，必须先试点“弹性工作制”。“美国等早已实行，如时间银行、在家办公、工作分享制等弹性工作方式。这样在确保工作效率的同时，给予个人安排时间的权利，才能真正形成差异化的弹性休假。”

专家认为，在确保工作时长不变的情况下，发挥地方与个人的自主决定与安排假期的差异性，既能将更多旅游消费的需求转化成现实，又有助于推动中国步入休闲经济时代。

以法治刚性保障公民休假权利

每逢假日，百姓既盼旅游散心，却又怕出门，“堵得慌”“涨价潮”……事事烦心。若要改变集中出行引发的“假日病”，必须优化公民的休假时间，加快探索更合理的假日制度安排，以法治刚性保障公民休假权利。

旅游景区集中爆棚，既有我国人多的国情因素，还有公民难休的假期因素。由于带薪休假难落实，迫使不少公众把长途旅游挪至国庆与春节黄金周这两个长假，一时间，旅游人数井喷式增长，旅游市场因供需严重失衡，产生拥堵、价格飞涨等诸多问题。这不仅让集中出游的人们的旅游体验大打折扣，也因拥挤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我国虽然对带薪年假制度作了相关要求，但在现实中落实难，究其原因在于监管不力与执法不严。按照条例要求，地方人事、劳动保障部门有责任主动监督检查，但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缺少明确的约束机制与处罚机制，不少地方的监管工作流于形式，往往是职工投诉一起处理一起，能将处罚“落地”的更少。

保障公民休假权利，最迫切的便是以法治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既要完善现有的带薪休假法律法规，弥补制度缺口，也要探索建立定期公示与披露制度等，以强有力的监管、执行力度，打消一些用人单位的侥幸心理。长期来看，还需增加地方政府与公民个人安排假日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形成更加科学的公民休闲权利体系。

公民休假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有句名言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国人有了“说走就走”“看看世界”的冲动，愿更多的带薪休假权利能从一纸规定变成群众能够享有的实惠。

放眼看世界：旅游业的“他山之石”是什么样的

2016年春节，600万中国游客赴海外“过年”，“刷”出境外消费900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首尔、东京、曼谷、巴黎、伦敦、纽约，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市场报告勾勒出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热衷目的地。国家旅游局公布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亿人次，旅游花费104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2.0%和16.7%……

除了游客们“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情怀”和随收入增长渐渐鼓起的“腰包”，目的地国家的服务体系、文化魅力和新兴旅游项目等都成为其吸引海外游客的“闪光点”。旅游业发展的“他山之石”究竟什么样？记者进行了梳理。

韩国——不止于“韩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韩旅游。受“韩流”影响，许多中国游客把首次出国游的目的地定为在影视剧中常看到的韩国。在济州岛和板门店等著名景点，中国游客有时达到拥挤程度；在首尔的明洞、南大门及大型商场的免税店，操着各地口音的中国游客络绎不绝……

据了解，韩国把“整容观光”和“保健观光”开辟为招揽游客的新名目。根据其1999年制定的《韩国保健产业振兴法》，政府把保健产业打造成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赴韩就医是一种高附加值产业，既能增加就业机会，又能带动旅游业发展。据悉，韩国政府正在实施一个“国际关爱方案”，争取在2020年吸引100万海外游客到韩享受“医疗观光”。

日本——观光立国

2002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制定《全球观光战略》，就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旅游业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科学技术”之后第二个以法律形式被置于“立国”高度的产业。促进旅游购物，获得经济效益是日本推进“观光立国”战略的重要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关键是提供优质的服务。

外国游客到日本，会感受到各种细节：入境前会有海关职员维持秩序，检查入境游客是否填写了入境卡；取行李处，有职员负责把行李排列整齐；游客在街上问路会得到热情答复；饭店里服务生毕恭毕敬……

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日本零售业在2013年成立了日本购物旅游协会，该团体有100家企业加盟，与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及经济产业省、地方政府等合作，建立“全日本体制”，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民间企业合作；民间企业超越竞争关系及行业界限合作；大城市和小地方发展超越地区合作。

据统计，2014年日本入境游客达到1341万人次，在世界旅游组织2015年《旅游竞争力》报告中，日本旅游业综合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九。

美国——业内“各司其职” 经营管理规范领先

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2015全球旅游报告》显示，在2014年国际游客到访量和旅游收入方面，法国、美国、西班牙和中国继续居全球前列，其中美国接待外国游客7480万人次。2012年，奥巴马政府认识到旅游服务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利益，设定了2021年吸引1亿人次国际游客的宏大目标。

在经营管理方面，美国旅游业经验丰富。美国具有多个国际权威的行业协会，各协会针对特殊领域管理旅游资源、协调企业利益。例如，美国酒店与住宿业协会在美国50个州设有分会，对新会员进行入门培训，介绍成员经营情况，维系美国酒店住宿业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高标准。

美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700万人。虽然看似美国政府对旅行社和导游的监管非常宽松，但美国旅游业在导游服务、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消费购物、景区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服务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标准，旅游市场也较成熟、规范，导游素质相对较高。

法国——保护人文景观 守住旅游业“灵魂”

法国长期保持着世界旅游大国的地位，2014 年法国接待外国游客 8370 万人次，排名世界首位。法国旅游业持续发展壮大与法国文化大国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法国政府一贯重视历史文物古迹保护，把保护人文景观当作持续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法国政府还特别注意避免为了开发旅游而造成文化景观的过度商业化。

在文物保护方面，法国不仅注重某个特定文物古迹的保护，而且关注维护和保存这个特定文物所处的整体环境，避免出现“一个古老的教堂深陷在现代化高楼大厦中”的尴尬景象。

以里昂为例，这个城市依然完整保留着一个 12—16 世纪建筑的老城古街区，保护区内有 250 栋被保护的建筑物。19 世纪以后的建筑则在风格上与古建筑十分协调。法国政府对这个保护区内的居民作了特殊安排，在保留民居外貌的同时增修现代化厨房和卫生设施，留住了原来的居民。老城区只允许当地居民车辆进入，从而减少保护区内的交通流量，这个老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西班牙——改革驱动旅游业重振


同法国一样，西班牙也走在世界旅游发展前列，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旅游业就已经发展成为西班牙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数据显示，2014 年西班牙接待入境外国游客 6500 万人次，位居世界第三。

在旅游业发展中，西班牙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且在不断强化。在政府出台的多项政策中，《2012—2015 全国一体化旅游计划》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班牙推出的最为重要的发展计划，要求西班牙旅游业必须以创新为基础，对旅游业重新规划。

“去西班牙”是该计划提出的应对策略，即吸引外国游客到西班牙旅游，把西班牙的文化、自然和企业等所有资源和公共服务都用于为游客服务。这个包含了

28 项措施的“一篮子”计划主要涉及：以最快速度发放旅游签证、支持成熟景区改革，为旅游基础设施提供贷款额度、让私营部门进入旅游决策和融资领域、实施旅游创新从业人员计划等。

这个 4 年计划的全面实施使西班牙旅游业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西班牙政府预计，2020 年该国入境游客将达到 1.4 亿人次，2030 年达到 1.8 亿人次。



第三篇

文化篇

守望传统村落

导言 留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

➤ 首获中央财政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仍“喜中有忧” 韩 洁 高 立

➤ 让民族文化根脉薪火相传 王 敏 王立彬

➤ 传统村落保护三大怪相：大拆建·假古董·过度化

王 蔚 王 敏 韩 洁 王立武 高 立 阳 建

➤ 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难

韩 洁 高 立 王 敏 王立武 阳 建 王 蔚 侯文坤

➤ 粉墙黛瓦，将不仅只在梦里

王 敏 韩 洁 王立武 高 立 阳 建 王 蔚

➤ 住建部回应传统村落保护焦点问题 韩 洁 王 敏 杜 宇

➤ 谁来为古村“买单” 阳 建 王 敏

➤ 三面残墙的启示 韩 洁

➤ 走访古村：那么美，那么痛 高 立 韩 洁

➤ 万里探访，不只是为了留住一抹乡愁 王 敏 阳 建 韩 洁

➤ 人生何处不乡愁 王 敏

➤ 留住乡亲，留住乡愁 王立彬 王 敏

➤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要防止二次破坏” 周润健 朱天骄

➤ “痴人教授”胡彬彬：“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

王 敏 阳 建

导言 留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

因没钱维修被空置或倒卖等原因，中国的古民居正以大约每年 5% 的速度递减……

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树立文化自信。

作为承载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传统村落，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保护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2014 年八九月间，新华社记者兵分多路，历时近一个月，行程万里，深入多省偏僻传统村落调研。

这是发自心扉、露之弊端的心声——“从深绿到浅灰，山的影子一层一层地淡了下去，山间有绿水蜿蜒，粼粼地反着光。我们的车在山路上飞驰，从温州龙湾机场一路向西，终于来到了浙江省松阳县，走访了浙西南以及皖南地区的 20 多个村子。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感受，只有 6 个字：那么美，那么痛。

青山环抱，绿水相间，空气清新，植物茂盛，记者走访的这些传统村落无一例外都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我们的祖先们对村庄的选址、布局颇为细致和讲究，其中暗含一套自成体系的自然观和审美观。古老的村子依山傍水，因山而厚实，因水而灵动。此等景致，对于常年身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来说，是如此地具有吸引力。”

那些景，永远镌刻在记忆里……

而那些极其现实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传统村落，困扰着人们。

资金不足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一大难题。2014 年，保护传统村落首获中央财政支持。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平均获得 300 万元的补贴，为

此，中央3年将投入上百亿元。在中央大幅削减专项转移支付的背景下，这笔资金来之不易。

然而，对于传统村落保护，这笔钱仍是杯水车薪。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居民及社会共同努力。”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刘昆表示，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同时还要鼓励地方各级财政统筹有关资金，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投入力度，并因地制宜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护。

那些人，让我们终生难忘。

“村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保护传统村落，留住的不是个人的‘乡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被称为中国“村落保护第一人”、身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作家冯骥才常年四处奔波，为抢救文化遗产进行实地调查，已将保护传统村落融入血脉。

“我的家乡已经破败了，可是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

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从事村落保护、乡村文化研究已有30多年，和学生一起常年奔走在乡间路上，对村落进行田野考察、数据采集与学术研究，考察行程可以绕地球3圈。

首获中央财政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仍“喜中有忧”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正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中央财政将用3年时间集中投入超过100亿元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这是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传统村落保护拨付资金。

截至2014年10月，2014年面向第一批327个传统村落的16.8亿元补助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位。首批受益传统村落每村可获平均300万元资金用于环境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此外，中央财政还投入7亿元用于这些村落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2014年第一批传统村落补助资金拨付到位，年内还将结合实际情况再启动一批，2015、2016年将加快步伐。

2012年，全国首次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大调查，初步掌握了近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此后两年内，住建部等部门分两批筛选出1561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2014年，随着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保护规划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发布，国家层面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初步建成。

时任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对列入名录的村庄，我国计划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投入，用3年时间使其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

他透露，第三批名单也即将公布，名录中的重要传统村落将增至2500个左右。

“传统村落国家名录的建立，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赵晖说，如何改变全社会的观念、如何开展保护、如何解决资金问题、村落文化遗产如何调查、修复及建档等，将是更加艰巨的任务。

他还警示，当前必须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应警惕村庄数量减少的趋势，避免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的错误趋向，避免农村失去特色、失去乡愁。

根据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调查，近年来，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颇具历史、民族、地域和建筑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数量正以“平均约3天1个”的速度快速消亡。

该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告诉记者，跟踪调查显示，2004年，该区域传统村落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而2014年夏天对其中2010年尚存的1033个传统村落回访发现，有461个因各种原因消亡，仅幸存572个，4年间总数消失了44.6%，平均每年递减11.1%，平均约3天就有1个传统村落消亡。

“我国传统村落正在遭遇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胡彬彬担忧地表示，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大量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而交通、信息网络改善、人口流动增加等正加快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

新华社多路小分队深入各地调研也发现，传统村落快速消亡的背后，是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全国村庄数量的减少。

住建部2014年完成的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显示，1978—2012年，全国行政村总量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年均减少3152个；自然村数量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至2012年的267万个，共减少153万个，年均减少约5.5万个。

针对2008—2013年全国约10%村庄的抽样调查进一步显示，5年间消失了2982个行政村、12624个自然村，其中因城镇化减少的行政村数占行政村减少总数的71%，东部地区占比更高达80%。

让民族文化根脉薪火相传

建立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中央财政拨付每个村落平均 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这既体现了中央层面对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视，更警醒全社会：在发展前进中，必须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让民族文化的根脉薪火相传。

在快速的发展中，人们渐渐发现，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农耕大国，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传统村落一方面默默消亡，另一方面正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二次破坏，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传统村落是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几千年来，村落不仅是农业文明最直接的活态存在，更是一部部鲜活的、续写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活史书”。通过一个小小的村落，中华民族培育形成了家国文化的秩序观念，构建形成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伦理与道德体系，并代代传承久远悠长的民族历史。从根本上说，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至今日，散布在中国大地上的传统村落，仍然是一个个具有活力并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今天，必须从树立文化自信的高度认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从中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发展贡献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传统村落保护三大怪相：大拆建·假古董·过度化

大拆大建、张冠李戴“假古董”、过度商业化……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但是新华社记者深入福建、广东、湖南等全国多地调研发现，保护过程中仍出现了令人忧虑的三大怪相。

怪相一：拆建频繁“二次破坏”令人忧

山西太谷县城南的武家花园原有 7 所大宅院，各式街门、院门、腰墙门、过道门 20 多座，亭台楼榭等房间共 200 多间，曾是太谷县少有的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

然而，一项调研显示，这样一处集中体现我国古代“晋”地风貌的建筑群，2014 年却被县里列为城市片区改造重点工程，让道开发商，惨遭强拆。

“城镇化进程中，不少基层干部存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认为传统村落如无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 GDP，与其花钱费力保护，不如让其消亡。有的甚至可能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官商联动，大行‘强拆’之道。”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说，如果再不重视这一问题，传统村落将消亡得更快。

记者调研发现，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浪潮中，因为认识不足，很多极具特色的古村落在被整合、拆建、挪移中消亡。

夹杂在一片红砖瓷瓦的新式农村楼房中，占地近 4485 平方米、拥有 108 个房间、始建于清乾隆时期的福建尤溪玉井坊郑氏大厝在夕阳映照下美丽又孤寂。

“这样的古民居村里本来有 6 座，现在只剩下这一座了。如果不保护，这最后一个也将消失了。”时任福建省尤溪县西滨镇镇长蔡濠担忧地说。

“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拆掉农村，撤村并城，把农民拉进城、赶上楼，多余的地搞房地产。”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曹昌智指出，要警惕片面理解城镇化的现象，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城镇化会把整个农耕文明的形态破坏掉。

怪相二：张冠李戴“假古董”令人笑

明明是宋朝建筑，拆掉后重建了“明清一条街”；原本遗留的街区颇具明清特色，却被拆掉仿建了牌坊，用上了钢筋混凝土；古时江南古桥用石头建造，如今却用水泥重修……

调研中记者发现，一些地方麻木“拆古”，一些地方却疯狂“造古”，造出了很多形态像古建筑的“假古董”，令人啼笑皆非。

“现在有人错误地理解保护古城、古镇、古村落就是恢复历史建筑，重建古建筑物，热衷于盖庙修塔，新建传统特色街，以致拆了‘真古董’去做‘假古董’。”80 高龄的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忧心忡忡地告诉记者。

“国外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护历史建筑的原真性。”阮仪三说，保护的目的是留存真的东西，用古老的建筑语言留存历史。“拆古镇建新镇、拆古董建‘假古董’，是误人子弟，愚弄历史。”

记者调查同时发现，一些地方由于盲目复古，热心搜罗抢拆各类古民居，凑拼新的“古村落”。一些古民居建筑和砖木石构件的倒卖更为火热，合法的和非法的都很起劲。

“浙江、江苏都在搞徽派建筑的马头墙（其实原来是封火墙），就连贵州镇远也在改徽派建筑。贵州的吊脚楼全部刷漆，现在都搞成蓝色的瓦，刷成白墙。”曹昌智说，由于没有找到地方特点，很多地方“东施效颦”，丢掉了原来的特色，这不是保护古村落的应有之义。

怪相三：盲目开发“过度商业化”令人怕

过度商业化，正在逐渐侵蚀传统村落。一些开发商把古村落当景点，把遗产当

卖点，随心所欲地增加景点，然后将古村圈起来收取门票。

朱家峪村位于山东省章丘市官庄乡境内，1371年明洪武年间，朱氏进村，因系国姓，故名朱家峪。六百余年来这里保存有大量自然、人文景观，被誉为“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也是山东省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电视剧《闯关东》的外景拍摄地。

然而，火起来的朱家峪村却因有企业投资搞旅游、村民被集体迁出而在参评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时遭到专家质疑。

“我们保护古村落的目的是保护传统的生活形态，不是搞个空壳，搞个外景地。”曹昌智说，“中央财政首次拨钱给传统村落，我们更担心一些地方拿着钱搞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

记者调查发现，现有收取门票的古村落旅游景区景点的经营企业，分属国营、民营、村集体、外来投资等不同性质，政府宏观调控很难，客观上对古村落的管理与保护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项专门针对古村落开发与保护的法规条文。专家呼吁，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保护应放在首位，切不可随意出让经营权。对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呼吁：“不能把旅游作为村落保护的唯一出路。如果村落都被开发旅游了，那么另一个悲剧就诞生了。”

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很难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看上去很美，做起来却很难。钱从哪里来？产权如何认定？如何开发？如何满足农民需求？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破解保护困境。

钱从哪里来

因没钱维修被空置或倒卖等原因，中国的古民居正以大约每年 5% 的速度递减——这是黄山市古建筑保护专家姚顺涑长期跟踪的发现。

姚顺涑向记者表达了深切担忧：长三角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大肆收购皖南民居构件，用于装饰私人别墅庭院，已是公开的秘密。

资金不足是传统村落保护的一大难题。据时任安徽歙县住建委主任张四新介绍，当地经文物局普查的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塔、古桥、古祠堂、古民居等在内有 3785 处，其中至少三到五成需整修，资金缺口巨大。

2014 年，保护传统村落首获中央财政支持。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平均将获得 300 万元的补贴，为此，中央 3 年将投入上百亿元。在中央大幅削减专项转移支付的背景下，这笔资金来之不易。

然而，对于传统村落保护，这笔钱仍是杯水车薪。时任浙江省松阳县住建局局长卢丁方说，老房修缮要力图呈现原貌，拆下一根柱子，用传统工艺修复后重新装上去，成本远远高于简单地推倒重建，一栋好一点的老房子的修复甚至要几百万元。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居民及社会共同努力。”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刘昆表示，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同时还要鼓励地方各级财政统筹有关资金，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投入力度，并因地制宜探索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保护。

不过，调研中记者也发现，一些村庄拿到中央补助，加上省市县配套和村民自筹等，多的能有上千万元。谁来监督花好这些钱，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是破解资金短缺过程中必须正视的课题。

产权如何认定

一方面，传统村落的村民受限于财力无力维修，想转让有财力保护的他人却遭遇法律障碍；另一方面，想参与保护利用传统村落的组织和个人担心投入巨资却难以得到法律保障。

在资金短缺面前，产权归属也困扰着从事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人。

“要拓宽资金渠道，必须通过出租、认领、认购等办法筹措资金，通过编制古村落、古民居开发利用规划、项目招商引资等办法，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产权人参与保护利用。”黄山市建委古建专家陈安生说。

记者了解到，无论是保护古村落还是古民居，目前都涉及一个最主要的法律障碍——由于土地属于农村集体，古民居不能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也不能自由转让。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用地在没有改变属性的情形下，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转让，不能转让给“外人”。

“是时候考虑针对这一特例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了。”徽学专家、安徽文史馆研究员方利山说，在确保能得到较好保护的前提下，应让古民居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转让，吸收社会资本投入保护。

如何开发利用

记者所到之处，好多传统村落都在加紧修缮与改造。当“开发利用就是最好的保护”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时，如何避免不当或过度开发，无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又一难题。

火爆荧屏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带动了北京灵水村、浙江新叶古村等很多

传统村落的旅游人气。时任浙江省松阳县三都乡党委书记叶晓伟盼望着自己的村子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外面人进来了，能带动农家乐，推动村里经济发展。”叶晓伟说，通过开发能让百姓意识到，传统村落是宝贝，要保护好。

事实上，很多地方早已开始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搞开发。在松阳县四都乡，政府和开发商签订了协议，计划总投资1亿元开发民宿旅游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游客接待中心、高端民宿、生态餐厅、山地酒吧、高山水果采摘基地、高山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等。

乡村旅游、文化旅游方兴未艾。但专家担忧，商业资本以逐利为最大目的，商业开发只是把古村当作一种产业，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

“如果游客过量涌入，对村庄的自然环境会造成破坏，对村民生活造成影响。”黄山市城建设计院院长陈继腾认为，传统村落保护中要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做好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量。

如何满足村民需求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绝对不能排斥原住民。原住民走了，传统村落也就失去了灵魂。”时任松阳县县长王峻说。

然而，当前传统村落却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财富和机会引得年轻人外出打工或求学，有能力的人就把父母接走。

事实上，即使留下来的人，一旦有条件也急切地想搬出去或是改建新式楼房。“村民们不喜欢住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他们宁可去外面租房子、买房子。”叶晓伟说，可能古村从外面看有一种沧桑的美，但这不是原住民所认同的美，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美。

“传统村落保护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张大玉说，如何在保护中满足村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做好交通、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等工作。保护古村落，不是不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只有让老百姓住得舒服，他们才愿意留下。

粉墙黛瓦，将不只是在梦里

越是保存得好的古村落，交通越不发达，经济更落后，保护难度也越大。更多的人担心是，这些远离工业文明的“活化石”一旦被开发，有可能遭受“建设性破坏”。

新型城镇化下，面对日益空心化的农村，渴望改善居住环境的农民，如何在保护与开放中让古村落焕发新的生命力，记者在采访中透过一个个案例，寻找破题之路。

保护为先——转变观念是一堂社会大课

深山老宅，幽深溪水……村子依山而建，迭层递升，小溪流过村前，石板路遍布院落，随处可见的防御高墙、旗杆石、拴马树——这里是湖南省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的上堡村，曾经古苗王国的都城遗址，至今仍保留着 500 年前苗族起义的历史痕迹。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上堡村之所以能完整保留，和政府的引导有莫大的关系。在周围拆建一片的喧嚣声中，绥宁县县委书记唐渊说，我宁可发展慢一些也要把当地的传统村落保存下来！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国家传统村落最多的云南和贵州等地，经济和交通发展大都相对落后；而很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圈里、大城市周边，由于过多重视经济发展，保留下来的传统村落数量十分稀少。

工业文明与文化遗产，在新型城镇化下如何携手并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传承文化，保护传统村落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任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

2014 年 8 月和 9 月，住建部在杭州和成都分别组织全国千余名村镇干部进行培训。“保护古村落更多的是一场观念的变革，寻找文化的认同感，是全社会需要上的一堂大课。”担任培训讲师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罗德胤说。

记者调研发现，很多保护完好的传统村落，都在发展中践行了“保护为先”的理念。如古村落较多的安徽省，对村落分类确定保护等级。黟县的西递村、宏村，为了防火，保护措施甚至细到每幢古民居都配置了消防器材，更出台法律严惩非法买卖窗棂、雕梁等古建筑构件的行为。

“很多地方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理念不断提升。”赵晖告诉记者，在浙江松阳等地，当地政府不仅认识到保护传统村落是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更是松阳能够走出去的“软实力”和“活名片”。

多元投入——集中社会力量办大事

传统村落的保护必然要投入巨资，非一家一户力所能及。2014 年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列入保护名录的村落给予每村平均 300 万元的资金支持。“这是中央支持保护工作迈出的实质性一步。我们希望‘四两拨千斤’，全社会多元投入，加大保护长效机制建设。”赵晖说。

湖南省汝城县古村里至今仍保留着很多完整的祠堂、家庙，如土桥镇金山村就有 6 个祠堂。记者看到，在一座翻修完整的祠堂墙壁上记载了村民们自发捐助的资金，多的千元，少的几十元。

除了村民捐资，近些年，新时代的村中“乡贤”们也开始回馈家乡。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或回乡投资，或修建家园，改善着村落的面貌。

“过去乡贤非常多，从村庄走出去，回到村庄建设公共园林，供大家休闲娱乐，完全是开放的。现在，我们也需要在政策上鼓励这样的乡贤。”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张大玉说。

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中的核心——产权问题，安徽等地开始探索破题。来自北京的张崇军认保了黟县宏村镇茶行弄的一处清晚期的古民居，投入 120 多万元对古民

居进行了修缮，包括屋顶翻漏、承重梁更换、电路改造等，原来破败不堪、漏雨严重的老宅子，如今成了一处体验徽文化的好去处。

这得益于安徽省黄山市制定了《古民居原地保护利用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只要能很好地保护古民居，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在受让之后，可以办理古民居土地转让、房屋权属登记，解决产权问题。

“必须跟时间赛跑。”黄山市文化委总工程师胡荣荪说，急需打破古民居产权转让“瓶颈”，调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古民居保护利用。否则，再过3~5年，又将有一大批古民居永远消逝。据介绍，近5年来，私下交易获得古民居使用权的有200多户。

“与其让古民居私下里悄悄地买卖，不如光明正大地流转。”胡荣荪认为。

企业等外来投资者也成为村落保护中的重要力量。据胡荣荪介绍，徽派建筑保护开发的投资比例是1:6:3，其含义是在安徽古建筑保护的投资中，政府占10%，国有大中型企业占60%，民营和个体为30%。在黄山“百村千幢”工程投入的近50亿元资金中，政府拨款占近30%，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导的市场融资比例占70%以上。

产业发展——用新生活留住原居民

记者调研中还深深感到，要使古村落焕发新生命，关键还在于有产业支撑，使原住民认识到村落的价值，自信、自发地热爱、维护自己的家园。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曹昌智指出，目前，农村的环境设施比较差。保护传统村落，除了改善村子的环境和居住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培育新的产业，让村民增加收入，过上新生活。只有村民获取实际的经济效益，才能增加村庄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让村庄活起来。

黄山市城建设计院院长陈继腾说，传统村落保护最终目标还是人的和谐。例如，在西递宏村，原来搞开发也曾矛盾很多，后来村民在保护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收入、社会地位都好起来了，也越来越支持开发。

在桐庐，荻浦村的荷塘里种上了大片的九品香莲。这是当地从台湾地区引进的

品种，鲜花可以泡茶、煮汤，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胎盘素，还具有美容价值。在县城的高级酒店里，一朵花已经卖到了 88 元。

在歙县卖花渔村，村民们家家以制作盆栽为业，做得好的每年收入能达到 20 多万元。“我们村家家有手艺，除了上大学的，很少有人外出打工。”卖花渔村村支书洪定勇说。

时任浙江省松阳县县长王峻对保护传统村落有着美好的愿景：要通过农业的发展，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促使年轻人回归乡村。

“新型城镇化下，我们不能让乡村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而要从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中挖掘我们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审美理念、建造技艺和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智慧和优势，传承并弘扬，改进其不足，作为指导当代城乡建设的重要依据。”赵晖说。

住建部回应传统村落保护焦点问题

传统村落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个部门联合公布了新一批国家传统村落名单，由此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将从目前的 1561 个扩增至约 2500 个。

如何看待保护传统村落的意义？列入目录会得到什么保护？保护工作尚存哪些挑战和误区？记者专访了时任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回应社会关注的传统村落保护焦点问题。

传统村落保护上升至国家层面

记者：当前强调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意义何在？

赵晖：启动保护传统村落，是精神世界富裕起来的标志，是我国城乡建设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发展本质、生活本质等一系列价值观的丰富和提升。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急于现代化的倾向，导致视角变窄，过度聚焦经济发展、西方文明，以及城市的形态和文化。那些偏远的、传统的、较穷的村落往往被忽略，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

传统村落从被忽视、破坏到被重视、保护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设立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是村落保护的导向和号召，意味着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的视角更宽了，内心世界更有余量了，价值认识更完善了，更有文化自信了。

认定传统村落不是“给帽子”而是“找宝贝”

记者：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会得到怎样的保护？

赵晖：认定传统村落不是给“帽子”，而是为国家和民族找“宝贝”。对列入名录的村庄，目标是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投入，用3年时间使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对没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不是不保护，够不上国家级传统村落的，会指导地方建设省、市、县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最大的挑战是公众意识问题

记者：保护传统村落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赵晖：传统村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筑、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社会6个方面，目前保护利用工作存在一些偏差，偏重经济价值的开发利用。保护传统村落最大的挑战是公众的意识问题，表现在多方面。

一是社会认识不够。一些开发商或旅游公司过于追求经济价值，对传统村落过度开发；二是很多游客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不强，盲目猎奇和追求新鲜刺激，旅游公司则为了迎合游客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度开发；三是村民自身认识不足，长期经济落后导致文化自卑，认为自己的东西就是落后、需要抛弃的，城里的就是好的，为了追求所谓“好的”而对自身的遗产不珍惜，轻易丢弃、毁坏、改变；四是政府管理、指导力度不够，重开发，轻保护。

反对“博物馆式”的开发和过度商业化

记者：如何看待一些地方出现的“博物馆式”的开发？

赵晖：传统村落应该是活态保护，过度或不当开发都是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挑战。要避免传统村落成为博物馆中的摆设，坚决反对“博物馆式”的开发。

我们始终的提法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保护绝不是冻结，发展也绝不止于经济。保护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保护的途径。

记者：旅游开发是否是传统村落发展的主要出路？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赵晖：地方保护传统村落热衷于搞旅游，这是好事，但要坚持适度有序的原则。我们反对整村旅游开发和过度商业化。发展旅游、休闲度假等是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发展成教育基地、研究基地、文化艺术场所、现代农业、一村一品等也是很好的方式。

加强村落活态保护，就是保护原住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场所和方式。要严控商业开发面积，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干扰，更不得将村民整体或多数迁出，由商业企业统一承包经营，不得不加区分地将沿街传统民居改建成商铺。

核心是尊重村民意愿

记者：在保护传统村落的过程中，如何满足村民改善生活的需求？

赵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的期盼。保护传统村落，核心要尊重村民意愿，这是基本原则。这就要改变过去自上而下、一刀切的做法，与村民一起讨论保护方式，改进村落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提高生产生活品质。

对于村民希望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我们强调，传统民居等建筑形态上不要动，但内部可以完善生活功能，如原先厨房厕所条件很差的，可在外观不改变的基础上进行内部改造。同样地，在不破坏整村布局的前提下，也可以对村内道路进行修缮、导入供水、污水处理等设施。这样做既延续了传统风貌，又让原住村民能享受到卫生、舒适、方便的现代化生活。

认为“城镇化就是拆村庄建城市”是一种短视

记者：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拆掉农村，对此您怎么看？

赵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传承文化。对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传统村落是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民族的根，保护传统村落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避免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的错误趋向，避免农村失去特色、失去乡愁。

认为“城镇化就是拆了村庄建城市”的观点是城镇化中期容易出现的短视和片

面认识。中央方针很明确，就是坚持四化同步，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当前农村出现的“空心化”趋势，一种观点认为没什么人住，就该拆了、搬了，这是错误的。只要有人世代居住、有人在那里生产，我们就应该努力把那里的基础设施搞上去、把生活环境搞好。

过去我们盲目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建筑求洋求异，把很多城市的价值观带到了农村。新型城镇化下，不能让乡村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而要从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中挖掘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审美理念、建造技艺和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智慧和优势，传承并弘扬，改进其不足，作为指导当代城乡建设的重要依据。

谁来为古村“买单”

15年前，一部《那山那人那狗》的电影震撼了观众。大家都被影片中湘西南美丽的景色、淳朴的山里人、真挚的心感动。

15年后，记者再度到访那村——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这里的一切还如电影里展现的一样。村子依然淳朴美丽，但村民却依然贫穷。那山、那人、那狗，无不期待新的发展和变化。

大园古苗寨历史悠久，建筑独特，保存着元、明、清及近代窰子屋300多栋。走近一看，砖墙纵横间的大量细节凸显了传统苗寨的沧桑、古朴和神秘。村长杨小聪告诉记者，村子里每栋房屋都有记载年代的砖头，其中“福”“禄”“寿”“禧”四栋窰子屋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研究苗侗民族建筑的重要实物。

据文物部门考证，大园村的窰子屋大多数房龄在300年以上，最长已有850年。走进窰子屋，只见屋宇绵亘、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浑然一体。房屋之间，既有封火墙相隔，又有铜鼓石巷道纵横交错，栩栩如生的门饰和窗花，更让窰子屋格外靓丽。整个大园古苗寨就像一个古民居历史博物馆，透过它似乎可以看到几百年前村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整个古村落，倚山而建，傍水而筑。漫步在大园村，不禁想起《那山那人那狗》电影中的片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园村如今是全国历史文化名村、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除了山水美景，大园村依然保留着尊重祖先的传统文化。每逢岁末，五谷归仓，村里都要组织一二十场祭祖活动，纪念和缅怀自己的祖先，祈愿来年家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表示：“大园古苗寨的美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更弥足珍贵的是传承了苗族的传统文化。”

然而，在这些光环的背后，一些让人痛心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在古朴的窰子屋

群中，部分人乱拆乱建，破坏了古窰子屋的整体建筑风格。更重要的是，一些房屋因为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居住条件已明显恶化。记者跟着 63 岁的苏旭妹老人爬上阁楼看她的卧室，窗户很小，采光很少，没有风扇，夏天太热只能硬扛着。

虽然乱拆乱建不应该，但当地村民也表示了他们的无奈：窰子屋低矮潮湿，已不太适合居住，拆旧建新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此外，村落里一些院子已经杂草丛生，院落旁边垃圾成堆、臭气熏天……

缺乏资金修缮，也是窰子屋破败的重要原因。尽管当地民政、住建部门已对大园村 150 座窰子屋进行了修缮，但投入还远远不够。长久下去，这个有着独特历史风貌和浓厚人文氛围的苗寨古村落将会逐步废弃。

这样的无奈折射出我国传统村落应该如何保护的尴尬现实。在杨小聪看来，大园村一直没发展起来的原因主要是贫困，以及贫困背后的保护意识缺失。据介绍，大园村有 1219 人，其中符合低保条件的就有 800 余人，2013 年人均收入仅一千元左右。这并不是大院村民懒惰，而是受地域的影响，当地有一句顺口溜“天晴三天遭旱灾，下雨一天成涝灾，进屋一头猪菜一头柴，有女莫嫁大园来。”

“由于贫困，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园村的那山还是那山，那人还是那人，那狗还是那狗。”杨小聪喃喃着。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地感受到当地居民对村子发展的期盼。在他们看来，要切实保护好古村落和古民居，根本之策在于发展当地经济，让民众的口袋鼓起来，保护和传承古村落文化的意识才会增强。杨小聪表示，希望外界更多地关注古村落的保护，更多地关注大园村的发展，实现村落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离开大园村时，难忘村民们淳朴的笑容，期盼的眼神，那是对脱贫的期待，对发展的期待，对变化的期待。

三面残墙的启示

在广东河源市和平县林寨古村村口，立着一面火烧后的山形残墙，那是这个千年古村的历史记忆。

在长期跟踪古村落的福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鹰心中，武夷山下宋代古村中那一面面被村民拆掉的残墙，是心中抹不掉的伤痛。

而在时任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眼里，他曾在法国一处古村落遗址看到的一面“错误警示墙”，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从破坏到保护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历时两周的深入调研，记者在采访中或眼见，或听说的这三面残墙，从不同方面为传统村落保护勾勒了一幅立体画，让记者对刚刚起步的国内古村落保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千年古村林寨的那面古墙，带给记者的是因地方理念转变催生的希望。

当伴着中午的艳阳，车子抵达林寨村口时，这个拥有“全国最大四角楼古建筑群”的古村并没有给我带来想象中的“惊艳”，最先入眼的竟是两面火烧后的山形残墙。为何将已无法复原的残墙留在村口最显眼处？

看到记者疑惑的目光，随行参与林寨保护规划的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朱雪梅告诉记者，尊重历史也是一种保护。在林寨的保护规划中，这座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只剩几面断垣残墙的古建筑将会变成一个“遗址”，原样保存下来警示后人。

对历史多一份尊重，就是对民族记忆多一份守护。目前，林寨核心区2平方公

里内，保存较完好的客家四角楼有 24 座，平均每座占地超过 3000 平方米，更保留有古巷、古井、古墙、古道、古寺、古亭、古桥、古树等独特的“老八古”。

“以前的乡村是小桥流水人家，现在乡村是破碎化的乡村。如今拆掉剩下的东西不多了，保护更重要。”朱雪梅说。

与林寨被保留下来的残墙遗址相比，福建南平武夷山市的城村正在消失的那些残墙，更戳中曾留学日本研究建筑的张鹰教授的痛点。

这个源自宋代的古村至今仍保留有大量明清建筑。2010 年张鹰进村调查时还有 40 多座古建筑，当年一场洪灾令土墙泡水，部分墙体垮塌，一些村民趁机拆掉老房子改建新房。

“我这边为准备保护规划还在做测量，那边村民开始大拆大建。”张鹰说，房子的命运村民有权自己做主，自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村里剩下的古建筑到 2013 年年底变成 30 多座，2014 年又减到 20 多座，心痛难已只好放弃项目，但那种遗憾却每日不经而至。

其实，遗憾是有机会弥补的。赵晖给记者讲述了法国古村残墙的故事，那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启示。在当地的一处传统村落遗址，至今仍保留一处墙体遗址，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在古建筑外墙抹水泥砂浆错误做法的历史见证。旁边是纠正错误后复原的历史建筑。

赵晖说，很多人去欧洲旅游都赞叹那里的古堡保存完好，这个法国错误残墙遗址告诉我们，他们也曾走过弯路，但只要及时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弥补的。

“传统村落保护在各个国家都会经历‘发展—破坏—保护’的阶段，出现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赵晖说。

当前保护传统村落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尊重农民的意愿，如何满足农民想改善住房水平的愿望。在一些地方，这二者似乎成了矛盾。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因乡镇干部阻挠拆古宅引发的暴力冲突。

赵晖表示，目前国家倡导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方向，正是为了化解这两者之

间的矛盾。既不能将传统村落改造成博物院，也不能过度搞商业开发，核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对古建筑的修缮既要延续传统建筑风貌，又要提升房屋内部居住的舒适度。

连日的采访，记者深切感受到，传统村落保护在我国刚刚起步，需要一个改变社会认知的过程，既不能搞激进化运动，也要学会对传统村落保护多些呵护，多些支持，增加社会容忍度，最终带来全社会保护理念的改变，让传统文化在当下得以延续发展。

走访古村：那么美，那么痛

从深绿到浅灰，山的影子一层一层地淡了下去，山间有绿水蜿蜒，粼粼地反着光。2014年10月我们的车在山路上飞驰，从温州龙湾机场一路向西，终于来到了浙江省松阳县，由此开始了为期5天的传统村落调研之旅……

5天里，我们走访了浙西南以及皖南，地区的20多个村子。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此行的感受，只有6个字：那么美，那么痛。

青山环抱、绿水相间、空气清新、植物茂盛，记者走访的这些传统村落无一例外都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我们的祖先们对村庄的选址、布局颇为细致和讲究，其中暗含一套自成体系的自然观和审美观。古老的村子依山傍水，因山而厚实，因水而灵动。此等景致，对于常年身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来说，是如此地具有吸引力。

从松阳县城出来，在狭窄的山路上车行约8公里，就到了杨家堂村。一座环形山凹里，几十栋泥墙黑瓦的清代民居沿着山坡一级一级向上延伸，在视野中层层铺开，斑驳的黄泥墙在阳光下泛着迷人的光。

这是一座始建于清朝顺治年间的村庄。村子里，宗祠、社庙、古道、百年树龄的风水树、老房子里窗棂上的浮雕、墙上的壁书，处处篆刻着历史的痕迹，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在这里，重重青山仿佛将时间屏蔽，时光在古村中悄悄放缓了脚步。感受着千年历史沉淀的沧桑，人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安静下来。

大约2里地之外的西坑村更是一个好地方，同样是典型的高山阶梯式古村落。每当雨后或清晨，村后的大种山云雾蒸腾，坐落在半山腰的村子被笼罩在一层轻雾中，若隐若现。

葳蕤的植物、挺拔的山脉、原始的村落、古老的建筑、层层向上的梯田、缥缈的云雾，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这里成为摄影和绘画爱好者的钟情之地。

当地的古建保护专家告诉我们，在更偏僻的深山里，还有更美丽的村子。因为偏远贫穷，它们得以较少地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更好地保持了原貌。然而，也正是因为偏远贫穷，年久失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些村子正不可避免地衰败下来。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2002—2012年，全国在10年间减少了约9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含大量的传统村落。然而，“到此一游”的人们只是消费着眼前的美景，很少会关注景色背后的贫穷和衰败。

在我们走访的这些传统村落里，很多老房子都没人住了。年轻人外出打工或求学，留下的多是些老人。慢慢地，老房子没了人气，村子也寂寞下来。

走在山下阳村的石子路上，大雨毫无预兆地倾盆而下，我们狼狈地躲进了老乡家里。这是一间传统的老式住宅。从外面看，白墙黑瓦，是村落风景的一部分。进到里面，昏暗的灯光勾勒出的却是破败的轮廓。房子上下两层用几根竹竿搭着一块塑料布隔开，稍稍挡住了房顶渗漏的雨丝。

房子的女主人告诉我们，这是父母的家，她是家中独女，住在隔壁的镇子里。如今父母已经过世，她每年还是会过来住一段时间，是个念想。在老旧的客厅里，趁着昏黄的灯光，我看到墙上挂着两位老人的相片，笑容慈祥。

说起这些，女主人的表情一直淡淡的，我的心里却难过起来。城市化的历史命题之下，在工业文明中缺乏竞争力的传统乡村日益衰败。山下阳村的这座老屋，不正像那令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吗？

故乡是一个既忧伤又温暖的名字，儿时的村庄已然老迈，却珍藏着我最好的回忆。我对它念念不忘，却鲜少再回去。更有甚者，一些老村渐渐风化在历史的尘埃里，连残垣断壁都不可寻，人们想再回去寻根已是无望。

在城市里为求安身立命而劳碌奔波的人啊，有多少在唱着：“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那歌声里是人们无处安置的乡愁，是情感的缺失、精神的寂寞、文化的疼痛。

万里探访，不只是为了留住一抹乡愁

道路越来越难走，景色却越来越美。在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传统村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它们却因为“养在深闺”得以保持原有的面貌。

探访传统村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寻找桃花源的感觉。从城市出发，驱车6小时，翻山越岭，才到一个村落。

桃花源，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英雄志士心向往之，而探访身边的一个个传统村落，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兵分四路，近万里调研，记者得到片刻浅见。

传承农业文明

浙江省永嘉县的苍坡村，借自然山水融中国文房四宝于一体：长306米、宽2米的直街称“笔街”，对着村西笔架山；以两方池作“砚台”；砚台两旁搁置条石以为“墨”；村四周展开的3000亩平畴以为纸。这种布局，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生活，又寄托着先人天人合一、耕读传家的美好愿望。

湖南省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的上堡村，是古苗王国都城遗址所在地。村子依山而建，迭层递升，三纵五横的建筑格局，溪流过村前，石板路遍布院落。不仅保留了当年古苗王国留存的金銮殿遗址、忠勇祠遗址等，还保留了民族特有的习俗。这里的苗族每天开饭时，首先要舀起锅里的第一碗饭喂给自家的狗吃，每年新粮收获后，第一碗米饭也是敬奉给狗吃。祭狗、敬狗，在上千年农业文明中，人类和万物犹如血肉连体，休戚相关，共同应对各种挑战与灾难。

千姿百态的村庄，映照的是丰富多样的中华文明。这些村落是民族的宝贵遗产，反映着村落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今天，从北京到呼和浩特，从兰州到长沙，

工业化进程中俨然“千城一面”，如今再不重视保护传统村落，难道我们还要“千村一面”？

纾解乡愁之念

59岁的李小英，家在湖南省郴州市，一年却有大半时间呆在老家——郴州市苏仙区坵上镇坵上村。

城里窗明几净，喧嚣繁华，而村里条件简陋，古朴自然，李小英告诉记者，家里91岁的老母亲住惯了老房子，一天也不想离开。退休后的李小英就隔三差五回来照顾老母亲，一住就是个把月。

李小英说，尽管走进城市多年，可她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乡。一出门，就是青石板路，看得见山水、听得到鸟叫，挽挽袖子干干农活，她最幸福的事是还能伺候着老母亲，“有娘就有家啊”。

有娘有念想，有宗祠有祖先也有念想。在调研路上，记者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得不感慨这种念想的力量。一对何氏兄弟，在贵州教书多年，却整天听父辈们叨叨，“我们是桂阳人，毕生有个愿望，一定要回趟家”。为此，他们寒暑假到湖南省桂阳县走街串巷，寻找祖先的根，却怎么都没对上。

问得多了，有人就建议这哥俩到湖南汝城去找找。原来，汝城在古时也被称为“桂阳郡”。论起名字，还真和何氏家族挂上了，找对了！他们特意买了猪头、鸭、鹅去祠堂里祭拜。

落叶归根，追本溯源，人们就像不知疲倦的鱼一样，追逐于他乡，纾解于故乡。这样的乡愁与生俱来，假如当乡愁赖以生发和寄托的村落不复存在，我们岂不是成了“无源之鱼”？

守护心灵家园

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张大玉给记者讲了个故事。浙江省苍坡村，有李氏兄弟二人，和睦情亲至深。后因兄迁居方巷村，仍来往不绝。过去夜里走路不方便，兄弟

两人就相约，回到村子里就在高处挂一灯笼。后来，哥哥盖了“送弟阁”，“遥望嫡归”，而弟弟建了“望兄亭”，以慰思兄之情。

兄弟相望、邻里互助，古风、朴实，仍然在村落里得到延续。在记者走访的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大园村，也是电影《那人那山那狗》拍摄的村子，至今家家户户没有锁，甚至没有门，村长杨小聪说，村子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些表面看似普通平常，甚至不经意间被人忽略不计的细节，实际上却深蕴着民族传统的道德操守准则，既是村民对千百年来代以相继的习俗与风尚的高度自信，更是对自身精神家园的呵护与坚守，也是对开明有治社会的最高褒颂。

今天，大城市中邻里不相往来，行人路上摔倒，陌生人皆不敢搀扶，家族意识淡薄，文化传统与传承日趋弱化，我们该如何构建民族精神的家园，要在这里找找答案。

然而，桃花源毕竟只存在于理想中。记者在调研的同时发现，改善传统村落居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发展质量，仍然是当前保护传统村落的首要课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守住这片故土，为自己、为后代留下民族遗产。

人生何处不乡愁

古往今来，提起乡愁，每个人都能侃上几句。既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惆怅，又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还有“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的痴恋，更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大气。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更是妇孺皆知。习近平总书记最著名的一句，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4年下半年，记者正在做一组传统村落保护的调研，深入农村后也触摸到了浓浓的乡愁，真是感慨：天下何人不思家，人生何处不乡愁。

有娘便是家

坳上村是湘南的一个传统村落，村子有数百年历史，村子依山而建，清代建筑错落有致，青石板路回转折叠，清幽古井无声流淌。“养在深闺”的村子古朴又清纯。如今，很多人出去打工赚钱，在村子里居住的人并不多，另外，很多村民为改善生活盖了新房子，搬了出去，以前的老房子出现了空置，院子里长满了草。

一位 91 岁的老奶奶住在山腰上的老房子里，房子内部进行了简单的改造，简陋的家具、整洁的房间，看到笔者调研，问东问西，非常友好地邀请笔者去家里歇歇（多么朴实的老人家啊）。

一闲聊才发现，91 岁的她，耳不聋眼不花，还经常在家门口干些农活。家里还有位大姐，一问，59 岁了，叫李小英。原来，李大姐是老奶奶的女儿，之前一直在城里教书，几年前，她退休了，一头系着城里的家人，另一头系着在家里独居的老母亲。尽管城里房子窗明几净，基础设施都要好很多，但老母亲住惯了老房子，一天也不想离开。李大姐就隔三差五，回来照顾老母亲，一住就是个把个月。

李大姐说，尽管走进城市多年，可她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热爱的家乡。她的乡愁，在她余生可以守候的每一天里。一出门，就是小时候长大熟悉的青石板路，村外就能看得见山水、听得到鸟叫，一挽袖子干干农活，她还觉得，最幸福的事是还能伺候着老母亲。“有娘就有家啊”，这是李大姐反复对笔者讲的一句话。

李大姐的乡愁，是一株永远对着太阳灿烂盛开的向日葵，娘是她的太阳，家是她的太阳。娘在哪，家在哪。

死也要死在老房子

在坳上村转了半天，看到一处年代更古、更气派的房子，大家开玩笑说，这是过去大户人家住的。推门进去，发现已经没有人住，一边屋子里堆满了柴禾，另一边屋子里养着鸡鸭，过了一会儿，主人过来了，给笔者讲了一个更加伤感的故事。

55 岁的主人李大哥，世代都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也记不得这房子有多少年历史了。能记得的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们自小都在这里长大。湘南的屋子，外面是砖石结构，里面的头顶和天井却是木头结构，采光、取暖都很不方便。1998 年，家里就在这栋房子 20 米外的地方盖了两层小楼，亮亮堂堂、水泥地板，既不像以前房子漏雨、采光不便，又干净、舒适。然而，家里还时不时要打扫老屋子的院子，存些东西在这边。

李大哥的老父亲 2014 年 86 岁，身体渐渐不好，就像预感自己生命将要走到终点，2014 年 5 月 19 日老爷子坚持要求搬回老房子，全家人都大为不解，但孝顺的子女们就全家陪着老爷子在弄堂里一起住，照顾老爷子，十来天后，老爷子在老屋子里阖然长逝。

相距 20 米，不知道这算不算老爷子的乡愁。老爷子曾告诉儿子，就算死，也要死在老屋子里。李大哥说，父亲最后走得心满意足。

老爷子的乡愁，是一片执着飘舞的树叶，在生命凋零之际回到最原始的生命之根。生命会老去，乡愁不曾老去。

斗转星移的寻根

下面讲一个笔者调研路上听来的真实故事，这年代听到这种事，笔者真以为这仅仅是个故事，然而，这的确是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何志军讲的。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经济不发达，却保留着很多古朴、传统的民族文化。在汝城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祠堂家庙，时至今日，它们仍在使用中，不仅作为宗祠纪念祖先、红白喜事的场所，某种程度上还是村子里公共活动的场所。

曾几何时，汝城的何氏家族是个大家族。由于战乱原因，一部分何氏后人迁居到贵州。有一对兄弟在贵州教书，却整天听父辈们叨叨，“我们是桂阳人，毕生有个愿望，一定要回趟家”。这哥俩儿一合计，寒暑假就奔回湖南寻亲了。

可是，到湖南省桂阳县，这哥俩儿走街串巷，一村一庄地问，却怎么都没找到自己家的根。问得多了，有人就建议他们到汝城去问问。原来，汝城在古时也被称为“桂阳郡”。他们就去了，论起名字，还真和何氏家族挂上了，认祖归宗，找对门了！他们特意买了猪头、鸭、鹅去祠堂里祭拜，续写族谱。

这哥俩儿的乡愁，如一轮璀璨明月，照耀着执着的念想，丰富着百味的人生。

只不过为了一碗可口的面条

笔者小的时候，也做过留守儿童，在奶奶身边长过几年。那是北方典型的农村，黄澄澄的麦子做成了馍馍、大饼、面条，一天三顿饭全吃面食也不会生厌。

那时候，笔者最喜欢吃的，是奶奶做的燃面。和面和到劲道处，擀面，手切面条，上锅煮，盛碗，放上特制的一点面酱，葱花、辣椒，热油一浇，醋、蒜一拌，奶奶独家炮制的燃面就新鲜出炉了。吃上一碗，再喝上一碗煮面条的汤汁，肚皮暖烘烘的，顿时觉得世上最好吃的莫过于此。

然而，生活总是在前进，带给你想要的，以及你不想要的。今天的笔者，已经面条、米饭、饺子、米线、米粉、杂粮，任何食物来之不拒，在遍尝各种美味佳肴

后，回忆的却还只是一碗面。

于是乎，在北京街头，笔者遍尝炸酱面、牛肉面、西红柿鸡蛋面、卤面、意大利粉……像个疯子一样，吃完面感觉不满足，又接着找面，吃了之后，又发现不是自己想找的味道。这日子，每天就像一个循环，找面、吃面、不对、找面、吃面、像了、还不对……

突然发现，原来活着这么多年就是一直想找一种自己想要的味道。乡愁，原来是记忆中怀念的千万种味道，直到百味尽失，生命尽头，惆怅、思念才会渐渐消散。

休假放假，建议大家多回老家看看，发展这么快，不再看以前的味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这天下有忙不完的事，但有机会去排解乡愁都是幸福的。如果你的乡愁无处排解又深入骨髓，记者只好送你一句更大气的话：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处不故乡。

留住乡亲，留住乡愁

中央文件中一句“记得住乡愁”，勾起多少人的乡土记忆、亲情回味！由此，“保卫乡村，留住乡愁”，成为行进在工业化、城镇化快车道上的中国面对的一个紧迫话题。

乡愁是青山绿水、明月繁星，更是难以割舍的亲情。保护传统村落不是保护遗址，栖居于其中的乡亲们才是那里的魂和魄。离开原住村民，传统村落就失去了活传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美景就会成为“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的荒凉。保护传统村落，核心是保护村落里的居民，尊重他们的意愿，维护他们的权利，使他们不仅愿意留住在村落里，而且愿为保护村落风貌文化贡献力量。

村民是创造村落历史的主体。由于谋生需要或缺少文化自觉，村民可能有破坏村落的行为，但归根结底，他们比任何外来力量都热爱自己的家乡，是保护传统村落最可靠、最应依靠的主体。农村建设中外来力量大拆大建、赶村民上楼等，是喧宾夺主甚至反客为主，是对村民权利的粗暴侵犯。

保护传统村落必须依法进行。我国法律明确了村民的村落合法所有人地位，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法制保障。正在推动的城乡统一不动产登记，就是要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这对于发挥村民保护传统村落的积极性，将起到促进作用。

保护传统村落，关键是要让村民从被动保护转变为自觉保护。这个自觉过程首先是明确村民作为自己村落家屋权利人地位的过程，也是村民物质生活改善和

精神生活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让村民切切实实地感到，保护村落就是自家的事。正如《马丘比丘宣言》所强调的，古村文化保护是为了使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适应的生活建设过程，而不仅是修缮物质载体——古村落、老建筑的过程。有村落无村民，有文物没文化，这样的结局必须避免。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要防止二次破坏”

被称为中国“村落保护第一人”、身为作家的他常年四处奔波，为抢救文化遗产进行实地调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常常焦灼地对种种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发出尖锐批评。他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一个将保护传统村落融入血脉的人。“村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保护传统村落，留住的不是个人的‘乡愁’，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乡愁’。”他说。

防止过度开发造成二次破坏

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是冯骥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旅游开发对这些村落造成的二次破坏。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首批公布的保护名录中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鸡鸣驿村就受到了旅游开发不当的威胁。外人入村要买门票，村里的主街道两侧开设了多家古玩店、玉器店，众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都上了锁，专供收费参观，极大破坏了村落的原有风貌与村民的生活状态。

冯骥才坦言，一个地区的经济有兴衰，但唯有文化是永远攥在手中不变的王牌，是永恒的资源。这资源既是经济的，更是精神的。如果拿它换眼前几个小钱，失去的只能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东西——精神。地域精神、人文传统、乡土情感与亲和力，这些东西一旦失去，多少钱也买不回来。

“适当开发有必要，但要有度。”冯骥才强调，为了避免过度开发造成二次破坏，对传统村落应一村一规划，发展规划要与保护规划统一。

资金和村民意识是两大难题

谈到保护工作中的困难，冯骥才讲，总体而言，促进传统村落发展，保护文化资源不丧失，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缺乏资金，二是村民的保护意识不足。对已经进入保护名录的村子，他认为重点是改善居民的生活，让他们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能在当地获得生活来源，愿意继续住在村子里，而这需要大量资金。他说，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光靠政府是肯定不够的，各地的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和民间组织也应参与进来。

关于村民的保护意识，冯骥才相信要依靠文化普及，让村民认识到这些村落的价值，知道为什么要保护，因为谁的自觉也不如文化主人的自觉。

他指出，文化自觉建立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二是国家的自觉，是决策性、战略性的，很关键；三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是执行的关键；最后要达到全民的文化自觉，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城镇化不等于放松新农村建设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民族之根深地扎在农村。无论从它的规模、内涵还是价值来讲，中国古村落都是一个最大的文化遗产”。冯骥才话锋一转，说：“我不反对城镇化，相反还很赞成，但要有度，不能一味地图快。”

冯骥才也承认，一些村落的消亡不可避免，“但那些有价值的村落一定要保护和保留。城镇化不能‘摊大饼’，不能盲目发展，更不能裹挟新农村建设，而要与之相得益彰，和谐发展。”

冯骥才说，为了更好地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寻得到“乡愁”，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已经全面铺开。

要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性破坏”

冯骥才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需要全民的自知、自觉、自省外，第一保护人就是政府。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是看领导者的文化意识。政府既可以成为文化遗产最大的保护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因此，政府官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对文化失职，更不能失语，要有文化责任和眼光。”他说。

他还指出，普查完后，要确定古村落的发展规划，同时要避免类似城市的“规划性破坏”。要考虑村落的历史形象、文化形态和独特性，融入农村的建设中。当然，还要建设新的乡村文化生活，包括构筑现代的文化设施、开发旅游等，要统一考虑、相互协调，不要对立，更不能“除旧更新”。

“痴人教授” 胡彬彬：“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

他热爱家乡，热爱乡村，然而，现在他最怕的是再回家乡。

在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的梦里，故乡湖南省双峰县印塘乡花家村是花乡，一年四季都是花的海洋，有祖先留下的老院子，然而，如今很多院子已是杂草丛生、断壁残垣。

“我的家乡已经破败了，可是我不想民族的家园也断壁残垣！”他的这番话痛彻心扉。

执着

55 岁的胡彬彬早在 30 年前就对传统村落、乡土文化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那时，他是公务员，经常下乡调研，一有空就游离在乡野。

内心中的一个信念一直让他魂牵梦绕。

从小在农村识字，背的是中医里的《汤头歌》。“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潜移默化地教了我们很多，这些财富不能乱丢！”他感叹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记载在历史文献上，更鲜活地遗存在祖国大地的传统村落中。”

“就拿民居来说，布局、形态乃至细节都精雕细琢，这既是农村匠人的劳动，更体现了人们热爱生活的理念。先民们把生活过得这么有滋有味！”他赞叹。

2001 年，胡彬彬从公务员队伍来到高校，干上了情系一生的事。他不坐在书斋里论述考证，而是用脚丈量乡间大地。

在他眼中，村落中不仅有原生居民的生活形态和建筑之美，更有中华民族传承

千年、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村落是一种载体，它把国家、民族、个人都联系在一起，凝聚在共同的核心价值下，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他解释，国家是由一定地域和一定人口构成的社会单元，是放大的村落。村落是人们在农耕时代聚集形成的社会单元，是缩小了的国家。

这些年，他一直奔走在乡间路上，对村落进行田野考察、数据采集与学术研究，考察行程可以绕地球3圈。

在湖南，2002年行政区划改制前有3337个乡镇，他双脚走过的有2731个。在全国，他寻访了4300多个传统村落，北至黑龙江省黑河四嘉子村，西至新疆乌恰县的吉根镇托阔依巴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的南湾村。

八上西藏，七上云南，在村落里一呆就是一个月。一次，为了寻找物证拍摄资料，他掉进了离地七八米高的古坑里，本能地大声呼救，喊破了嗓子才知道这里杳无人烟。饥寒交迫的他躺了两夜三天，才被侗族猎人救出来。

“13年中有9年春节我是在村里和老乡一起过的，下乡坐拖拉机太久，肛裂没法走路了。这些都不是苦。最苦的是，对传统村落的破坏，对民族文化的漠视，让我心痛！”

斗争

很多人认为，胡彬彬就是个“疯子”！他把事业看得比命还重！

做他的学生很辛苦。寒暑假他把学生派到村落山野中，调研房屋建筑、土地耕种、人口情况等，六七年后他再派出一批学生，回访同一个村落发生什么变化、有何影响……

“我做的不仅是历史研究，而且是要研究村落如何传承，能为今天的发展带来什么借鉴。”他说，“然而，越研究越痛心！”

吴灿是他的博士生，2014年春节到湘南村落里调研。当地出台了一项政策，建新房必须拆旧房，村民们一哄而上，大拆当地很有特色的碉楼建筑。吴灿急了，慌忙给他打电话。“我找市里领导通电话很久，这些建筑拆掉就没有了啊！”回忆起争执，他仍然情绪激动。

这些年，他承认生了不少的“气”。

他被誉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拓荒者”。一家报纸专门为他开设专栏。可渐渐地，他觉得再也不能写了。

原来，下乡时他惊奇地发现，由于文章推介了某村，当地政府迅速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本来村民房子出现小窟窿，可以自己添砖加瓦“缝缝补补”，可一旦成了文物，房子不能自己修，要层层上报，等报批下来，那窟窿越变越大，维修成本陡然加大。村民干脆不修了，搬出去了。可这房子一旦没有人住，三年就毁了！

让他更痛、更纠结的还有很多。

大学教授、政协委员的身份，让他尝试游说当地官员。可每次好不容易说服一届领导，伴随着人事变动，新一届领导又面临政绩考核，好多村落就在拆建中消亡了。

“你使尽全身的力气，然后眼睁睁看到它被人毁坏，而且没有力量反抗。”他长叹。

1981—1999年，他32次去凤凰，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纯情、美丽，养在深闺”的凤凰，被过度商业化践踏着。这样的悲剧正在重复上演。他推介村落后，当地迅速将农民迁徙出来，将其变成旅游景点，大规模进行商业化开发。

“推介它们，是不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他再次长叹。

坚守

令他欣慰的是，这些年很多村民打电话、写信给他，鼓励他干下去。他们送他一个绰号：“村长教授”。

坚守多年后，他的团队在中南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并在这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培养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与保护专门人才的博士点、硕士点，是一个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保护双重职责的研究机构。

“能看到这项研究步入国家人文学科的殿堂，我死也瞑目了！”他说。

记者下乡调研村落以后对他回访。刚做完声带手术躺在病床上的他不能说话，但看到记者拍到的村落实景照片，眼神里透露出的欣喜和忧伤令人动容。

“你去的这片村落，每一寸土地我都熟悉。有的村，连村民家里养了几条狗、几只鸡，我都知道。但是，你只看到现在，却不知道它之前更美。”他在纸上写道。

“30年来，我由爱到深爱。以前人们根本不理解我，认为村落能有什么学问，有什么好保护的，那时我几乎绝望，但是渐渐发现一抹曙光，因为不论是从习总书记‘望得见乡愁’，还是中央一号文件对村落保护作出部署，我感觉天亮了！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他接着写道。

“干了大半辈子，终于赶上了好时候，我想在5年内建个中国传统村落的数据库。要快点，否则就来不及了！”

“保护村落，更要深挖保护好民族文化。中国的基层文化主要在农村。城镇化要真正关心农民。农民进城，生活得好不好，教育情况怎样，精神状态如何，有没有保障，要多为他们鼓与呼啊！”

.....

这次回访，他虽口不能言，却写满了12页纸的回答。

都云写者痴，谁解其中味？

守望“金名片”

导言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

▮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进入“全面保护”新阶段

李 斌 孔祥鑫 张漫子

▮ “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

李 斌 孔祥鑫 张漫子 罗晓光

▮ “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政治账”

李 斌 孔祥鑫 张漫子 罗晓光

▮ 496 米的传承与创新

李 斌 张漫子 孔祥鑫

▮ 让传统技艺的瑰宝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

李 斌 张漫子 孔祥鑫

▮ “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

李 斌 孔祥鑫 张漫子

▮ 对话故宫博物院“掌门人”单霁翔

李 斌 罗晓光 孔祥鑫 张漫子

导言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

2014年2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北京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在许多业内专家看来，将北京作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提出来，这在历史上没有过。

伴随着“金名片”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政府部门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重大项目资金不足、社会资本积极性不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等现实问题。

打造好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不应用简单的经济学眼光去看问题，应该算大账、算远账，算好文化账和政治账。

正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所说：“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而言，投入上看你是算今天的账还是算明天的账？如果只算今天就赔死了。就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我们曾经视‘财富’为包袱。所以才一方面保护维修抢救，另一方面城市古都风貌的破坏也在加剧。”著名文物专家、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说，名城保护要更新观念，保护也是发展，恢复北京旧城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他建议把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情况纳入北京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中。

把历史文化遗产提升至“金名片”的高度至今依然让许多业内人士兴奋不已。从初步认识，到局部探索，再到整体布局，“金名片”的保护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也许，读懂“金名片”里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了认识的问题，投入问题和融资问题也就不再是个问题。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进入“全面保护”新阶段

2017年3月举行的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传递出强烈信号：北京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加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

“把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上升到‘金名片’的高度，从来没有过。”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说。

在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王宁表示，北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文物工作认识立足点，精心打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这张“金名片”。

建城3000多年、建都800多年的北京，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2016年6月，北京市发布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意见，提出了“全面保护”的理念：构建全面保护格局，完善全面保护机制。

“全面保护就是要分层次、分类型、分时间、分地域地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所有历史文化要素，塑造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大国首都。”时任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王飞说。

时任北京市市长蔡奇就北京城市中轴线保护和申遗工作进行调研。他表示，要统筹保护好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提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水平。

面向未来，北京将恢复“一轴一线”魅力景观，加强老城整体保护，加快实施故宫、天坛、钟鼓楼等地区传统风貌的保护，加强“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保护利用，编制实施长城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和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规划。

作为北京老城主体，东城区未来将打造南锣鼓巷、东四三条至八条等 6 片传统文化精华区，到 2020 年，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修缮更新整治率将达到 80%；西城区将力争实现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特别是纳入文物登记的会馆和名人故居的腾退亮相。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国家文物局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冬奥会文物保护、文物保护项目立项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北京文物工作的支持力度。

尽管取得成效，北京“金名片”的保护在认识高度、资金筹措、政策制定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

“金名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名片，应下更大决心对 62.5 平方公里旧城进行整体保护、整体修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说。

“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2014年2月和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北京，都提出了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的要求。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保护得怎么样？新华社记者带着问题走进胡同深处……

“历史和现代交织融合，这才是北京城”

“还有别的户型吗？”黄昏时分，南锣鼓巷地区四条胡同修缮整治项目现场指挥部院子里，一位有腾退意向的青年女子在一块展板前察看一种户型后又问。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完整保存着元大都“里坊制”胡同肌理，是北京市首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为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北京2015年全面启动南锣鼓巷地区福祥、蓑衣、雨儿、帽儿四条胡同的修缮整治工作，对居民实行腾退自愿申请制度。

一方面腾退，一方面修缮，重新对外开放的南锣鼓巷，有文化内涵的商铺多了，京味儿更浓了。

南锣鼓巷的修缮和整治，是北京加强保护“金名片”的缩影。近些年，尤其是

近3年来，北京积极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核心区风貌保护和升级改造之路：大高玄殿、景山寿皇殿等文物建筑得到修缮，历代帝王庙、孔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社会开放，南中轴路、明城墙等遗址基本恢复历史风貌、建成遗址公园……

清理簋街上万平方米违规超大广告牌匾，腾退天坛周边57栋简易楼的2000多户居民……2014—2016年，作为老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市东城区全力展现首都历史文化“金名片”。

“仅2015年市里财政和发展改革委就给了103亿元，用于腾退、整治、修缮、环境提升，历史上没有过。”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张家明说。

大栅栏，年初落成的“北京坊”建筑集群格外引人注目。

一主街、三广场、多胡同……集文物保护与新型业态开发于一体，“北京坊”成为以百年劝业场和谦祥益、交通银行旧址等8栋沿街集群建筑为中心的“中国式生活体验区”。

“历史和现代交织融合，这才是北京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说。

“塑造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大国首都”

“这几年我们招收了大学生，弥补人员不足，还建立了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北京市珐琅厂董事长衣福成说。

北京历史积淀丰厚。数据显示，昆曲、京剧、古琴艺术等10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达126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达82位……

“古都风貌包括硬件和软件，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一不可。景泰蓝等‘燕京八绝’，京剧、昆曲，都是‘金名片’。”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微说。

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十三五”时期，北京提出了建设长城、西山、大运河三个文化带的工作目标。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说，三个文化带的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订，实施后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将有助于打通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为构建北京古都风貌全面保护的基本格局奠定基础。

“全面保护就是要分层次、分类型、分时间、分地域地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所有历史文化要素，弘扬与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大国首都。”时任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王飞说。

从保护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到凸显“凸”字形城郭与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郭构成的独特城市格局，再到恢复北京特有的“胡同一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北京计划从10个方面强化旧城整体保护。

1092座古墓、一座潮县汉代古城、万余件文物……2016年11月底，北京城市副中心文物保护与考古新发现为北京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增添新亮色。

“我们将重点建设东部运河文化带项目，串联通州、张家湾、潮县三座古城，实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统一。”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的杨根萌说。

朝着世界文化名城的宏伟目标迈进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的热播到“故宫萌娃娃”一年卖出10亿元，从扩大对公众开放面积到打造全新的故宫文化创意体验馆，近年来，快“600岁”的故宫，屡屡成为新闻焦点。

“只有传承、保护和利用好故宫博物院的文化遗产资源，将更多精彩的文化成果奉献给广大社会公众，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活起来’，才能无愧‘金名片’的美誉，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交给下一个600年。”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作为老城的主要组成部分，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纷纷行动起来：

2016年12月初，东城区发布实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等三大行动计划，预计总投资1662亿元，实施33项行动、115个具体项目，打造南锣鼓巷、雍和宫—国子监等6片历史文化精华区。到2020年，东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修缮更新整治率将达80%。

“未来5年，我们将对全区43%的用地空间进行整治式更新改造，整治胡同环

境，调整商业业态，优化停车管理，最终让胡同回归宁静，让历史融入生活。”张家明说。

据统计，西城区 363 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存在安全隐患的占 46%。为保护好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尤其是会馆和名人故居，西城区已基本完成康有为、沈家本等故居的腾退，东莞会馆已有部分居民实现腾退。

“我们计划投入 190 亿元，用 5 年左右时间使一批重大文物建筑特别是纳入文物登记的会馆和名人故居实现腾退亮相。”西城区区委书记卢映川说。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展现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独特城市魅力，让中华文明的这张‘金名片’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2016 年，《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发布，提出了总体目标：推动北京朝着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文脉标志的宏伟目标迈进。

“放眼世界，要认识到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整治好、发展好，是最有现实意义的，是中国最大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枢纽工程’”“期望未来的北京像一簇永葆青春魅力的盛开花朵，有绿叶相持，花朵的‘花心’就是姿态焕发的旧城”……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先生多年前的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政治账”

近年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进入了“全面保护”的新阶段。记者调研发现，这张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的铸造，还有一些焦点问题急需进一步重视和解决。

认识问题：“必须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中去衡量”

“将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金名片’提出来，这在历史上没有过。”回首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至今仍对“金名片”的提法感到十分振奋。

“从初步认识到局部探索再到整体布局，‘金名片’的保护历经文物保护、名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3 个阶段。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孔繁峙说。

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没有干涸、没有断流的文明。留住文化根脉，才能守住民族之魂。

“必须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维度中去衡量，才能更加准确理解‘金名片’的含义，才能理解它的独一无二性。”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王玮认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城市发展史。站在世界的角度，中轴线贯穿、棋盘格状的城市格局，以及胡同肌理，同样举世无双。”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看来，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应该上升到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高度，“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底蕴。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特色，历史文化是最鲜明的标签。”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呼吁，必须“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合力问题：尚需进一步调动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

“金名片”的“含金量”，突出体现在文化价值上。

“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有 100 多个，但北京的文化含量在于它是多朝古都，其作为世界著名都城，展现出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与城市整体构成了熠熠发光的‘金名片’。”孔繁峙认为。

“此前，我们的城市规划缺乏一种文化规划视角，而基于这一视角的适宜性开发原则更有助于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这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说。

然而，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虽然近年来北京在旧城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从整体来看旧城风貌仍大有潜力可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任务仍很艰巨。

从文保院落腾退、修缮与合理利用，到地下文物保护；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到优秀近现代建筑与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专家指出，虽经多年探索，一项项名城保护的具体工作尚需进一步调动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参与名城保护的合力。

“历史资源是财富，不是包袱。我们此前一直视‘财富’为包袱，所以尽管进行了保护维修抢救，但城市古都风貌的破坏却在加剧。”孔繁峙说，名城保护要更新观念：保护也是发展，恢复北京旧城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回归。

投入问题：“不仅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远账”

投入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认识上的一种折射。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而言，投入上看你是算今天的账还是算明天的账，如果只算今天的账就赔死了。”王凯说，“对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中华文明‘金名片’的保护，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文化账、政治账；不仅要算小账，更要算大账、

远账。”

根据“十三五”期间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2016年，在文物及历史名城保护工作方面，北京修订了文物资金管理办法，开展主题性文物修缮，加大对核心区、“一轴一线”“三大文化带”等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了相关财政管理体制。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自2012年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文物及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项资金”，每年投入10亿元，支持市属和区县文物保护项目。

“经过几年努力，北京具备条件的文物保护单位，大都得到了修缮。”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说，这笔资金更多投入了文物保护与修缮工作中，用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资金明显匮乏。

让旧城焕发生机，关键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为进一步传承和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市文化局近几年每年投入1亿多元，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意识普遍在增强，保护水平普遍在提高。”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微说，“总体来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的程度还不够，投入仍有欠缺。非遗的保护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如果把所有的投入加在一起，资金盘子将十分可观。”

机制问题：“一些地方或部门仍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局面”

除了原有的老住户，这条街陆续搬来了一些很有设计感的小店……地处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经过多年的有机更新，已经成为北京一条有名的文化街。

“怎么道路又翻开了？你们能不能管一下？”前些日子，杨梅竹斜街上，不知哪个部门又翻开了道路进行施工，这让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济安堂王回回狗皮膏药的第21代传人王秀仁忍不住了，她告诉前来探望的北京广安控股大栅栏琉璃厂文化发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贾蓉。

“在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或部门仍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局面，且存在权责不明或执法不严等现象。”时任北京规划国土委副主任王飞说，目前已有的政策、机制、法规还不能满足名城保护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需求。

“目前文物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合理占用问题，有的是居民占用、私搭乱建严重，有的是多家单位占用、责任不清，保护修缮难以落实。”北京市东城区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写道。

“城市空间的改造是在多方利益的纠葛中前行的。责任单位应立足长远，以城市的品牌增值作为考量出发点，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角度谋划长远发展。”秦红岭说。

整体问题：“‘金名片’应该是一张完整的名片”

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正如吴良镛先生多年前所说，北京的新城建设好了，形成首都新景，是首都的光荣，但仅此还不能完全形成大器。“新城”“副中心”建设好了，代替不了旧城。

历史城区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文脉之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有半数以上属于历史城区或历史地段。从罗马到伦敦，从巴黎到斯德哥尔摩，历史城区既保持着完整的历史风貌，又具有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圣地。

建筑师吴晨认为，进行城市复兴，一大难点在于旧城存在相当一部分社会问题需要总体统筹和兼顾社会公平，考虑居民权益、文化遗产、物质空间的宜人舒适、基础设施的更新与改善，并在使用上符合现代商业的需求。

北京历史城区又称北京旧城，面积约 62.5 平方公里。“‘金名片’应该是一张完整的名片，应该涵盖旧城的全部。”王凯说，这也是北京历史文化整体价值的体现。

单霁翔曾提交《关于抓住首都功能疏解契机加强历史城区保护的提案》，建议坚持“四个中心”的城市性质，突出首都核心功能在历史城区中的地位，完善中央行政区在历史城区中的空间组织，进一步合并历史城区内的行政区，缓解城市建设带来的发展压力，减少历史城区功能混杂带来的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496 米的传承与创新

说起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自然离不开胡同。

记者数次走进前门附近一条近年来获得有机更新、软性生长的胡同——大栅栏地区的杨梅竹斜街，探寻究竟。

作为贯通大栅栏、琉璃厂两大文保区的连接线，只有 496 米长的杨梅竹斜街将两条“岁数”加起来超过千年的老街合璧，使其历史风貌一气贯通，成为一条颇具风格的步行街。

这里曾经书局林立，近现代引领国人追求新知的许多书籍诞生于此；诸多文化名流也曾在这儿留下足迹，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鲁迅、杨小楼等或寓居街内，或成为往来常客；旧京四大商场之首的青云阁坐落街边，世界书局、中正书局、开明书局、环球书局等旧址与老北京“八大楼”之一的泰丰楼旧址也在这里。

6 年间，杨梅竹斜街经历了一场旧城改造计划。政府主导与市场运行、保护历史与复兴文化、内生驱动与开放跨界就发生在这短短的 496 米中，这些新兴的词汇也成为大栅栏软性更新计划的关键词。

本着自愿腾退的原则，1711 户原住民中有 718 户选择了迁出，留下的近千户居民散落在各式大杂院中。迁出后的老房子，由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进行规划改造，变“成片整体搬迁、重新规划建设”为“区域系统考虑、微循环有机更新”，对院落、街巷进行有效的节点簇式改造，不同节点的改造形成节点簇、逐步再连成片。

引入燃气、电力电信架空线入地、修缮名人故居和会馆、铺设老砖瓦步道、复原旧时风貌……在杨梅竹斜街保护修缮的过程中，北京市西城区废除了“危改带开

发”的拆迁模式，遵循“真实性保护”原则，将胡同原住民连同建筑一起保留，让胡同原有的韵味得以传承。

景观构筑物、城市小品、景观灯具、垃圾箱、座椅……杨梅竹斜街对各种不同历史文化及景观元素进行排列组合、设计改造，把历史记忆编入景观当中，在保持斜街原汁原味特色的同时注入新的活力。

进入杨梅竹斜街数十米，有一家名为济安斋的小店，它既带有杨梅竹斜街的历史基因，又是更新计划的新生成品。小店主人王秀仁说，她本是济安堂王回回狗皮膏药第21代传人，400多年前，王家就在杨梅竹斜街109号开药铺，在后院用祖传秘方制作狗皮膏药。

10多年前，王家在药铺原址开店售卖医药类书刊和文具，但生意不是很好。在杨梅竹斜街进行更新改造的同时，王家将普通的书店改造成有文创气息的书吧，用来售卖咖啡、饮品、简餐和明信片，同时建了一个小型家庭博物馆，展示老祖宗用来制药的器材等。

走出济安斋，能看到原住民的居所与设计室、文创商店有机融合而成的院子。大栅栏琉璃厂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留下来的原住民，西城区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合并聚居的平移办法，也就是把零散留在大杂院中的居民，合并到一处院落居住；富余出的地方，一部分建设便民菜站、公厕等公共设施，另外多座院落则引进以文化创意为主的商业，如设计师的工作室、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等。通过设计，本地元素、本地居民跟当代生活方式结合，成为社区复兴的内生动力。

不同时期的建筑混合并置，留下不同的时代记忆，是杨梅竹斜街的一大特色。

2014年，诗人、古籍收藏家姜寻被杨梅竹斜街的民国建筑风格深深吸引，在这里创办起模范书局，决心将历史文脉传承下去。

“我们选择的书，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艺术类书籍以及一些古籍。”姜寻介绍，做出版十几年，积累了不少自己设计和出版的书籍。书店二楼则收藏了徐志摩、鲁迅等人的民国初版书，以及《浮世绘聚花》《世界美术全集》《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等大部头艺术类图书。

作为一家与雕版印刷有密切关联的书店，模范书局的文创产品也与书店特色紧

密相连。开店之初，姜寻便亲自设计了“文字魔方”、皮质的手工笔记本。他还推出了莫言的《大风》线装书，从雕版刊刻、木板水印到装订，全部以中国古法手工完成。

“有历史的东西才是厚重的。走在这里，就仿佛走在过去的时光里。”姜寻说。

老建筑，新利用。给四合院的老房子装个内胆，摇身一变成了实用的“内盒院”；植入微型艺术馆和图书馆，大杂院变身“微杂院”……设计师们在这里各展神通，使人们看到了历史街区有机更新的更多可能。

“这里的手工艺人们，有些出生在这里，有些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只为专心钻研自己的一门手艺。”北京广安控股大栅栏琉璃厂文化发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贾蓉说，大栅栏还搭建了开放平台，吸引艺术设计资源，扶植提升本土手工艺再生。

以民为本，有机更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杨梅竹斜街温和、理性的探索，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可，成为大栅栏地区的标志性街区之一，大栅栏也因此被评为“全球18个前途无量的设计街区”。

“金名片既然是金的，自然成色要高。打造是一个方面，内容更重要。”西城区北京大栅栏琉璃厂建设指挥部党组书记王志忠说。

让传统技艺的瑰宝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

带树杈的黎族竹管、鹰骨做的藏族鹰笛、低音笙、低音唢呐、明代小管……数百样从“太爷爷”辈儿传下来的手工乐器，挤满了“宏音斋”第四代女传人吴景馨在京西紫竹深处的家。

眼看乐器越来越多，为保证音准、不搬动物件，吴景馨和弟弟竟搬出去租房住，家于是成了民族乐器的“陈列室”。“打磨一件民族乐器、传习一种技艺需凝聚几代人的智慧与心血。我得踏踏实实地把清宫廷乐器制作技艺完整地传下去，其他一切都为技艺传承让路。”

像吴景馨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北京有很多。

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北京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需要继承和保护的，除了有形的文物、古建、人类文化遗址等物质历史遗产之外，还有灿烂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聚拢而成的人文氛围。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及传承人都集中在北京，他们参与构成了首都深邃独特的文化底蕴。”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庞微说。

20 世纪 80 年代，打算赴美的吴景馨并不知道，她 27 岁后的人生要跟笙管技艺传承紧紧地绑在一起。

创办于清朝末期的“宏音斋”历经发展，成为一家中国民族乐器的百年老店。它是中国第一支标准唢呐、第一支插口笛子、第一支加键唢呐等乐器的“诞生地”，弥补了民族管弦乐队低音声部的空白。2011 年，“宏音斋”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昌平区传习坊的车间里，吴景馨拿起一片刚制作好的生簧片对记者说，一支

乐器的研发和制作需要严苛的工艺。拿一支笙管举例，制作时不仅要经历选竹、烘干、打磨、抛光、蒸煮、灌蜡等几十道工序，还要忍受校直时的烘烤、抛光时的灰尘、上蜡时的异味等考验。单是抢一片簧片就需要几十刀、上百刀。“如果多铲一刀或少铲一刀，在你演奏时，技巧就反映不出来。”

“宏音斋”乐器的用料多为精选的竹子和进口的红木、乌木、紫檀木。为了买上好的原材料，她曾收过古旧家具，和丈夫坐几天的火车去云南、缅甸收购木材。

吴景馨还带领“宏音斋”复活了敦煌仿唐管乐器等古乐器，将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乐器演奏家请到“宏音斋”，为他们录制音像资料。她还探索了民族乐器的电子化，发明了“电子笙”。

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吴景馨在昌平区建立了“黄钟乐府”，内设典藏坊、传习坊、乐坊、交流坊等 13 个区域，来访者既可近距离观察乐器制作过程，也有机会学习民乐的演奏技巧。

“清朝宫廷乐器制作技艺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这曾经是父亲的心愿，后来变成我的家族使命，再后来，是为中国民乐的弘扬和发展贡献力量。”当年“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宏音斋”如今广收门徒。

而在“宏音斋”的对角线方向，距天坛南门不远的北京珐琅厂，景泰蓝技艺国家级传承人钟连盛站在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的门口对记者说：“让景泰蓝从宫廷陈设，到真正进入人民生活，我们花了 20 年进行创新探索。”

他的身后是百余件不同朝代的景泰蓝制品。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景泰蓝曾为皇家独享，是宫廷艺术的代表，其造型、纹样、色彩是中华传统绘画、吉祥文化的凝集，是美术、工艺、雕刻、镶嵌等技艺的集大成者，被称为国宝“京”粹。

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市场饱和，加之国内市场对工艺品的消费匮乏，让这项宝贵的技艺遭遇严冬，整个行业遭到不小的冲击。同业者纷纷转行做家装装饰，或改从绘画、舞美等艺术。不仅如此，首都非遗的传承参差不齐、部分技艺逐渐凋零甚至濒临失传的现状令钟连盛感到担忧。

钟连盛认为，改变的时候到了，“不能让景泰蓝停留在‘摆设的角色’。得让深藏在博物馆的传统文化标本‘活灵活现’，融入时代脉搏，进入百姓视野，贴近人

民生活。”

为重拾传统文脉，钟连盛提出，要让景泰蓝在材质、工艺保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融入时代特色和艺术思潮，在设计理念上必须多元、超前，艺术发展上不能简单复制元明清特色。

元代到清前期，景泰蓝的制作原色只有以蓝色为主的六七种，清代中期达到了20余种。如今，北京珐琅厂研制出包括无铅用料在内的68种釉料颜色的配方，在使用功能和应用领域上也有所拓宽，从室内的建筑装饰到室外的景观工程，适合不同人的需求，走近了人民生活。

人们发现，北京APEC会议期间，在雁栖湖集贤厅，斗拱、门套、装饰上多了别具特色的景泰蓝，它古朴典雅又不乏精美华贵，引来外国首脑频频称赞。然而，这项十一、十二世纪传到欧亚大陆的珐琅工艺，由于费工耗时，在今天的其他地区，除少量应用于手表表盘与首饰加工外，已基本看不到了。

“传承是非遗的生命啊，要让我们民族的非遗瑰宝走出‘深闺’，融入北京的城市性格。”在钟连盛看来，非遗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太多事要做，他的心愿是：与传承人们一起，在景泰蓝技艺的发展史上留下时代的痕迹。

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主人。“要让当代人了解、珍视、爱惜、喜欢我们自己的非遗文化，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做传承人，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并延续我们的文脉。”钟连盛说。

“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

“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对北京历史文化提出了“更加精心保护好”的新要求。

从天坛周边简易楼的拆除腾退，到杨梅竹斜街的软性更新，从南锣鼓巷四条胡同的综合整治，到北京文化新地标“北京坊”的精彩亮相，从推动旧城“整体保护”到“构筑全面保护格局”……过去几年来，古都北京加快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步伐，推动这座城市朝着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文脉标志的宏伟目标迈进。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必须更加精心保护好，下更大决心，投入更大力度，增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

“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遗产观，充分认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加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力度，加大文物搬迁、腾退、修缮力度，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还要把其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更大战略空间予以考量，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充分挖掘和展示北京历史文脉，恢复“一轴一线”魅力景观，加强老城整体保护，推进首都文化、京味文化、皇城文化、运河文化等的研究阐释和挖掘利用，把北京建设成世界级的文化中心城市。

“更加精心保护好”北京历史文化，更要舍得投入尤其是政府财政投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该修则修，该用则用，该建则建，做到城市保护和有机更新相衔接，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和时尚创意

相得益彰。

“世界莫能与比”“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历史上的北京城，拥有诉说不尽的溢美之词。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展现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独特城市魅力，中华文明的这张“金名片”必将重现辉煌，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对话故宫博物院“掌门人”单霁翔

坐落于首都“心脏”的故宫，其每一组院落、每一座宫殿建筑、每一扇朱漆大门、每一段石板桥梁、每一块青砖黄瓦、每一件宫廷陈设、每一幅梁枋彩画，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符号、文化信息，在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地标意义和文化象征。

2017年2月，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3周年到来之际，新华社记者对自称是故宫“看门人”的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先生进行了专访。

故宫博物院是“金名片”最耀眼的标签和代表

记者：单先生您好，您认为应该怎样理解总书记所说的“金名片”？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级博物馆，是“金名片”的一部分吧？

单霁翔：我认为“金名片”，应该包含两层意思，除了指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还包括为传承、保护和利用好这份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从而使更多精彩的文化成果惠及社会公众，让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厚重影响世界。

今天的故宫博物院拥有三项世界级文化资源。第一项是9000余间房屋组成的紫禁城古建筑群。故宫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北京城有一条清晰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楼，共7.8公里，这条中轴线上最气势磅礴、最完整的一组大型古建筑就是紫禁城古建筑群，因为紫禁城及其周边文物古迹和传统胡同四合院的存在，

北京的城市中心才显示出与世界上其他首都城市中心格局不同的文化魅力。如果说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是一张金名片，那么故宫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标签和代表。

第二项是故宫的藏品。故宫博物院不仅文物藏品丰富，而且它是以珍贵文物占93.2%的“倒金字塔”藏品结构，迥异于世界其他博物馆以资料为藏品之最、珍贵文物占很小比例的“金字塔”结构。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清宫旧藏，这也就奠定了其在历代文物上的优势。从品类来说，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可分为绘画、法书、碑帖、铜器、金银器、漆器、珐琅器、玉石器等25大类，品类完整。从历史脉络来看，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重要类别都是历史序列整齐的，如馆藏陶瓷可以举办中国陶瓷发展史，玉器收藏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在时代上没有断档，这一点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博物馆可以媲美。

第三项资源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观众数量都在千万人次以上，近4年参观人数更是超过1500万人次，比同属世界五大博物馆的卢浮宫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世界级博物馆均高出数百万人次，当之无愧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只有传承、保护和利用好故宫博物院的文化遗产资源，将更多精彩的文化成果奉献给广大社会公众，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活起来”，才能无愧为“金名片”的美誉。

依托两大文化工程，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是这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

记者：故宫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整体情况如何？

单霁翔：从2012年开始，故宫博物院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发现文物建筑、藏品和观众接待等各个环节均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有的方面相当严重，需要及时解决。随后，故宫博物院提出开展“平安故宫”工程的建议，并于2013年4月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根据《“平安故宫”工程总体方案》，“平安故宫”工程的保护对象为：一是占地112公顷、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的木结构宫殿古建筑群的安全；二是180余万件故宫藏品的安全；三是每年约1500万中外观众的安全。通过“平安故宫”工程的实施，将有效解决故宫博物院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火灾、盗窃、震灾、

藏品自然损坏、文物库房、基础设施、观众安全等方面的安全隐患。

目前，该工程的7个子项目均在有序进行。未来，故宫博物院将继续抓紧推动“平安故宫”工程的实施，以彻底解决故宫博物院存在的安全隐患，守护故宫平安。

国务院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中长期目标，在2020年，即紫禁城建成600年之时，基本实现故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态，全面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迈进世界一流博物馆行列。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故宫人的“故宫梦”。这个梦想要实现，既依托于两项重大文化工程即“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和“平安故宫”工程的顺利完工，同时需要不断提升博物馆的专业化功能、发挥博物馆的社会化职能，实现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的目标。

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对文化遗产宽容、对历史城区尊重，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记者：作为业内著名专家，您认为历史街区、名人故居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应如何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单霁翔：城市文脉是城市的个性和品牌，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现实基础和文化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通过和修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的提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发布，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实施等，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撑。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强化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责任，并引导公众积极参与保护。

但是，体现并延续城市文脉，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在所谓的“旧城改造”中，一些城市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使很多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文化名街被夷为平地。第二，一些城市打着尊重历史的幌子，陆续推出了许多由传统街道改造而成的“仿古一条街”，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沦为失去真实价值和历史信息的“假古董”。第三，一些城市将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全部改为旅游和娱乐场所，超负荷

旅游和商业开发，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文物“原真性”。第四，不合理定位改变历史文化街区环境。例如，过去一提到什刹海，人们就会想到湖水、胡同、四合院；而现在，却是酒吧、餐馆和旅游商品。第五，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心还很不够，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还需进一步提高认识。

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家又称为“家庭”，人们的生活中需要一个可以与自然沟通、对话的庭院空间。然后，一座座传统民居院落相依形成一条条历史街巷，一条条历史街巷并联又构成一片片历史街区，从而形成既秩序井然又气象万千的历史城区风貌。传统民居院落体系，既合理安排了每户居民的室内空间，保障居民日常生活中通风、采光、日照，以及舒适性、安全性、私密性等居住需要；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日常的社交空间，创造和睦相处的居住氛围，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哲学思想，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成为最适合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家庭特点的居住形式。

所以，对于历史文化街区，需要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实行“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以遏制采取大规模“危旧房改造”方式对文化的破坏，保持原有院落布局和街巷肌理。“微循环式”保护与更新，即根据居民生活实际需要和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而定，不求一律、不求同时、不求全部。强调小规模、连续的渐变，采用适当的规模和合适的尺度。这就需要深化和细化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做到在不断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建筑主体始终是平缓朴实的传统民居院落；居民主体始终是和睦相处的老邻居们；生活环境始终是自然和谐的传统风貌。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成败关键在于决策。作为城市发展和规划建设的决策者，各地方政府领导要本着对历史、对城市、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组织开展对所在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和调查，把握5个方面：一是探索地区整体协调发展战略布局，明确城市功能定位；二是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三是要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四是要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社会公共形象，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全民动员；五是要建立健全法制体系，做好其他法律与《文物保护法》的衔接与实施。

目前，不少城市管理者不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一味地追逐经济利益和

政绩工程，尤其是为了提高建筑高度和土地利用强度，采取大拆大建的方式，使城市历史风貌遭到破坏。“危”“旧”不分的做法导致旧城内历史街巷不断消失，割断了城市文化的血脉，历史城区也就失去了时间厚度，失去了文化的底蕴与根基。城市管理者应该转变思想，认清城市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文化遗产的唯一性，自上而下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包含对文化遗产的宽容，对历史城区的尊重，对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追求。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故宫人”一以贯之的理念

记者：近年来，北京在处理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遗产保护利用这一关系时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您怎么看？在维护古都风貌，统筹保护、更新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方面，故宫是如何落实“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一理念的？

单霁翔：不少世界遗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都有着美丽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展现着城市的永恒魅力和文化风采。故宫占据着北京历史城区 1.12 平方公里中心地区，也影响着北京城市中心地区的空间形态。有人将北京历史城区的空间形态描述为“盆”的形状，皇城地区是“盆”底，由中心向四周高度逐渐增加，过了二环、三环，高层建筑开始密集起来。北京历史城区的保护，历来强调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高度。但是，缺少了城墙的北京旧城，等于缺少了控制其高度的重要参照物，原来作为城墙的地方，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市区的主要街道，不但不具有维护历史城区氛围的保护作用，反而成为一些高层建筑“争奇斗艳”的舞台。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活跃，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压力也在加剧，人们普遍担心这个“盆”底越来越小。

对故宫博物院来说，当前一切工作的核心还是安全工作，让古建筑和文物藏品保持健康安全的状态，是最紧迫、最关键的安全问题，也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近年来，慈宁宫花园修缮工程、东华门修缮工程、午门—雁翅楼古建筑群保护维修工程、宝蕴楼修缮工程等多项工程竣工，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启动，不仅保护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为扩大开放面积、提高文物展藏比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之外，古建筑日常保

养工作实现常态化，这些工作同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一道，让紫禁城逐渐恢复了昔日皇宫庄严、肃穆、辉煌的风貌。而“平安故宫”工程比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关注的范围更广，除了古建筑群的安全以外，184万余件（套）藏品的安全和每年约1500万人次的观众的安全也是重点内容。目前正在开展的藏品三年普查清理工作，是2004—2010年的故宫博物院第5次文物清理工作的延续和深化。计划对甲骨、乾隆御稿、明清尺牍、清代瓷片和窑址标本、石碑、清宫老照片等15类文物藏品进行持续和深入的普查清理，开展登记著录、影像采集和研究工作。

其次，故宫博物院在提升观众服务水平，保障故宫古建筑、文物和观众安全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居高不下的观众流量是故宫博物院的管理难题之一，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采取试行限流分流方案、提升御花园景观环境、倡导理性出行等软硬件相结合的手段，在引导和调控观众流量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再次，为履行博物馆文化传播、公众教育的重要职能，故宫博物院一贯重视文化创意事业，不断增强文化创意产品研发水平、拓宽渠道、丰富内容、推陈出新，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公众需求、时尚趣味相结合，让更多观众“把故宫文化带回家”。

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故宫成功推出了系列故宫文化创意新产品，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故宫日历》成为各大书店的“畅销书”；8款App应用形成系列，雅致的《胤禛美人图》《韩熙载夜宴图》，萌萌的《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内涵丰富、实用的《每日故宫》，都品质精良，寓教于乐，获得了很多用户的美誉。

紫禁城是故宫博物院独一无二的博物馆空间格局，每年设置约40个左右的展览，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原状陈列、常设陈列、临时主题展览为主体的展览格局，每年展出文物在1万件以上。目前，故宫博物院还在不断开辟新的展厅，增加展示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提升展览效果。另外，依托丰厚的藏品、扎实的研究水平，不仅举办各类涉外展览，还经常支持国内其他博物馆举办展览，每年组织参与境外展览10余场，境内展览10余场，为全国及世界各地观众了解故宫藏品、故宫文化和中华文化提供了机会。近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与很多国际著名博物馆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领域包括展览、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确立了故宫博物院在国际博物馆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地

位，也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是公益性的文化机构，无论是文物保护、展览陈设，还是观众服务、文化传播都是职责所在，都需要全体“故宫人”努力做好、不断提升。“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也是“故宫人”一以贯之的理念。

北京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思路与对策

记者：非首都功能疏解是北京当前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故宫博物院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单霁翔：北京历史城区集中了文化古都的物质与文化精华，是中华文明的集中体现。梁思成先生认为，北京历史城区完整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应该说，北京历史城区的建筑体系是全世界保存最完好、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

但长期以来，对北京历史城区既要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又要实现多功能的现代城市建设的矛盾，引发了各类全局性问题。目前，北京历史城区范围内的传统遗存已经不足总面积的 1/3，建筑形式和街道形态在时代、风格、尺度、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历史城区已残存不多。要“进行积极保护，再创都城整体辉煌”，就必须调整北京历史城区保护的战略方向，扭转单中心城市结构失衡的发展局面，遏制“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深刻理解保护北京文明古都的重大历史使命，进一步明确首都功能内涵，提出整体保护的要求。同时，进一步强化城市文化特色和历史文化遗产的应有地位，对历史城区的职能和空间格局做出更加明确的界定，以突出历史城区的首都职能为重点，梳理保护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为积极保护历史城区创造条件。总之，面对北京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思路与对策。

为此，我在 2017 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抓住首都功能疏解契机加强历史城区保护的提案》，并提出以下建议：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在历史城区中的地位，完善中央行政区

在历史城区中的空间组织，进一步合并历史城区内的行政区，缓解城市建设带来的发展压力，减少历史城区功能混杂带来的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进一步梳理历史城区可以进行整体保护的空间范围，明确历史城区保护的主要方向，突出历史城区内文化遗产的价值，重点保护故宫、天坛等城市文化景观，保护以中轴线为代表的城市轴线体系，修补内外城和皇城城郭及传统水系格局，凸显历史城区面貌的完整性，维护宜人的街道空间历史文脉，构建建筑群整体和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实现重塑“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的宏伟目标。

就故宫博物院来说，非首都功能疏解相关举措与故宫世界文化遗产息息相关。故宫及周边区域，是首都的“心脏”，也是来京中外观众最为密集的区域，观众聚集、流动频繁、环境较为复杂，“黑导游”“黄牛”、占道乞讨、无照游商及黑车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商业建筑与临时摊点等杂乱无章，这些与近年来不断增长的观众流量密切相关，对这些区域的管理整治也是北京市相关单位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近年来，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多次进行了综合整治、环境提升，在东城区和西城区政府的协助下，故宫东华门和西华门外广场区域也得到了深度治理，让故宫博物院周边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净化。但是，治理效果还需要继续巩固和提升，一些顽疾也需要加大力度彻底根治，以维护“首善之区”的历史风貌，为国内外观众创造良好的参观环境，留下深刻的文化记忆。

也只有相关单位下定决心、协同努力，才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市工作时提出的要求：“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第四篇

生态篇

守望水安全

➤ 导言 “心腹之患”亟待举国关注

➤ 叩问水危机

刘诗平 顾瑞珍 王 敏 于文静

➤ 城市饮水安全三大焦点透视

顾瑞珍 关桂峰 吴钟昊

➤ 全国水源地水质逾一成未达标

于文静 白明山

➤ 国家出台规划保护 365 个水质较好湖泊

顾瑞珍

➤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水安全忧思录

李 斌 王 敏 黄 艳

➤ 正视水安全“新常态”

闫祥岭 王 敏 谭 畅

➤ 用法治破解“多龙治水”之困

郑 昕 闫祥岭 吴钟昊

导言 “心腹之患”亟待举国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发起三大攻坚战役。

雾霾是“心肺之患”，水则是“心腹之患”。

对于“心肺之患”，即空气污染尤其是雾霾，影响呼吸，人们能感同身受，但是水多、水少、水脏现象却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水污染、水浪费现象在城镇和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一套国家安全体系，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诸多安全的重视。

水问题，能否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对于拥有长江、黄河等许多大江大河的中国来说，能否说正面临一场水危机？

中国水问题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会缓解，还是会更恶化？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发出的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这引起人们重视了吗？

……

我们走进国家环保总局、水利系统，走进专家学者，从事环境法研究30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的话令人振聋发聩：“越研究越令人畏惧！”

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72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曲格平老人的话，更是令人心惊：“40多年过去了，水的问题愈演愈烈。再不抓紧行动，难道真的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悔恨的眼泪吗？”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水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安全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元素，水安全问题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供水、粮食等安全，而且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兼具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资源等多种安全元素，理应纳入新型国家安全战略。

“心肺之患”已经引起举国关注，“心腹之患”还亟须全社会关注……

守望水安全

这是红色的警讯——

全国十大水系水质一半污染；国控重点湖泊水质四成污染；31 个大型淡水湖泊水质 17 个污染；9 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和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记者于 2014 年深入全国多个省市调研后了解到，伴随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受损情况触目惊心，水安全正在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

“心腹之患”

“每天早晨先把水缸、水桶添满，洗菜水不敢倒，留着冲厕所。”2014 年下半年的段时间，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温馨家园等多个小区分时段停水，居民刘女士让儿子特意买几个桶专门储水。

水厂表示，2014 年雨水少，区域内新楼盘入住人口增加，地下水位降低，供水严重不足。

马驹桥这一幕，是日趋严峻的城市缺水状况的缩影。

“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水生态严重受损，三者相互影响、彼此叠加。”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开展调研后，如此评价当前京津冀地区的水安全。

历史上，京津冀地区土肥水美。而今，呈现在调查者眼中的是怎样的情景呢？

人均水资源仅 286 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 500 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

地表水劣Ⅴ类（丧失使用功能的水）断面比例达 30%以上，受污染的地下水占 1/3。

平原区河流普遍断流，湿地萎缩，功能衰退。

海河，流经京畿，滋养一方。但 2013 年调查，其主要支流皆重度污染，Ⅲ类以上污染水超过 60%。

京津冀地区如此，全国亦然。

《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 4778 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和极差。

再看湖泊。同一份公报中显示，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 39.3%。31 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 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而且，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气蒸云梦泽”的洞庭湖湖面大幅缩小，“水情即省情”的湖北湖泊面积锐减、湿地萎缩。

现实是沉重的——全国 657 个城市中，有 300 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趋势是严峻的——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 6200 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 500 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时任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这一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它正在变成现实威胁。

湖北经济学院教授吕忠梅，从事环境法研究 30 多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雾霾大范围发生，人们经常碰到，因此被称作国家的‘心肺之患’。而水安全问题，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短视恶果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时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河北省沧县小朱庄村村民朱建勇，看到从地下抽上来的水散发着异味，并呈铁红色，惊慌莫名。村里一家养殖场的主人称，数百只鸡因饮用这样的水相继死亡。

监测显示，村子附近的某化工厂不仅向河流排污，还向周边沟渠倾倒废渣。这个发生在 2013 年 4 月的生态事件，虽已过去一年多，但村民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过去我们沧州挖几米深就能得到地下水，而现在一些地方要深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到水，有时即使抽到也是污染水。”当地一位基层干部说。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动因。

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 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的现实“推力”。

时任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水污染加剧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向大自然无度地索取，使得本已稀缺和变脏的水，变得更稀缺、更脏。

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全国主要江河湖库划定的 6834 个水功能区中，

有 33%的水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或氨氮污染物入河量超过其纳污能力，且为其纳污能力的 4~5 倍，部分河流（段）甚至高达 13 倍。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 GDP。”

水安全的危急状况，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 4 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 2400 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吕忠梅用 3 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伤痕难以修复，短视必结恶果。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达 5000 亿元，年均 1000 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 1994 年开始，养育了全国 1/6 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 20 年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 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 年无锡水污染事件爆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 800 多亿元资金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72 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40 多年过去了，水的问题愈演愈烈。”回顾来路、检视当前，这位 84 岁的老人发出了“锥心之问”——“再不抓紧行动，难道真的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悔恨的眼泪吗？”

无路可退

诚然，水安全问题有天灾因素。水利部门的核算结果表明，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减少 13%，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北方的“水饥渴”。

然而，天灾难免，人祸可除。面对残酷的现实，我们没有退路，节水是治本之策。

“当前打好‘水安全保卫战’的关键环节是节水，要从观念、意识、措施等方面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活节水，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国节水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吴季松说。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仍为世界先进水平的 2~3 倍；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2，远低于 0.7~0.8 的世界先进水平。

体制改革是关键。

专家认为，针对水资源开发和水环境保护之间的脱节，应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以流域水环境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

必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时任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加快推行城镇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用水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构建全国和区域性水权交易平台，探索水权流转实现形式。

统筹兼顾是根本。

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治水必须统筹兼顾，与治山、治林、治田等有机结合，协调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问题。

面对地表水、地下水及近海污染的多重考验，加强水环境治理的思路创新迫在眉睫。为此，周生贤等提出实施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理念。

调水是辅助。

专家认为，调水不能作为解决水安全问题的主渠道，而应在严格节水和治水的条件下，辅以适当调水。

“现在一缺水，就想到调水；水质污染了，也想到调水。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从向老天爷要水转变为自身节水，小到每个家庭的每个人节约一滴水，大到农业耕作方式的改变和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王金南说。

.....

国家高度重视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坚决向污染宣战”。

一些实质性举措已经相继推出，变化正在发生。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于2015年元旦正式实施；2014年5月1日起，北京居民实施阶梯水价，3档水价分别为每立方米5元、7元、9元，多用水多负担；宁夏、江西等7省区正在开展不同类型的水权试点，力争两三年内在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流转等方面率先突破；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水污染地图”绘制；“绿色江南”致力于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环保问政”正在倒逼政绩考核向“绿色”转轨。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梦想之基。

守护水安全，是当代每个人必须肩负的重大责任，任务艰巨、光阴紧迫。

城市饮水安全三大焦点透视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饮水安全？如何解决“水脏”“水黄”问题，让百姓喝上放心水？记者于 2014 年下半年就此展开调查

水源缺少和污染已成饮水安全头号问题

兰州、武汉、靖江……短短一个月之内，我国就有 3 座城市发生饮水安全问题，再次牵动人们的神经。

这只是我国饮水安全环境日益脆弱的一个缩影。近几十年来，因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造成的水资源过度开发和水污染，已经开始威胁城市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因为不符合国家水质标准要求，多个省份的水务公司进入了环保部的督查“黑名单”。

水利部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4，全国年平均缺水量高达 500 多亿立方米。水资源分布不均，北方缺水尤为严重，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63.5%，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19%。

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警戒线是人均 500 立方米，而北京、天津等城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200 立方米。

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显示，2014 年北京居民喝的每 3 杯水中，就有 2 杯为地下水。而令人不安的是，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北京地下水位已由 1999 年的平均 12 米左右下降到 2010 年的平均 24 米左右，在北京地面上已形成 2650 平方公里的沉降区。

出于对饮用水安全的担忧，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饮用桶装水、瓶装水，使用

过滤器、净水器……然而，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净水装置也难以让人安心。

饮水安全的前提是水源安全。“但现在好水越来越少，水源地水质变差，令人忧虑。”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要解决饮水安全问题，首先要从源头抓起。

目前全国有 400 多座城市缺水，其中 110 座严重缺水。除了水少，水还在变“脏”，让自来水水质雪上加霜。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也让水源地面临水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发源于江西安远县的东江一路南下，惠泽河源、惠州、东莞、广州、深圳、香港，约 4000 万人的生活用水依靠东江。然而，这个稀土、钨矿、电气石储量丰富的小县城，为了保护东江水源，至今未能摘掉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帽子。

在供水能力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源工程建设严重滞后，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突出。西北等地资源性缺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一些地方的水源地，由于上游和沿岸保护红线范围内并未实施有效保护，水源地周边垃圾遍地、矿山私采乱开，水面开发旅游、网箱养鱼，水质遭到严重污染。还有一些企业将没有经过处理的超标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

供水管网“二次污染”造成“最后一公里”安全隐患

“水源、供水企业、二次供水是饮用水安全的 3 个关键环节。供水管网的‘二次污染’也是影响城市供水质量的重要因素。”傅涛说。即使水厂的出水水质合格，但在输水过程中，仍可能遭受“二次污染”的威胁。

水源变差，就需要自来水水厂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水质。

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我国开始强制实施新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业界称这一标准“堪比欧盟，甚至有些指标超过欧盟标准”。在 106 项强制标准下，各地都采取措施力求达标。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政府在供水领域投入不足，导致城镇自来水管网中，相当数量的不达标管网长期运行。

南昌水业公司投入一千多万元用于添置满足新国标需求的检测设备，经检测其出厂水质达标。但仍有不少南昌市民反映，水里有异味难以饮用，有关部门发现，问题就出在二次供水管理和设备上。

放眼全国，尽管进行了大范围的管网改造，但仍有不少低质管网和超年限服役管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老旧水管易腐蚀、结垢，产生微生物细菌种子，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形成“二次污染”。

据业内调查，个别城市的供水设施使用年限已接近甚至超过 50 年，“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因管网老化或挖掘破坏而造成的爆管事故等也时有发生。2014 年，北京老城区管网漏损率达 15%~20%。

由于市政供水管网压力不够，一些老旧小区 6 层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压实现供水。有些二次供水水箱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常年未清洗、消毒或未盖加锁，影响了水质。

水龙头铅超标也是一个隐患。温州市家庭作坊生产的“毒水龙头”被曝光，经检测其锌、铅含量大大超出国家标准。

目前，我国二次供水设施的监管法规仍是空白。但在《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通知》中，记者看到有 4100 亿元投资将用于加快推进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

谁来保障饮水安全

保障饮用水安全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任务，一旦发生水质污染，谁来保证饮水安全？

专家认为，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根本在于确保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子健认为，在重要水源地，应加强监测，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

备用水源地建设对城市极其重要。在兰州苯污染事件中，由于兰州本地没有备

用水源，使得保障饮水安全难上加难。由于缺水，很多地方没有能力建设备用水源地。在北京，应急备用水源已经作为常态使用。

除了建设备用水源，饮用水安全事件还警示各地应加强日常水质管理。供水企业应对一定时期的水质状况进行分析，对水环境发生的变化进行检测，按照需要适时给出变化的警戒信息及相应对策。

“国家应建立饮用水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时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说。一旦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并成为常态，在出现水质污染时便可有效应急，将危险降到最低。

2013 年年初，住建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供水企业在年底前建立水质信息公开制度，加快水质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年 1 月 15 日，北京市自来水集团首次在官网公布自来水水质信息。

为应对南水北调水进京后可能存在的“水黄”，北京自来水集团正筹建应急饮用水储备中心，将储备 3 万桶桶装水、80 万瓶瓶装水，能够满足 50 万人一天的基本饮水需求。

“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制定专门法势在必行。”时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饮用水安全管理法律体系急需健全，应尽快制定《饮用水安全法》，对水源地、水输送、水生产、水消费等都作出规范。

《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200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国家将全面改善设市城市和县级城镇的饮用水安全状况，建立比较完善的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

环境保护部曾先后启动了全国城市、城镇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工作，同时加大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执法监督力度。

截至 2014 年下半年，我国已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以及《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 年）》。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环保部正会同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地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重点是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较好湖泊等高功能水体，消灭劣Ⅴ类等污染严重水体，加强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规划考核断面水质监测。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表示，自来水从水源地、水厂、管网到用户家中，都要有相应的管理规范，政府、企业、公众包括物业公司均须负起责任。

全国水源地水质逾一成未达标

2014年，水利部调查评价结果显示，通过对4555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调查，水质达标率为86%。其中，水库型水源地达标率为90.5%，地下水水源地为80.9%左右，河道型水源地为89%左右，湖泊为65%左右。

水利部负责此次调查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地下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地表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区域主要在水污染较为严重的流域和地区。

“水源地水质不达标不仅增加了制水工艺的复杂性，而且新出现的不达标将造成一些水厂原有净水工艺的调整，增加建设和运行成本。更有甚者，有的水质不达标问题很难处理，影响水厂的良性运行和用户的饮水安全。”时任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副主任闫冠宇说。

调查显示，我国水源地水质不达标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一些地区受资源条件限制，水质本底值存在超标情况；也有人为因素，水污染问题严峻，湖库型水源地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大量重工业项目布设在大江大河沿岸，江河及周边的流动污染源风险较大，直接威胁水源安全。

根据2013年水利系统监测的资料，全国开展监测的20.8万公里重要江河河段中，全年Ⅰ～Ⅲ类水河长占68.6%，比2012年提高1.6%，但Ⅴ类及劣Ⅴ类河长仍有20.6%；全国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和面积较大的120个主要湖泊全年总体水质Ⅰ～Ⅲ类有39个，占评价总数的32.5%；开展评价的5134个水功能区中，满足水域功能目标的2538个，占49.4%。

水利部称，目前全国仍有部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未获省级人民政府批复，特别是对跨行政区水源地，保护和受益主体不一致，保护责任和管理措施难以落实。水源地保护管理机制和能力有待完善和提高，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和排污越来越集中，水源保护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国家出台规划保护 365 个水质较好湖泊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 2014 年 9 月联合印发《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0 年）》，提出为保护湖泊生态环境，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对 365 个水质较好湖泊进行保护。

三部委表示，我国将把水质较好湖泊划分为 5 个自然分布区域进行保护，即东北湖区、东部湖区、云贵湖区、蒙新湖区和青藏湖区。

自“九五”以来，国家对污染严重的太湖、巢湖、滇池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工作，初步遏制了“三湖”水质恶化的趋势，但“三湖”治理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随着湖泊流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种植养殖业、旅游业、采矿业以及沿湖工业和城镇化不断发展，保护‘一湖清水’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郑丙辉博士说。

专家认为，开展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的保护，折射出国家湖泊治理的思路有所调整，即既要治劣，更要评优。此举有利于扭转过去污染越重越能得到重视、越能得到国家财政支持的“逆政策效应”，有助于避免重走太湖、滇池等多个湖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郑丙辉分析，从政策侧重点看，规划由过去重点关注富营养化等水质变化，向关注整个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转变，对水体营养程度变化、湖水咸化、生物多样性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予以全面关注；从保护范围看，由过去重点关注东部湖区等发达地区的湖泊或城市内湖，向全国五大湖区广覆盖转变，对西部等偏远地区的湖泊也给予应有的重视；从保护资金来源看，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资金主要以地方为主，中央财政资金视情况予以适当补助，以引导各地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机制。

规划明确，将优先选择水质较好、重要饮用水水源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湖泊。环保部将参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对规划内湖泊水质保护目标进行考核。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水安全忧思录

“越研究越令人畏惧！”

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时任湖北经济学院院长的吕忠梅，是一位从事环境法研究 30 多年的专家，从 2009 年开始持续研究中国水安全问题，每年形成几十万字的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记者于 2014 年 11 月对她作了专访。

“水安全危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问：水安全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答：以水资源紧张、水污染严重、水污染安全事故频发、水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洪涝灾害为特征的水安全危机，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必须高度重视。具体表现在：

一是水资源短缺形势严峻。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 1/4。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城市缺水范围不断扩大，缺水程度加剧。工农业生产存在大量水资源浪费情况，部分调水工程加剧局部水资源紧缺。

二是水质污染与饮水安全问题突出。全国水质污染状况总体堪忧。以 2011 年水利部水资源公报公布的数据为例，全国主要流域的 I~III 类水质断面占 64.2%，劣 V 类占 17.2%，其中，海河流域为重度污染，黄河、淮河、辽河流域为中度污染；化肥使用量逐年攀升，农村面源污染压力不断加重，对环境质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受水质恶化的影响，全国居民生活饮水安全形势严峻。此外，地下水超采及污

染带来的公共安全隐患日益明显。

三是重大水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内近几年每年发生的水污染事故都在 1700 起以上。

四是由于围湖造田、筑坝拦汊、填湖造地，以及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过度，使水生态空间萎缩，生物多样性减少。

五是经历几次大规模“围湖造田”“围湖造地”运动，影响了湖泊生态平衡，加剧了污染。由于蓄水量下降，水体萎缩，一些湖泊资源丰富地区旱灾频发，生态系统遭受重创。

“理应纳入新型国家安全战略”

问：如何看待水安全问题的战略地位？

答：水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元素，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进一步分析，水安全问题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供水、粮食等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兼具非传统安全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资源等多种安全元素，理应纳入新型国家安全战略。

三管齐下确保“水安全”

问：今天该用何种方式确保水安全？

答：按照依法治水的思路，要确保水安全，需要满足 3 方面的要求。

一是完善立法。目前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与水资源保护法律相配套的法规、条例尚不全面；水权制度也不完善，水权交易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

二是严格执法。目前存在管理机构和职责不适应水资源保护的现实，导致执法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不能或者执法不严，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实的情况较为普遍。其中，既有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也有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三是全民守法。要加强公民环境教育，提倡绿色消费，培养理性消费观。

解决“心腹之患”难度更大

问：解决水安全问题有多大难度？

答：如果说范围不断扩大的雾霾是人们的“心肺之患”，那么包括水污染等在内的水安全问题，就是“心腹之患”。水体一旦被污染，治理和恢复过程比防治大气污染还要困难。

由于覆盖面很广，水污染有时比较隐蔽而不容易发现，加上跨区域管理体制不顺，以及面源污染问题，治理起来非常困难，治理时间更长，资金投入会更大。受污染的水一旦被人饮用，会直接进入人体循环系统，影响健康，而且这种危害可能是潜在的、长期的。

警惕最后一滴水是我们的眼泪

问：怎么看未来的水形势？

答：专家预计，我国将在 2030 年左右出现用水高峰，届时全国用水总量将达到上限，供需矛盾会更加突出。

另外，全民节水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中浪费水、污染水、破坏水的现象十分普遍，加剧了水资源供给压力。当务之急是大力建设节水型社会，尤其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南方地区更要引起警觉。

如果不能很好地节水、护水、治污，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参与，那么人类的最后一滴水真可能就是我们的眼泪。

正视水安全“新常态”

近年来，我国水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大旱、水污染、“水窝里里没水喝”等涉水“痛点”时常发作。然而，不少江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建设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与全新的水情形势严重脱节，不利于保障水安全。正视水安全“新常态”，规划推进新水情形势下的治水工作已是燃眉之急。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水利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涉及民生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治理河道、修建水库等众多水利设施，对减少水患、增加灌溉面积、推动农业生产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取得了显著成效，更体现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些设施至今还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不少地区水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海河流域，不仅曾经通航的大运河已经基本无水，其余多条天然河流也长期断流，导致以往多条为消除水患而修建的工程设施使用率不高；在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仅28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在洞庭湖区，一些市县“水窝里里没水喝”的尴尬局面已持续很久。可以说，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甚至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各地严峻的水安全形势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新常态”。相关部门应时刻紧绷保障水安全这根弦，彻底摸清我国河、湖、地下水等水资源的新情况、新变化，从长远着眼，在科学调研、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及时启动相关水利工程建设。

水安全“新常态”对相关应对措施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要求。这要求决策者需要依据最新水情，结合区域内城市发展、人口分布等生产生活需求，及时规划、调整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水利工程施工，推动区域内水资源分布空间的均衡，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融入科学治水思维，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高屋建瓴地指出如何应对水安全“新常态”。各级政府部门应按照这一战略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扩大投入力度，提高水治理能力，用科学的方法和思维保障饮水安全，呵护我们共同的生命载体。

用法治破解“多龙治水”之困

饮用水污染、水生态破坏、地下水枯竭……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遭遇水安全问题，水安全已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得不面对的一道坎。水安全既关系到人们的生活，也关系到工农业生产，要想彻底迈过这道坎，必须破解“多龙治水”的格局，以法治手段增强管理部门“一盘棋”的意识及治理效果。

兰州、武汉、靖江……2014年4月10日至5月9日，一个月之内，我国就有3座城市因饮水问题牵动公众神经；国内一些原本水资源丰富、景色秀丽的地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却耗费了极大的环境成本。在发展带来的环境“牺牲”之中，水安全首当其冲，一些地区的水资源要么极度匮乏，要么严重污染，陷入了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叫渴不迭”的窘境。

这种现象大量存在，不外乎一些地方陷入了发展误区。相比于矿产、森林等资源，水资源变化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水安全管理也具有明显的跨区域特征。但在水安全治理上，一些地方没有把本区域对发展的需求、对水资源开发的力度放在全局和整个流域的角度去考虑，应对政策措施自然局限于一城一地，缺乏统筹协调与联动。

以简单的河流管理为例，不少河道是行政区划的天然界限，河道两侧属于不同城市管理，即使在同一城市，水利、交通、园林、环保等多个部门都负有责任。然而，都负有责任往往意味着都不负责任，让一些部门有了“踢皮球”的空间，阻碍了整个河道的统一规划、统一治理，反倒有“越治越污”的趋势。

水多了、水少了、水脏了，都会带来水危机；无论是部门分割所带来的“多龙治水”，还是地区分割所带来的“多龙治水”，都会使水危机加剧，解决的正确路径只能是依法治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对管理者业已习惯的条块分割格局“动

动刀子”。

说到底，条条块块的扯皮无非是为了争“利”躲“责”，而“一盘棋”意识恰恰能够从区域、流域层面对水资源和有关建设进行统一规划，进一步细化权责。不仅包括全国范围内的水资源调配，大江大河流域的全面治理，也要对小流域河流、小面积湖泊进行统筹规划，划定“红线”，以改变当前普遍存在的各自圈水、不顾下游的现象。

中国水问题的治理与水危机的消除，最终只能走法治之路，只有以强有力的涉水良法为基础，才能真正解决部门分割和地区分割所造成和加剧的治水难题。20多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水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接下来，还需要各地、各流域依照情况制定相关的流域水环境工作条例、“河长制”原则等，建立起水安全法律体系，为依法治水提供法律保障。

想要“绿水青山”，就要将水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加以认识。保障水安全是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以依法治水思维破解“多龙治水”之困，以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踏石留印的劲头保护、开发、利用好现有水资源，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目标。

守望“垃圾围城”现象破解

- 导言 化解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
- 逾 1/5 城市尚无规范垃圾处理设施
杜宇 季明 李舒
- 垃圾围城忧思录
季明 李舒 陈冀 杜宇
- 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也是买单者
李舒
- “垃圾围城”六大焦点透视
杜宇
- 垃圾出城记
刘阳 张天娇
- 潮人“驴屎蛋”的垃圾分类梦
刘阳
- 起步 20 年：垃圾分类缘何踏步不前
李舒 季明 陈冀
- 垃圾分类不能停留在“开始起步”
刘阳
- 垃圾焚烧“中国式困境”调查
陈冀 李舒 季明
- 让垃圾焚烧成为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蓝建中 郭洋
- 电子垃圾，日本的“稀有金属矿”
钱铮

导言 化解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

不调研不知道，全国竟然有逾 1/5 的城市没有规范垃圾处理设施。

不调研不知道，垃圾分类试点搞了 20 多年，竟然还处于原地踏步阶段。

不调研不知道，一些城市面临垃圾围城困境，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和社会稳定。

2014 年年初，新华社记者历时两个月，跋涉几千里，采访数百人之后记录下来的，我们也尽可能将其原汁原味地展现给读者。

这是一些沉重的文字，展示了如山的困难，也展示了如山的责任。这困难、这责任，摆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面前，也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希望每个人都能正视这些困难，担起自己应尽的那份责任。

垃圾围城，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现状的危急，更在于困局的难破。化解这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需要基础设施投入，需要制度设计创新，更需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逾 1/5 的城市尚无规范垃圾处理设施

记者 2014 年年初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我国有 138 个城市没有规范垃圾处理设施，占城市总数的 21%。与此同时，现有设施超负荷运行情况非常普遍。

这些城市多处于中西部边缘，基本属于中小城市，没有符合规范条件的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垃圾处理方式基本属于简单填埋。

一方面是设施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却是持续增加的垃圾清运量。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 1.71 亿吨，比 2010 年增长了 1300 万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形势不容乐观，“垃圾围城”现象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记者 2014 年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调研发现，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理能力相对不足，一些城市面临垃圾围城困境，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和社会稳定。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3 个。第一，设施选址难。长期以来，一些城市政府普遍对生活垃圾处理问题重视不够，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没有做到预先规划，设施用地不能保证正常供给。

第二，新建设施落地难。近年来，由于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现有设施运营水平不高和“邻避”现象，反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反对建立焚烧生活垃圾设施事件，导致许多已经规划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无法落地，甚至影响到部分已建成设施的正常使用。

第三，投入不足。虽然近年来加大了中央资金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投入，但缺口仍很大，地方财政投入更显不足，有的甚至没有配套。

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各地区开展了大量工作。2012 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 44.6 万吨/日，无害化处理量 1.45 亿吨/年，无害化处理率达 84.8%。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2014 年政府以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为重点工作来推进，采取措施督促没有规范垃圾处理设施的城市尽快形成处理能力，已有规范垃圾处理设施的城市要加快形成备用处理能力，“垃圾围城”状况有望得到进一步缓解。

垃圾围城忧思录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今日的中国显得尤为突出。

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难题，必须用发展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13 亿多国人产生的垃圾总量不断攀升，2012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 1.71 亿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环保维权意识的持续增强，新建垃圾处置设施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城市现有垃圾处理能力已接近饱和或超负荷。

垃圾围城，令人担忧的，不仅是现状的危急，更在于困局的难解。化解这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风险，需要基础设施的投入，需要制度设计的创新，更需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现状：无处安放的垃圾

尽管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1/3 以上的城市遭遇“垃圾围城”，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 500 平方千米；但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垃圾处理只是从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离，只要每天有人来收集垃圾，垃圾围城就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2014 年年初，经过近两个月的全国性调研，新华社记者发现，垃圾围城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唯一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所。1991 年投入使用时标高为 30 米，20 多年过去了，占地 1840 亩的填埋场如今标高已达 102 米，而 165 米就是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 6 年。

“巍巍天子岭”式的局面，是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目前国内最为传统也最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填埋，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

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1997 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理垃圾能力 980 吨，设计使用寿命 13 年。然而，直到今天，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再由专门的大型垃圾车缓缓地上离地数十米高的垃圾山，实施填埋作业。

“超期使用 3 年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第四任场长、北京环卫集团运营有限公司填埋事业部部长陈鹏说。由于新建垃圾处理设施的进度不如预期，导致这座原本计划在北京奥运会后就正式封土停用的垃圾填埋场不得不超期服役，为此甚至不得不把原先的绿化带都挖掉，以作为新的垃圾堆放地。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北京，日产垃圾 1.8 万吨；上海，日产垃圾 1.9 万吨；广州，日产垃圾 1.8 万吨。如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快成为垃圾山。杭州环卫部门有个形象的描述：过去全城产生的垃圾需 6 年才能填满整个西湖，如今只需要 3 年。

2014 年，时任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说，如果还是走填埋的老路，那么到 2016 年广州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将饱和，“3 年以后，垃圾将无处可埋。”

记者调查发现，更隐性也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过去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认识不到位，许多只是经过简单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填埋场，不仅成为让周边居民不敢开窗的臭气来源，更成为次生污染的发源地。

记者在南方某市一座垃圾填埋场附近看到：尽管有简单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装置，但只要大雨来临，这些设施就形同虚设，雨水迅速混合着黑臭的污水冲向下游村庄。

周边的村民说，这些年来深受污染所害，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耕地绝收，种出来的香蕉是黑心的，稻米的米粒是黄色的，耕牛喝了河水以后纷纷死去，村里得呼吸道、肠胃疾病的比例明显增加，根本不敢让孩子们到河边嬉戏。

“垃圾围城绝对不是伪命题。”时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说，

“现阶段中国的垃圾围城，一方面体现在生活垃圾产生和管理的整个过程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体系，另一方面是指垃圾如果不经无害化处理，就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困局：垃圾处置设施四处碰壁

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当各级地方政府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主要经济指标之时，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目标却往往落空。

早在 2007 年，杭州就曾提出到 2011 年主城区垃圾焚烧率达到 50% 以上，但实际情况是 2007—2011 年，主城区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仅从 32.19% 提升到 35.83%，一年提升的指数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更早之前的 2000 年，当时的建设部就曾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 13 年过后大家发现，当年的试点如今还在试点，垃圾分类的进展步伐“比蜗牛还慢”。

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置进展的缓慢，加剧了垃圾围城的紧张局面。北京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总处理能力约为日均 1.03 万吨，每天缺口达 8000 余吨。除了北神树，北京其他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也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在广州，从 2013 年年底到 2014 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烧项目密集开工，以实现到 2017 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十二五”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在 2008 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 3000 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 100 多吨焚烧过的炉渣。

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

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但各地发展垃圾焚烧的雄心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垃圾焚烧厂纷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甚至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数年前曾规划兴建 5 个垃圾焚烧厂的北京，就因为阿苏卫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强烈抵制，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

在广州，尽管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但当时驻厂的村民监督办公室副组长和周围村民仍然不满意。“每晚 12 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进厂卸料时，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

如果说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那么，恶臭则是许多民众抵制另一种垃圾处置设施——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的主要原因。

2013 年夏天，一则关于“上海垃圾处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取堆肥发酵工艺、处理餐厨垃圾的国清垃圾厂。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新泾村村民王某说，村子离垃圾厂就一河之隔，虽没有如网文中所说“吃苍蝇拌饭”那么夸张，但碰到刮东南风或夏季高温时，味道确实特别大，令人作呕。

为了缓和周边居民的情绪，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监管下，国清垃圾厂已采取减量处理的整改措施，2014 年年初，日处理垃圾由 2012 年的 700 吨/天减少到 459 吨/天，同时还落实了 600 多万元资金，从“水、气、渣”3 方面进行整改。

一个个为解决民生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普遍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

出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每天下午 5 点，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古美三村的居民们都会走出家门，在

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将过去一天积累的垃圾分为干湿两类，分别丢弃到两个垃圾桶中。

此后，古美三村的保洁员黄师傅就会对干湿分开的生活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将纸板、金属、玻璃、塑料袋、废旧电池等从干垃圾中拣出，将饭盒、塑料餐具等从湿垃圾中拣出。每天经黄师傅二次分拣后的干湿垃圾大约能装下 10~12 大桶，环卫公司将给予每桶 5~8 元的奖励。

经过二次分拣的垃圾，由环卫公司的电瓶车上门进行分类收集，中转后分别转往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活处理厂实现末端处置。

时任古美街道办事处主任徐知告诉记者，尽管推进相当艰难，但以“二次分拣”为特色的垃圾分类“古美模式”还是取得了明显实效：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连续两年下降，2014 年已减少到 0.52 公斤/天，低于上海全市 0.74 公斤/天的平均水平。仅 2013 年一年因垃圾减量而节约的垃圾清运成本就达到 113 万元，为今后持续的资金投入创造了条件。

古美的试点，只是全社会向垃圾围城宣战的一个缩影。社会各界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之策。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政府责无旁贷。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要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定垃圾处理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更要求政府以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铁腕治理垃圾处理问题，把相关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企业要更加有所作为。“循环经济上市第一股”格林美董事长许开华介绍说，一块手机电池，可污染 5 吨水体或者 0.5 平方米土壤，而其含有的锂属于稀有金属。手机电路板更有 3‰的黄金，含量远超一般的金矿。“资源有限、循环无限，只有充分开采垃圾这座‘城市矿山’，才能点亮美丽中国。”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也需要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和参与。网名“巴索风云”的罗建明由过去的环保公益事业热心者转为专职的“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总干事。日前，这家 NGO 给广州 30 多个政府部门发函了解该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得到了包括市公安局在内的 9 家单位的回复。“环保公益组织，一方面要教育民众，另一方面要协助和监督政府。”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最终需要的是全民参与。时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局长曹亚中告诉记者一个调查结果，在垃圾分类方面，退休老年人做得比青年白领要好，老旧小区做得要比高档小区好。“这说明，垃圾分类与居民文化程度、收入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关键还是意识是否到位。”

在拥有 13 亿人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在城镇化率已过 50%并还将继续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刚刚起步……

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也是买单者

不管你是不是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不管你承不承认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在垃圾这个问题上，你都深深参与其中，且是重要的一环。你是垃圾的制造者，处理不当的话，也注定是受害者。

面对垃圾，第一次感到灵魂深处的震撼，是2009年和摄影师王久良一起踏访北京的“野垃圾场”。冬天的北京没有树叶，凄厉的北风吹过，垃圾场周边的树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像嘲笑我们的妖怪。

塑料袋、包装盒、玻璃瓶、牙刷、衣裤、泡沫板、馒头、蛋糕、炸鸡腿、电池、粪便……许多生活中熟悉的物品，以一种不熟悉的形态展示在面前，它们山一样地堆在那里，淌着黑水，散着恶臭，一天比一天腐烂。

挑战神经的还不是气味，是在垃圾上寻找食物的羊和鸡。每天上午10点多，放羊的村民赶着羊准时路过，羊群欢叫着冲上垃圾场，翻捡头天夜里城里人留下的“垃圾盛宴”；而鸡的步伐更加从容，它们不需要着急赶路，天黑前的时间足够它们享受美餐。距离垃圾堆不远，是一片藕塘，这里的莲花出自垃圾水滋养的淤泥，想不染怕也不行了。

若干天后，这些莲藕、鸡和羊，也许会香喷喷地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开始它们生命中的下一个轮回。

王久良说：“就是从看到这些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吃饭绝不剩下一粒粮食，绝不用一次性用品。”

4年后，又一次关注“垃圾围城”，有喜有忧：

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的“野垃圾场”还有，但已经很难找到了，乡村也有了垃圾回收体系。

正规垃圾填埋场上空盘旋的秃鹫没有了，恶臭也小了很多。因为采取了“全覆膜分隔掩埋”，通俗地说，就是将垃圾压缩后用塑料膜打成一个个3米×3米的大包，像包饺子一样一层一层堆起来。但垃圾渗滤液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了，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外，二德庄村边的小河散发着恶臭，黑色的污水顺流而下直接流入温榆河，而温榆河畔是北京的豪华别墅区。

垃圾焚烧厂、餐厨处理设备越来越精良，在终端园区确实很难闻到垃圾的腐臭，但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的脚步却依然迟缓，垃圾运输车辆的密闭和气味仍然令人担忧。所以，不要以为住别墅、吃喝“高大上”就可以不为环境污染所累，不要因为不用付费就随意扔掉垃圾而自得，不要因为偷懒不对垃圾进行分类也没人管而放肆。

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也是买单者。

“垃圾围城”六大焦点透视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垃圾围城”愈发成为城市发展之痛。

垃圾处理形势究竟怎样？应该怎么看待垃圾焚烧？垃圾分类难在哪里？“垃圾围城”能否得到缓解？围绕这些热点话题，2014 年年初，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

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问题愈发凸显

问：怎么看“垃圾围城”现象？

答：在我们看来，“垃圾围城”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当前垃圾处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2012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 1.71 亿吨，比 2011 年增长 700 万吨，增长速度有增无减，总量很大。超负荷运转也大大缩短了垃圾处理场的寿命，设施能力不足问题愈发凸显。针对这种情况，2011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垃圾处理问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运用综合手段，全面解决垃圾处理问题。这一意见是垃圾处理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目标任务已经明确，下一步依靠各级政府的认真落实。

垃圾处理能力的增长超过产生量的增长

问：“垃圾围城”现象能否得到缓解？能否给出一个时间表？

答：目前，我国垃圾处理水平有所提高。2012 年我们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承

接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等级评定工作，累计 490 座填埋场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约占全国填埋场总数的 84%。

尽管垃圾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目前垃圾处理能力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产生量的增长，据我们所知，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是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总投资达到 2636 亿元，新建处理能力 39 万吨/日。2013 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 44.6 万吨/日，比 2011 年提高了 9%，无害化处理率 84.8%，比 2011 年提高近 5 个百分点。

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完善相关标准，制定健全规范，加大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监管；企业要高标准运行，把握企业利润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要积极参与，出谋划策和监督，大家都朝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

焚烧技术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理性选择

问：目前，一些城市大量建设垃圾焚烧厂，而一些群众反对在周边建设，究竟应该怎样看焚烧这种处理方式？

答：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垃圾填埋比例偏高，焚烧比例较低。填埋为主，意味着要不断占用土地资源。一些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已没有土地可供填埋，采用焚烧技术是当前解决垃圾问题的理性选择。

焚烧处理方式已经在外国发展了 100 多年，技术成熟。我国从 1988 年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经过 20 多年的消化和科技攻关，已经基本掌握国外主流的焚烧技术，主要装备实现了国产化。从目前已经建设运行的设施来看，2013 年检查的 54 座炉排炉型焚烧厂全部通过了无害化评定，其中评定为 A 级以上的占 93%，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

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可知、可防、可控

问：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如何处理？

答：二噁英是可知、可防、可控的，它的主要来源不是生活垃圾焚烧，在焚烧炉内充分燃烧是减少生成的根本，同时可以通过布袋过滤、活性炭吸附等技术措施，有效减少二噁英的排放。而规范的焚烧设施建设运行，实际上大大削减了二噁英的排放。目前，我们已经有了较健全的建设、运行、维护、评价标准，国内外的排放标准都是安全的。我们不可能最终消灭二噁英，但我们可以在综合考虑环境、经济、人体健康风险等多种因素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减少二噁英的排放。

垃圾分类开始起步

问：尽管一些城市推行垃圾分类，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从全国来看，垃圾分类进行得如何？

答：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已经开始起步。各方普遍认识到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工作，要从每个家庭、社区和单位做起，减量分类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国民素质和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紧密相关，现阶段应着重考虑设施建设和源头减量。

垃圾分类推进五大难点

问：您刚才提到垃圾分类工作开始起步，推进这项工作主要难在哪？

答：一是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还不一致，大家普遍有了认识，但路径、技术路线还不是非常清晰，我们的“拾荒大军”和废品回收体系已经把垃圾总量的 20%~30% 回收了。

二是分类意识变成自觉行动还需要时间。由于垃圾分类对于个人来说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专门分类反而会多花时间和精力，多数人都会把垃圾分类的行为无限期延迟，理由有很多，诸如不理解垃圾如何分类、没有时间、垃圾后端不配套而缺乏信心等。

三是缺乏垃圾分类的协作机制。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相关单位和部门之间的配合度不够，垃圾分类工作单靠一个部门完成难度很大。

四是缺乏相应的经济政策配套支持，资金缺乏保障，很多城市实行垃圾源头分类后，后续的分类收运车辆、处理处置设施配套较困难，导致垃圾分类后又集中运输和处理处置，使居民的分类收集热情大大受挫。

五是缺乏约束机制。由于垃圾分类还未形成固有的社会行为规范，对公众垃圾不分类的行为，除了监督和规劝，找不到其他更有效和有力的措施。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就垃圾处理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提出要建设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相信垃圾分类工作将会有大的进展。

垃圾出城记

对大多数人而言，垃圾被丢弃之后即从视线中消失。

居民家中产生的生活垃圾会经过哪些处理流程？经历多少环节？最后流向何方？为了解垃圾从产生到消亡的全流程，2014 年年初，冬日里的一天，新华社记者历时半天跟踪记录了北京市西城区天仙胡同甲 13 号生活垃圾的“出城之旅”。

10 时许，北京闹市口附近天仙胡同甲 13 号一家当地小有名气餐馆的门口，已经摆放了一堆垃圾。从外观看，垃圾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各种菜叶、丢弃的餐巾纸、账单、塑料袋，以及剩余饭菜等。

10 时 3 分，一辆印有“金融街保洁 31”的三轮电动垃圾收集车开进胡同。开车小伙子兼职垃圾收集员，麻利地将堆在门口的垃圾塞进垃圾斗。“这些垃圾里有纸和剩饭，环卫部门不是要求居民对垃圾分类吗？”记者看着混杂在一起的垃圾问。

“我们单位也没说分类不分类，我只负责送到垃圾站就行。”小伙子指着垃圾说，“这都是生活垃圾，脏不唧唧的，你说该怎么分啊？”说话间小伙子骑上车子继续前行，渗沥液顺着垃圾斗的空隙一路滴下。

10 时 15 分，记者跟随三轮车来到位于佟麟阁路的 006 号北京市西清洁服务中心密闭式清洁站，31 号保洁车在这里将垃圾卸进密闭式垃圾仓，等待下一步转运。

“在这儿收集的垃圾直接运到填埋场吗，有没有分类？”记者问清洁站管理员苟某。

“先得送到马家楼分选转运站挤压处理，西城区的垃圾全往那儿拉，挤压去水后再用几十吨的大车拉走。”苟某说，“分类嘛，我们这没有，直接装箱拉走。”

10 时 28 分，一辆印有“北京环卫集团 4-N253”字样的平板卡车驶入清洁站。

倒车、卸箱、装车……几分钟时间，总重量4吨多的满载垃圾箱就被拖离了清洁站。

11时15分，记者跟随着平板卡车来到位于南四环附近的马家楼分选转运站，这里汇合东城区和西城区部分生活垃圾并分选出5部分，然后分别打包运往填埋场和堆肥厂。转运站内非常干净，除了核心操作区尚存些许臭味，场站四周都被除臭剂覆盖，并无异常气味。

“将垃圾卸入料仓后，我们通过滚筒筛筛选、振动筛筛选、磁选和风选等工艺先将垃圾中的金属、塑料和纸张等筛出，然后再分别筛出0~15mm垃圾作为填埋场覆盖土，15~80mm垃圾作为堆肥原料，大于80mm的垃圾则进行填埋或者焚烧。”马家楼分选转运站站长石桂祥说，“转运站的工作一方面是尽量将垃圾资源化，另一方面是为后端处理做好准备。”

在石桂祥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分选打包操作平台。垃圾进入料仓后马上被传送带送至各个筛选环节，几分钟后就进入多个专业运输箱，它们在三四个小时内会被分别送往南宫堆肥厂、安定垃圾填埋场以及资源化利用场所。

“垃圾分选转运工艺并不复杂，但分选之后的处理却越来越麻烦了，北京市现在几乎所有的垃圾填埋场都在超负荷运转，焚烧发电应该是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最佳渠道，且现在的技术已经达标，对有害物质完全可以控制，但因为有的居民反对而导致焚烧厂建设严重滞后。”石桂祥说，“这就需要公众对垃圾焚烧有一个科学、理性的再认识，珍贵的土地资源不能再轻易浪费了！”

中午时分，随着几辆大卡车陆续开出马家楼分选转运站，当天早晨堆在天仙胡同甲13号门口的垃圾被分类送往各个处理场所，此时距分选站40多公里的安定垃圾填埋场迎来一天中的作业高峰期。望着这块2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的日益长高的“垃圾山”，记者心中百感交集。

潮人“驴屎蛋”的垃圾分类梦

拢了拢“莫西干”式的发型、扶了扶白色边框的时尚眼镜，潮人“驴屎蛋”将传送带上的烂白菜帮子往里推了推。

“我现在特喜欢这味儿，一天闻不到就难受。”他贪婪地吸了几口让普通人避之不及、带有腐臭味的空气。

“驴屎蛋”是律师黄小山的网名。

这个住别墅、开豪车的律师近年来投入 100 多万元，先后试验了 5 次，在北京市小汤山附近建造了一所绿房子，干着一件在好多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分类垃圾。

“绿房子的核心功能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做前端预处理。”谈起绿房子，他显得格外激动，“处理厨余垃圾最大的困难就是水分太多，超过 2/3 的‘内容’都是汤汤水水，所以挤掉水分就是处理生活垃圾的第一步。”

十余平方米的绿房子内，一台螺旋压榨脱水机格外引人注目，它可以将垃圾脱水，实现垃圾减量。

“驴屎蛋”说，经过这台机器脱水的垃圾起码减量 50%。他如数家珍地算了一笔账：减量 50%，运输垃圾的运费就要减少一半，同时减少了对路面的污染；如果水分不减去，其他污染物混合在一起渗透到土地里，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如果混合其他垃圾焚烧，会使垃圾焚烧的热值不够，炉内温度难以到达 800℃，会增加二噁英的产生量。

“驴屎蛋”最早出名，是因为反对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

“我不是反对垃圾焚烧，而是反对在干湿不分离的情况下的垃圾焚烧。”他告诉记者。

从一个环保主义者到环保产业参与者，“驴屎蛋”悟出了一个道理：垃圾问题是个哲学问题。“说到底垃圾问题符合哲学的三大根本问题，垃圾是什么？从哪来？到哪去？我认为，研究垃圾问题最终要回归到研究如何对待产生垃圾的人，如果从这些角度考虑，垃圾问题才能解决。”

“从最简单的人性考量，在没有奖励、没有处罚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做垃圾分类？”研究如何对待产生垃圾的人，成了“驴屎蛋”夜以继日琢磨的问题。

他自问自答：“一方面垃圾分类很重要，另一方面机制尚未建立，绿房子此时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就是帮老百姓完成垃圾分类，启下就是最大限度地把干垃圾里面有用的东西拣出来，把湿垃圾用破碎机打碎，通过脱水机脱水，再与垃圾焚烧厂、填埋场对接。”

说话间，绿房子外面响起了一阵喇叭声，一辆车送来了当日收集的纳帕溪谷小区的生活垃圾。

“今天不是周末，量不多，估计有 400 公斤左右。”打量了一眼垃圾桶，“驴屎蛋”赶忙招呼着工人前来收拾。工人先将垃圾倒到传送带上，在传送带缓慢运行期间将其中的塑料、纸张等可回收和不可降解的垃圾拣到身后的垃圾桶内，这些将被回收或送去填埋焚烧；将剩饭菜、烂水果、粪便等各种垃圾送入设备内，经过破碎压缩变成了黑绿色的泥状物，这些用来堆肥；垃圾污水则直接排入地下污水管道。

在“驴屎蛋”的设想中，绿房子的功能不限于分拣垃圾。

“绿房子应该延伸到居民社区，是具有统一标志、统一形象并进行统一管理的连锁式的，集干湿垃圾二次分拣、资源回收、厨余垃圾脱水减量等功能于一体的垃圾集约化中转平台。”“驴屎蛋”说，绿房子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后，可与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环节有效对接，并起到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减少政府对垃圾财政支出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提高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

“驴屎蛋”正在复制绿房子模式，但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虎。

“第一个绿房子花的 100 多万元，还有绿房子团队的工资、生活费等都是我个人出资，再要个人掏腰包的话，我确实撑不下去了。”他说，“投入的这些钱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就拿出来了。再多的话，我肯定不投，这件利国利民的事要发展下去，应该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有了盈利点，加上政府的支持，绿房子才能走上正轨。”

采访过程中，记者曾对“驴屎蛋”做绿房子的动机表示了些许怀疑。他对此反应极其强烈：“我做这件事，就是出于公民责任。我要让政府看到，我们不光会用嘴批评政府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的作为不够，我们也在用脚趟一条路，没准这条路还是条捷径。”

起步 20 年：垃圾分类缘何踏步不前

2014 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费从过去的每吨 25 元上调为 300 元，增幅达 11 倍，明确释放出政府管理部门希望依靠市场化手段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决心。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1993 年，北京率先制定了《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2000 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 8 个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然而，20 年后的今天，记者站在北京最繁华、最时尚的 CBD 国贸核心区，随意打开建外 SOHO 社区的分类垃圾箱，看到的依然是废纸、饮料瓶、牛奶包装、塑料餐盒和食物残渣混杂在一起。除了定时来翻捡饮料瓶的拾荒者，很难判断哪些垃圾能够被回收和再利用。

20 年来，政府投入巨资试图引导居民对垃圾进行简单分类，使它们能够被资源化利用。但垃圾分类的尝试在国内多个城市至今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的窘境，没有被居民接受，长期处于“试行”状态。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在两个多月的调研中，记者试图求解垃圾分类困局。

孙大妈的困扰：期待分类管理精细化

孙大妈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摆着 3 个一米多高的垃圾桶。按照墙上的分类指示，绿、蓝、灰 3 个垃圾桶分别装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在孙大妈看来，小区内阻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因素，至少有4个：

“小区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是绿、蓝、黑垃圾桶各一个，但据我观察，离单元楼口最近的那个桶总是最先装满，然后人们才会多走一步扔在其他桶。”孙大妈告诉记者，“像我这样进行认真分类的居民，常常看到厨余垃圾桶爆满，不得不扔到其它垃圾桶里。”

后来，孙大妈发现单元门口的垃圾桶变成了两个黑桶，一个蓝桶；而地下停车库的垃圾桶则变为两个绿桶。“也不知道是环卫运输垃圾时调换的，还是桶坏了换的，反正不管哪个桶，里面的垃圾都没有分类，环卫来了也是一车拉走”。

“每天都有拾荒者来翻捡垃圾中的纸板、饮料瓶等，他们在翻捡时，图省事，把这个桶的垃圾翻出来，留下有价值的，剩余的就扔进另一个桶，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分好类的垃圾，也全乱了。”孙大妈说。

仔细勤俭的孙大妈每天会把家里的废纸盒、饮料瓶、易拉罐等可以卖钱的垃圾留下来，一个月卖一次。但这个好习惯遭到了儿子、儿媳的反对，“一个饮料瓶几分钱，一斤废纸三四毛钱。一个月卖不了十块钱，又占地方。”

像这样流于形式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在北京、广州、上海等许多城市普遍存在。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危伟汉介绍，2013年广州市城镇社区基本开展了垃圾分类推广，但开展较好的小区仅有30%，“很多街镇流于形式，没有进展”。

在上海，杨浦区的建德国际公寓是上海市选定的试点小区之一，但居委会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志愿者会对分类进行指导，但居民自觉将家中干湿垃圾分类的比例只达到30%~40%。

在民间环保组织“宜居广州”总干事“巴索风云”看来，很多居民不是不知道要对垃圾进行分类，而是嫌麻烦，而且垃圾种类太多，搞不清哪些可再生，哪些不可回收。“巴索风云”告诉记者，经过抽样调查发现，87%的人知道所在小区在做垃圾分类，但知道垃圾分4类的只有20%，能回答如何分的只有7%。垃圾分类工作目前主要依靠街道和社区去做，但这只是他们工作中很不重要的一环，也没有严格的考核机制。

面对没有被分类的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垃圾被送到这

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烧的。”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北京，每天产生垃圾 1.77 万吨，其中一半焚烧、生化处理，另一半直接填埋。时任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秘书长王吉位认为，这些被焚烧或填埋的废弃物，如果前期分类得当，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被利用的。

“一说到垃圾分类，许多地方都会在居民小区摆放分类垃圾桶，在单元门口张贴告示，却从不调查小区每天各类垃圾有多少，年轻人和老年人扔垃圾的习惯有什么不同，垃圾桶是否应该按照各类垃圾量的多少来设置，拾荒者能不能利用起来，环卫一天中该何时清运。”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徐海云认为，“做好垃圾分类的前提是垃圾管理精细化。”

“蚂蚁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类收集正规化

想利用拾荒大军这支垃圾分类有生力量的不仅仅是徐海云。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2008 年从 IT 公司老板改行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合作。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蚂蚁雄兵”，希望利用市场化手段收编“拾荒大军”和“收卖点”，将垃圾利用产业化、规模化。他一度收编了东山街的 100 多个“收卖佬”（拾荒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截至 2014 年，杨静山只发展了 2 个街乡，“差不多要放弃了”。

当时他相信，政府早晚会扶持垃圾回收，但期待中的政府补贴并没有到来；而且因为无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区，生产规模上不去，企业盈利很艰难。

杨静山认为，“垃圾”是能出效益的，按照他的构想，盈利来源主要有 4 个方面：一是厨余垃圾处理厂；二是旧服装处理厂；三是有毒有害垃圾处理厂；四是街道的广告经营。他希望通过垃圾减量的成果获得政府补贴。“目前政府处理一吨垃圾要给焚烧厂和填埋场补贴，如果我减量了，也应该有补贴。”

杨静山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社区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服务点，这样就不会面对无垃圾可收的困境了。“所有的低价值垃圾，例如旧衣服、玻璃瓶，目前都没有建立回收体系，只能直接送去焚烧或填埋。一旦形成规模，这些东西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广州一年要淘汰 300 万~400 万部手机，由于没有规模化收集，根本无法处理。”

杨静山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积极性，城管委说自己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没有影子。”

杨静山的命运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中具有代表性。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城市垃圾分类十分先进，大街小巷都有“废品回收站”，然而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拾荒大军”的崛起。20 世纪 80 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拾荒大军 10 万人，在北京，这个数字超过 16 万人。可是，他们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受到打压，因此这股垃圾分类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导致目前许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地沟油泛滥。

记者在北京市探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后发现，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无资质名称、随意排污、圈地收费和消防隐患等问题。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记者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小作坊的经营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着泡沫。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位于昌平区歇甲村的北京恒丰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一个塑料回收小作坊内，十多名工人正忙碌地将堆积成山的饮料瓶粉碎，作坊老板见到记者十分激动：“我们在做循环经济，却天天被驱赶、关停。”

据有关专家介绍，一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一些正规的、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却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够多的饮料瓶。

同样的一幕也在厨余垃圾领域上演，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循环经济园区调研发现，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有 5 条生产线，日处理能力达 400 吨，但由于收不到足够的餐厨垃圾，目前仅开通了 2 条线。与此同时，北京的许多餐厨垃圾却在夜幕中流向城郊的“养猪场”。

据对北京市 15 个规模较大的废品回收场站的调查，仅有 3 个回收站在工商信息网能查到营业资质，其余 12 个回收站不挂门牌，开办者“像圈地收费的地主”，

公开对外“招商”，管理混乱，污染严重。

徐海云认为，政府部门对民间垃圾回收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的监管出现真空，导致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不完整，城市建设中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造成环境再次污染。

“很多地方热衷于申请动辄上亿元的垃圾处理场工程，对只需要几百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就可以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设却缺乏兴趣，甚至有畏难情绪，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徐海云说，“此外，过度依靠政府投入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也难以为继。”

200 克茶叶 3000 克包装：期待分类减量源头化

一个不足 10 克的 U 盘，纸板和塑料膜的包装接近 100 克；一盒 250 毫升、2.5 元的牛奶，其包装成本约为 0.5 元，包装材料由纸、塑料、铝箔复合 6 层；一盒净重 200 克的茶叶，其木质包装盒重达近 3000 克，包装物有铁盒、塑料纸、纸张、塑料泡沫、丝绸等……

这些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小细节，带来了诸多后期无法分类和处理的垃圾。

以最常见的利乐牛奶盒为例，专家告诉记者：“除了利乐公司自己在艰难回收外，国内能回收的利乐产品只有 10%~15%，近 90%进行了填埋或者焚烧，而在欧盟国家，利乐产品的回收率在 70%以上。”据测算，在我国如果将利乐包这样的复合包装全部再生利用，每年至少可以节约 9000 吨原生纸浆、2400 吨塑料、600 吨铝，还有大量的填埋空间。

然而，因为将金属、塑料和纸分离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所以国内一般的造纸厂不愿意回收复合纸板材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盒外面贴了胶带，一张纸封了塑料膜，就基本不能再利用了。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一个废品回收点的邓师傅告诉记者：“易拉罐 1 毛 1 个、饮料瓶也 1 毛 1 个，废报纸 4 毛一斤，这种牛奶盒、塑化压膜的纸板不值钱，厂家不收，酱油瓶、玻璃瓶都不值钱，只能当垃圾。”

商品包装通常会在设计上追求色彩鲜艳夺目，在材质上追求多种材料复合，而华丽包装所用的彩色油墨和复合物非常不利于回收处理。相反，越简单、透明的包装就越好分解，对于消费者来说卖废品时也越值钱。

然而，即使是简单包装，浪费也是惊人的。徐海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一年约生产 12 亿件衬衫，其中 8 亿件是盒装，8 亿只包装盒需要用纸 24 万吨，如果以直径 10 厘米的大树计算，7 棵树才可以制 1 吨纸，8 亿只包装盒相当于要砍伐 168 万棵大树。仅衬衫包装一项，消费者一年就“用”掉一大片森林。而包装衬衫所用的纸盒，在全部商品包装中只是九牛一毛。2013 年我国年包装产量达 3000 多万吨，而总体回收率还不到 30%。

专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里面有 1/3 都是包装性垃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过度包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包装废弃物体积占固体废弃物一半，每年废弃价值达 4000 亿元。而我们身边的诸多包装物，材质涵盖了纸类、塑料、金属、玻璃、陶瓷、木材、水晶及复合材料等，多为非环保材质，无法再利用。不少产品包装中还有大量缓冲材料和填充料。因盒子体积大、形状各异等原因，使得回收利用的运输仓储成本都较高。

在北京，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已高达 400~500 元，每年处理垃圾的费用高达 20 多亿元，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垃圾处理。“如果减少不必要的包装，每年可节省数亿元。”时任北京市市政管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李向东说，“尽管对居民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收费尚无时间表，但垃圾减量的观念应该在全社会树立。”李向东说，垃圾处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是“减量、再利用、再循环”。首要的是在源头减量，这个源头不仅是在居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更应该追溯到产品生产商。针对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包装垃圾，当务之急是完善绿色包装强制标准，加强监管，对不执行标准的企业严厉处罚。商家生产产品时，就应该将垃圾处理、资源再利用考虑进去，如果包装不是环保材质，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就应该缴纳环境税用于垃圾处理。

垃圾分类不能停留在“开始起步”

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生活已被垃圾包围。

北京，日产垃圾 1.8 万吨；上海，日产垃圾 1.9 万吨；广州，日产垃圾 1.8 万吨……在中国，一座座垃圾山疯狂侵蚀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

“垃圾围城”困境怎么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是业界公认的最终出路，而减量化是先决基础。早在 2000 年，当时的建设部就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直到 2014 年，试点依旧还在试点。“垃圾减量分类工作已经开始起步”，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的表述耐人寻味。

对于每个人来说，垃圾分类会多花时间和精力，但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挑战时，一切理由皆不成为理由。垃圾分类是全社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个人、家庭、社区和政府无一可袖手旁观，需要全社会再造一套科学、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20 多年前的台北市，也存在严重的垃圾问题：企业乱排污、百姓乱扔垃圾。从环保教育入手，倡导前端垃圾分类投放，十余年如一日，台北居民遵守着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自觉将家庭垃圾分成资源、厨余和一般垃圾，在指定时间丢弃。1999 年，台北市家庭垃圾量为每天 2970 吨，到 2012 年降至每天 986 吨，减幅达 66%；资源回收率则从 2.4% 提升至 47.7%。台北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

一个个案例说明“垃圾围城”病并非无药可解，关键是要站在资源循环利用、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下定决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推进。一方面，政府责无

旁贷，应将更多公共财政资金投向垃圾处置全过程，以更严谨的态度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订垃圾处理政策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另一方面，需要全民参与，从垃圾分类、减量开始，再加上焚烧等技术的采用、资源回收率的提高，垃圾围城难题终将被破解。

垃圾焚烧“中国式困境”调查

日益突出的“垃圾围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必须面对的难题。政府想方设法突破困局，多以垃圾焚烧寻求突围。伴随着环保理念、权益意识的增强，一些地方特别是垃圾焚烧厂选址点附近的居民排斥建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置陷入重重困局。

居民痛点：垃圾焚烧厂点燃民意

在一些地方，建设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陷入“政府宣布建设—居民强烈反对—项目被迫搁置”的中国式困境，建与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意见僵持不下，似乎成了难以破解的死局。

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成为近年来反对垃圾焚烧的标志性事件。周边居民认为，焚烧厂的建立会给当地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二噁英，会严重影响健康。番禺区政府被迫宣布暂停该项目，时隔4年，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易址广州南沙新区。

在“番禺风波”示范作用下，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焚烧厂也遭到当地村民联名反对，最终周边村落整体搬迁。佛山市高明区、南海区西樵镇近千市民开展“戴口罩巡游活动”，反对佛山市南海区江南发电厂建设污泥焚烧项目。

事实上，关于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在各地多次发生：江苏吴江平望镇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遭当地数千居民抵制工厂点火，一度拥堵国道；北京有居民组织车队或在论坛发帖反对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深圳数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对建设白鸽湖垃圾焚烧发电厂……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居民和政府垃圾焚烧项目建设上存在较深的认知鸿沟，地方政府再三向居民强调垃圾焚烧厂技术成熟，全球许多国家都在采用，但居民对此表示怀疑，担心项目会给自家环境带来污染，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也缺乏足够信任。近年来，双方对峙程度不减反增，有的甚至从反对升级为冲突。

政府难点：民意与决策赛跑悖论

广州市番禺区火烧岗生活垃圾填埋场离当地政府所在地不远，周边是高科技园区及高档的写字楼和餐馆。记者驱车刚一进入填埋场，就立刻想掩鼻而逃。

建于1989年的这个垃圾填埋场，日处理垃圾2000吨，大大超过它的负荷能力。据现场管理人员李某介绍：“2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深潭，现在填埋的高度早已超过周围山头，比规划设计高出了十多米。”

站在这个超负荷运作的垃圾填埋场上，也许能理解政府急于垃圾突围的举措。我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两种，现在很多地方无地可埋，而焚烧推进困难，城市面临的垃圾处理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据时任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危伟汉介绍，作为拥有18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为1.8万吨，目前日处理量为1.4万吨，还有4000吨垃圾在农村就地处理。如果不进行控制，未来广州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将达到2.2万吨，仅凭李坑一厂最大日处理1040吨的能力，届时仅市中心每天就有超过6000吨垃圾无处可去。

“垃圾围城”倒逼政府寄希望于新建大型垃圾焚烧厂。

危伟汉强调，垃圾处理设施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市政公益设施，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由全体市民共享，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效应”，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焚烧厂的选址越来越成为公共事件，其顺利解决更依赖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态度。

从世界其他城市的经验看，越往后建焚烧厂，难度越大，因此早规划、速推进、快落地，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

多地政府都宣称建设垃圾焚烧厂势在必行，并且运行安全可控，排放优于国标，

但居民对此却表现出极度不信任。番禺反烧风波中的网民代表“巴索风云”坦言，有的城市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方式，却将群众的健康安全置于可能受损的境地。

社会疑点：三问垃圾焚烧处理

与近年来垃圾焚烧项目在各地呈“大跃进”式建设相应，对之质疑的声音也日渐增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问”。

一问：垃圾焚烧厂“大跃进”式的建设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

2013 年以来，广州市大量上马垃圾焚烧项目引人关注。在原有一座李坑焚烧厂的基础上，白云、萝岗、番禺、增城、花都、从化等各区市都分别规划建设一座焚烧厂。

一座城市 7 座垃圾焚烧厂是否会造成产能过剩？时任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目前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思路和“大跃进”式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相矛盾，如把更多力量放在垃圾的分类减量上，就可以减少垃圾焚烧厂的数量。

广州市城管委则称：“垃圾焚烧厂需求量是根据广州市目前及未来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来预测的。充分考虑了垃圾分类减量的成果，也充分考虑了地理位置、环境容量、运输路程等多方面因素。”危伟汉表示，“即使将来垃圾分类做好了，垃圾减量了，焚烧能力富余了，也可以把原来埋在地下的垃圾翻出来烧。”

从全国范围来看，垃圾焚烧厂建设似乎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据悉，上海正在老港规划建设一座日均处理能力为 6000 吨的垃圾焚烧厂，此外，金山、奉贤、崇明、青浦等区域也将规划建设不同规模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南宁市投资 10.8 亿元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总投资 8.13 亿元的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在大兴区开建……

客观而言，城市垃圾数量快速增长，垃圾处理的市场空间较大。

二问：焚烧厂运行环保安全如何监管到位？

垃圾焚烧项目上马，易在附近居民中引发恐慌。

关于焚烧无害化，居民对政府的解释始终难以信服。广州市山前大道金碧御水山庄的罗明海就表达了担忧：“就算建设的垃圾焚烧厂的技术世界一流，但好的技术没有好的运行与监督，其是否能达到无害化效果也是未知数。”

罗明海称，如足够高的炉温是保障焚烧中达到无害化或减害化的重要条件，但在垃圾未充分分类的情况下，餐厨垃圾的水分会降低炉温，要提高炉温，势必会增加成本。当公共利益遇到经济利益时，企业会为公共利益做牺牲吗？

广州市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以最新先进技术打造的“样板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厂排放出口的数据被实时连接到当地环保局管理系统，以及厂门口电子屏进行展示接受监督。

李坑垃圾焚烧厂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月会将相关监测数据汇总上报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于群众最为关心的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检测，厂方每年请专业机构来检测两次。

三问：“垃圾焚烧场建设是否科学”谁说了算？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垃圾焚烧是否具有毒害性等关键性焦点问题，不仅居民与政府间难以达成共识，在专家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各方争议较多的垃圾焚烧是否无害化问题，网民援引有关专家观点称，在西方，垃圾焚烧发电已成夕阳产业，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丹麦、德国、日本、美国，都在缩减垃圾焚烧规模。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缩减垃圾焚烧规模”的情况并不存在，相反还在大力发展中。

危伟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垃圾经过焚烧都是可以达到无害化处理的。”

民生焦虑：明天我们去哪里倒垃圾

一方面是政府强力推进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是居民高度重视环保、卫生利益，如何协调两者需求？如若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明天去哪里倒垃圾？

打破行政壁垒，实施利益补偿。时任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强调，垃圾焚烧厂选

址困难主要面临的是“邻避问题”，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为此，广州正在起草《广州市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区域生态补偿办法》，尝试使用生态补偿机制来缓和这方面的冲突。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城市间经济生活联系愈发密切，处理垃圾焚烧不能各自为政，更需打破行政地域限制，探索跨区、跨市的统筹布局。

充分吸纳民意，提高政府公信力。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彭指出，项目上马与否，一开始就要听居民的意见，要主动释放信息，进一步构建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渠道，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欢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反馈意见、参与讨论，防止居民与政府对立情绪的放大与蔓延。

制定科学标准，规范焚烧乱象。对于政府与居民围绕垃圾焚烧的诸多争议焦点，在缺乏规范标准的状况下，各地垃圾焚烧处理难免出现乱象。因此地方政府和居民期盼国家尽快确定垃圾处理的行业准则、安全距离、运营监管等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以解垃圾围城之困。

让垃圾焚烧成为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垃圾焚烧，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会产生二次污染，仅其中产生的二噁英就让人谈之变色。然而，对于德国、日本等垃圾处理先进国家来说，焚烧却是垃圾处理的重头戏，甚至是关键环节。在这些国家，密布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并未遭到民众的普遍排斥，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害化处理下功夫

记者 2014 年年初在日本参观了大阪市环境局下属的大正垃圾处理厂。这里不仅通过焚烧可燃物大大减少垃圾数量，同时还高效利用废热发电、提供热能，可谓一举多得。

让垃圾焚烧一举多得发挥作用的前提，必须是安全和污染小。记者在大正垃圾处理厂厂区看到，巨大的垃圾竖井深达 40 米，容量为 8000 立方米，可以装入约 2400 吨垃圾。工作人员在顶端的玻璃幕墙后遥控吊车，一次就能抓起 3 吨重的垃圾送入焚烧炉。

虽然垃圾如此之多，但厂区内并没有令人作呕的异味。这是由于垃圾产生的异味被抽风机抽取，利用空气预热器加热到 150~200℃，再送入焚烧炉，由于炉内的高温，异味物质都被分解了。

为了避免焚烧时产生致癌物二噁英，焚烧炉利用 850~950℃ 的高温使垃圾实现完全燃烧。工作人员通过监控屏幕，可以实时观看焚烧炉内的情形。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使用电气集尘器吸附，废气还要经过洗涤装置、过滤式集尘装置等处理程序，符合安全标准后才从烟囱排放。

可燃垃圾焚烧后最终形成的灰烬只有原来体积的 1/20 左右，对其中不能完全避免的一些有害物质则使用药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灰烬最后被运到大阪湾填埋。

当然，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厂，还有一项增值业务，就是对于铁柜、床垫、自行车等大件不可燃垃圾，提炼有用资源。工厂内也有各种大型粉碎设备，在将上述类别物质细细粉碎后，用磁选机选出金属部分作为资源出售；而金属上附着的纸、碎布条等，则用风力筛选去除，与其他可燃部分一起送入焚烧炉。

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被用于制造蒸汽，再由管道输送给蒸汽涡轮机进行发电，这些热量还能同时给工厂提供热水和暖气等。2011 年，这里焚烧了约 13.34 万吨垃圾，发电量达到 1910 万千瓦时，卖电 286 万千瓦时，收入达 2340 万日元。

据介绍，仅在大阪，像大正这样的垃圾处理厂还有 7 家。在全日本，众多城市垃圾焚烧处理厂的良好运营，对避免“垃圾围城”“垃圾填埋场污染水源”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透明运行获认可

德国环境部发言人沙夫施韦特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德国已实现社区里的垃圾“零填埋”。对于实在无法回收的垃圾，焚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用沙夫施韦特的话说，焚烧成为德国垃圾处理的“支柱”。

欧盟统计局数字显示，2011 年德国所有社区垃圾中，45%回收利用，37%焚烧，余下的基本上转化为堆肥。

既然严重依赖垃圾焚烧，却几乎没有垃圾填埋，德国是如何把全国巨量垃圾进行回收和分拣的呢？

沙夫施韦特说，首先，德国有着严格的垃圾分类标准，有机垃圾、纸张、包装、残余废物等都有自己的专属垃圾箱，民众对垃圾分类是垃圾分拣的第一道程序。也正因分类清晰，不可回收的残余废物很快被直接拉走，它们通常相对干燥，热值较高，方便用焚烧方式处理。

针对垃圾焚烧设施可能排出的废气废水，德国依靠《排放保护条例》《水法》等法律法规设定排放标准。例如，德国《排放保护条例》第 17 条就废气中二噁英、

呋喃和汞等成分作出严格限定。

沙夫施韦特说，在实际操作中，焚烧设施的排放往往比上限值低出不少。废气排放由焚烧设施运营商在网上向有关部门汇报。另外，焚烧设施运营商还要将废气测量数据等结果公布在每年的环境报告中，数据得到政府专门机构的监测。

按照他的说法，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高透明度运行、高水平的废气清洁处理与控制使得这种废物处理方式在民众中获得普遍认可，甚至在焚烧设施建设审批过程中就已得到公众的广泛参与。

沙夫施韦特说，垃圾焚烧可用于产电、产热、产蒸汽。焚烧后的灰渣部分可被加工成修路材料等。因此，只要做到安全可靠，垃圾焚烧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

电子垃圾，日本的“稀有金属矿”

在日本一些手机商店，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工作人员接过顾客递过来的旧手机，手脚麻利地操起专用工具对手机进行消除个人信息等处理，为回收作准备。这些被回收的旧手机，在日本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种“都市稀有金属矿”来开采。

事实上，日本生产和废弃电子产品的速度让全世界瞠目结舌。逐年增加的电子垃圾在 20 世纪末就已让焚烧厂和填埋场难以应付。而电子垃圾中包含的有害物质如不妥善处理，也可能对环境构成巨大威胁。相反，正确处理电子垃圾，却能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据日本媒体报道，数码相机和 DVD 的微型马达主要使用钨，MD 播放机等电子基板使用钨，液晶显示器含钨。如果能有效回收和利用这些废旧电子产品中的稀有金属，无疑等于在都市中找到了“稀有金属矿”。

日本是世界上稀有金属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其消费量占世界稀有金属消费总量的 25% 左右。然而，日本的稀有金属供应绝大部分依赖海外进口。日本经济产业省从 2007 年开始实施有关计划，回收利用相关产品与强化资源外交、增加国家储备，以及开发替代资源一起被列为保证稀有金属稳定供应的 4 大支柱。

在众多电子垃圾中，废旧手机是最好的“都市稀有金属矿”之一，它体积虽小，却含有钨、钨、钴和锂等十余种稀有金属。日本每年回收数百万部手机。回收的手机被送到工厂低温焚烧后，其所含的资源能够被提取再利用。

但日本有关专家指出，通过回收利用旧手机等开采“都市稀有金属矿”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保证一定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量。已有一些日本的县市开始在超市等


地设置回收箱，以收集废旧小型数字电器。在日本，生产厂家有回收冰箱、空调等大件家电的义务，但没有回收小型电器的义务，小型数字电器多半被当作一般垃圾丢弃。

其次，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阶段就要考虑如何进行资源回收。如果在制造产品时以资源再生为前提，那么稀有金属回收成本可能会大幅降低，回收再利用率也有望显著提高。

最后，要支持新技术的开发，以进一步降低回收稀有金属的成本。事实上，由于循环利用稀有金属的成本高，日本从手机中回收的主要还是金、银等贵金属。

处理电子垃圾，让人头疼的往往是那些混有金属的混合塑料等有机物材料，此类物质占到电子垃圾总量的 20%。如果对其焚烧，就可能释放二噁英。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就开发出一种废弃物处理新技术，能将废弃家用电器中的树脂等有机物转化成无害的气体，而剩余物就是要回收的金属。

当然，随着家电技术的发展，回收技术也面临变革，例如，平板电视机的普及，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的普及，都要求今后采用创新技术，才能达到高精度挑选、高纯度回收的目标，使“商品—使用—回收—再生原料—商品”的良性循环更顺畅。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日本电子垃圾处理也需要新的回收方式和技术来应对。



第五篇

交通篇

守望大国桥梁

➤ 导言 中国是桥梁大国或强国吗

➤ 桥梁跨度“第一”的背后：中国是桥梁强国吗

刘诗平 苏晓洲 丁 静

➤ “中国造”海外大桥十大“名片”

刘诗平 吴 涛

➤ “百年大计”要经得起“百年风雨”

樊 曦

➤ 中国高铁为何“大桥”为王

刘诗平 樊 曦

➤ 10万危桥：公路桥梁进入“建养并举”新时代

刘诗平 齐中熙 齐 健

➤ 城市桥梁：是“地标名片”，还是“病灶梗阻”

吴 涛 王 攀 丁 静 齐 健

➤ “孤岛贫困”热盼多修“村桥”

苏晓洲 齐 健 史卫燕 赵文君

➤ 古桥现状调查：留住“人间彩虹”

刘诗平 苏晓洲 齐 健 姜 潇 史卫燕

导言 中国是桥梁大国或强国吗

不走近，不知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桥梁大国，正在走向强国，甚至已经成为强国；不深入，不知道中国桥梁屡屡创造“第一”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技术跨越、能力提升……

由刘诗平总牵头实施的这组调研，奔赴武汉、广东、四川、贵州、湖南等诸多地方，实地查看，而且大量动用各个分社的无人机，对现代桥梁、古典桥梁进行航拍。

大量的采访和访谈，使人们对中国桥梁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例如，有的专家认为，就建桥水平来说，中国目前是全球的“引领者”，因为近年来世界上有难度、创纪录的桥梁，大部分由中国建桥人建造，我国已形成千米级斜拉桥设计施工成套技术、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关键技术、多塔悬索桥设计施工技术、跨海集群工程建设关键技术……

有的专家说，现在中国桥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世界第一，研究、施工水平都不错。中国既是桥梁大国，也是桥梁强国。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国内桥梁建设取得的很多“第一”，多集中在跨径、塔高等指标上。在桥梁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成套施工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桥梁建设在标准规范的提升、桥梁国际组织的认知方面还是短板。

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桥梁界已经走出一条自主建设的成功之路，与强国的差距也相对较小。只要不盲目自满，在国际化程度上继续努力，中国桥梁有机会从大国逐步走向强国，并在 21 世纪的国际桥梁竞赛中脱颖而出。

调研组还走近古桥，聚焦 10 万座危桥、高铁桥梁、城市桥梁和农村桥梁，分别进行探讨……

桥梁跨度“第一”的背后：中国是桥梁强国吗

毫无疑问，中国是桥梁大国——超过 100 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就跨度而言，世界上最大跨径的前十座悬索桥、斜拉桥、钢拱桥，以及前十座最长跨海大桥，中国均占据半壁江山乃至更多。

那么，中国能否称得上桥梁强国？中国桥梁跨度“第一”背后存在哪些隐忧？

桥梁大国：数量第一，大长桥梁引领世界

2016 年 9 月以来，中国桥梁建设不断吸引着世人眼光。

2016 年 9 月 10 日，杭瑞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尼珠河大桥正式合龙。大桥桥面距谷底达 564 米，相当于 200 层楼高，刷新世界第一高桥纪录。

2016 年 9 月 19 日，沪通长江大桥 28 号主塔墩承台混凝土浇筑收官，进入新的建设阶段。大桥主跨 1092 米，是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

2016 年 9 月 27 日，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正式贯通。大桥总长 55 公里，是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这是中国桥梁快速崛起的一个缩影。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公路桥梁平均以每年 2.7 万座的速度增长。2015 年年末，全国公路桥梁达到 77.9 万座。其中，特大桥梁 3894 座、大桥 7.9 万座。

“桥梁建设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大跨径桥梁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在桥梁标准规范、计算理论、模型试验、材料科学、施工工艺、施工设备、施工控制、检测技术等方

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桥梁强国：当下抑或“未来”

近年来，中国建桥人不断刷新着世界桥梁纪录，创造着“第一”“之最”。

“就建桥水平来说，中国目前是全球的‘引领者’。”一些桥梁建设者认为，近年来世界上有难度、创纪录的桥梁，大部分由中国建桥人建造。目前，我国已形成千米级斜拉桥设计施工成套技术、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关键技术、多塔悬索桥设计施工技术、跨海集群工程建设关键技术……

“可以说，现在中国桥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世界第一，研究、施工水平都不错。”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桥梁专家王用中认为，中国既是桥梁大国，也是桥梁强国。

不过，在另一些专家看来，国内桥梁建设取得的很多“第一”，多集中在跨径、塔高等指标上。在桥梁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成套施工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桥梁建设在标准规范的提升、桥梁国际组织的认知方面还是短板。

国内知名桥梁专家孟凡超说，中国总体上正朝着桥梁强国迈进。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比，我们在设计技术、建设理念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走在世界桥梁强的前列，根本原因还是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强大工业基础的有力支持。尽管他们最近十余年新建的桥梁很少，但研发工作并没有停下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桥梁及结构工程专家项海帆说。

“评价国家桥梁技术水平，桥梁核心软件的自主化程度是一个主要的指标。”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吕建鸣说，我国桥梁设计工作者近30年来开发使用过多款桥梁分析软件，但国内桥梁设计单位主要用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软件。中国要想成为桥梁强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响当当的桥梁核心软件。

项海帆认为，中国桥梁界已经走出一条自主建设的成功之路，与强的差距也相对较小。只要不盲目自满，在国际化程度上继续努力，中国桥梁有机会从大国逐

步走向强国，并在 21 世纪的国际桥梁竞赛中脱颖而出。

“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有长江、黄河，有辽阔的海疆，有大量工程机遇，为桥梁工程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桥梁工程师应不断创新，建成更多的杰出桥梁工程，引领我国走向桥梁强国。”中国工程院院士、桥梁设计专家林元培说。

隐忧与警醒：造桥不可“好大喜功”

随着科技发展和财力投入加大，我国完全具备建设大跨径桥梁的实力。同时，采用“一跨过江”的大桥、建设千米以上跨度桥梁近年来也成为一种风潮。

王用中认为，真正进入世界桥梁跨度前列的都有其合理性。很多桥梁在宣传时称其某某第一，既有追求第一的心态，也与奖励制度、管理评价办法和体系有关。

一些专家指出，桥梁建设不能一味追求大跨径。大的跨越距离代表了桥梁的施工难度和技术水平，但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准、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并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

“建桥跨径要在满足各种功能条件的前提下‘宁小不大’。一般情况下，小桥比大桥省钱，维护费用也更低。”中国工程院院士、桥梁工程专家郑皆连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经济不合理超千米大桥的出现，有业主的好大喜功，少数为了追名逐利的地方领导盲目争跨度“第一”而不顾经济性，甚至任意指定桥梁的跨度、追求新奇特的桥梁造型；也有部分设计院设计理念走入误区的影响，一些设计院认为造千米级大桥才代表高水平。此外，主管部门与桥梁建设相关单位之间，在大桥跨径选择上也时有矛盾和冲突。

“从近年来建成通车的桥梁看，桥梁的造价越来越高，这里面有人工、材料上涨的因素，也有桥型选择追求‘长、大、高、特’等因素。”交通部相关负责人说。

专家认为，我国大桥建设，除了桥长、跨径等硬件上的第一，应更注重科技含量、技术创新等软件上的第一。

“中国造”海外大桥十大“名片”

从桥梁钢结构出海到施工总承包，从设计出海到标准出海；从海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到对中国建桥技术的赞叹……近年来，中国桥梁以国际竞标、国内投资带资修建、商务援助、援建等多种模式，一步一步走向世界。

“中国桥”，正在成为一张张闪亮的中国新名片。

美国新海湾大桥

2013年9月3日，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正式通车。新海湾大桥坐落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海湾地区，是世界同类钢结构桥梁中技术难度最高、跨度最大的单塔自锚抗震悬索钢桥。大桥连接旧金山和奥克兰，全长2.88公里，双向12车道。中交集团所属振华重工承建新海湾大桥4.5万吨的钢结构，2011年完工交付，历时5年。

印尼泗马大桥

2009年6月10日，连接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马都拉岛的泗水—马都拉大桥（泗马大桥）建成通车，这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跨海大桥，由中交集团以总承包模式承建。大桥采用中国标准规范设计、施工，是中国企业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输出国门的第一个大型桥梁工程技术项目。

巴拿马运河三桥

巴拿马运河三桥是巴拿马运河上大西洋侧的第一座大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混凝土斜拉桥之一。2011年6月，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竞标联合体成功中标巴拿马运河第三大桥设计项目。2012年，继续中标巴拿马三桥的施工阶段技术服务及施工监理项目。这是我国勘察设计行业通过参加国际公开设计竞标首次中标的大型桥梁工程项目。

马来西亚槟城二桥

2014年3月1日，由中交集团承建的马来西亚槟城第二大桥举行通车典礼，标志着东南亚最长跨海大桥正式通车。大桥全长22.5公里，为三跨双塔门式斜拉桥，主塔高93.6米，总投资额约14.5亿美元。槟城二桥是中马两国间最大的合作项目，也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桥梁工程。

塞尔维亚泽蒙—博尔察大桥

2014年12月18日，塞尔维亚泽蒙—博尔察大桥建成通车，是欧洲首座“中国造”大桥，由中国路桥承建、中交二航局参与施工。大桥横跨多瑙河，双向6车道，主桥长1482米，主桥跨度172米。20世纪60年代，前南斯拉夫电影《桥》曾风靡中国。50多年后，泽蒙—博尔察大桥——一座“中国造”大桥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崛起，成为一道横跨多瑙河的风景。

文莱大摩拉岛大桥

2015年5月6日，文莱大摩拉岛大桥开工，由中交集团所属中国港湾公司承建。大桥全长5915米，包括一座2680米长的跨海大桥，工程合同额2.6亿文币（约合人民币12.19亿元）。大桥建成后，将连接文莱西部摩拉区和东部大摩拉岛，有助于重塑文莱经济发展格局，也将搭建起中文友谊之桥。

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

2015 年 11 月 20 日，由中铁大桥院、中交二航局设计施工总承包的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项目——马尔代夫马累至机场岛跨海大桥开工。这是我国援外工程改革的第一个试点项目和援外资金与国家优惠贷款组合的项目，采用中国规范设计施工。

孟加拉帕德玛大桥

2015 年 12 月 12 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中铁大桥院承担施工详图设计和勘测的帕德玛大桥项目主体开工。横跨帕德玛河（恒河）的帕德玛大桥主桥全长 6150 米，为双层钢桁混凝土结合梁。这座公铁两用大桥项目合同金额 15.4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96.7 亿元，是中国企业中标的最大国际桥梁项目，也是孟加拉最大的基建工程。

坦桑尼亚基甘博尼大桥

2016 年 4 月 19 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东非最大斜拉式跨海大桥——基甘博尼大桥开通运营。这是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承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斜拉式跨海大桥，非洲再添“中国制造”新名片。

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

2016 年 7 月 7 日，中铁大桥局牵头建造的非洲最大斜拉桥——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布里格里格河谷斜拉桥）正式通车。这是摩洛哥王国投资兴建的第一座斜拉桥，全长 951.66 米，主塔采用漂亮的钻石结构外形，被当地人称为“梦想之桥”，也是一座象征中非友谊的“心灵之桥”。

“百年大计”要经得起“百年风雨”

近年来，我国桥梁建设突飞猛进。目前，桥梁数目和规模均居世界之首。然而，数量上去了，桥梁质量自然更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大事。“桥歪歪”“桥脆脆”这样的安全事故，甚至垮塌事故时有发生。一些桥梁，本是百年大计，却经不起百年风雨。

究其原因，一是盲目求快思想作祟，试图“抄近路”“多快省”建桥。本该是百年大计的大桥，为了赶工期、压成本，或赶制“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牺牲了应有的质量要求；二是权力干预、转包寻租等“灰色地带”依然存在，导致从工程立项到验收等各个环节，容易服从于权力和利益输送的需要，忽视安全问题；三是“重建轻养”，一方面是建后没有好好养，另一方面是行车密度及车辆载重越来越大，桥梁安全难以保障。更有甚者，想着大不了过几年推倒重来，新工程还可拉动GDP，作为当地政绩工程。

重大基建工程事关大众出行安全和经济发展命脉，绝非儿戏。大桥建造是百年大计，必须经得起“百年风雨”。短期意识能够创造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但并不能达到长期改善地方经济和民生环境的目标。事实上，“问题桥梁”，带来的是民生资源和政府公信力的双重负效应。

一座赵州桥屹立了1400余年，是一个标杆，也是一个提醒。“质量为先”不该只是口号，更应该是制度保障的首要目标。桥梁设计必须科学且具有远见，施工则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和建造标准进行，确保桥梁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考题”。

中国高铁为何“大桥”为王

中国高铁快速延伸，高铁桥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武广高铁，桥梁占比 42%；京沪高铁，桥梁占比 80%；沪杭高铁，桥梁占比 92%……

桥梁堪称高铁线上的“皇冠”。一座座大桥，挺起了高铁脊梁，提升着中国速度。为何我国高铁桥梁占比高？中国高铁为何“大桥”为王？

中国高铁“桥”为王

“朝辞天安门，午逛城隍庙。才见平川无际，转眼浦江潮。”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蔡庆华面对飞驰的高铁列车感慨不已。

京沪高铁全长 1318 公里，是全世界一次建成的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全线 244 座桥梁，长度之和达到线路总长的 80%。其中，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为世界上首座设计时速 300 公里的 6 线铁路大桥；丹阳至昆山段特大桥，全长 164.85 公里，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长桥。

参与了京沪高铁设计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董事长、院长蒋再秋说：“高铁发展对桥梁提出了更高要求，高铁桥梁的突破则促进了高铁速度、质量、舒适度的提升，促进了高铁的发展。”

“京广高铁上的武汉天兴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让中国高铁首次跨越长江。它是世界上第一座 4 线铁路、6 线公路的公铁两用斜拉桥。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郑新黄河大桥，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设计时速 350 公里。”时任中铁大桥局总经理胡汉舟说，随后，中铁大桥局又陆续建成了黄冈长江大桥、铜陵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等一批更大跨度的高铁桥梁。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高铁桥梁跨度，从天兴洲长江大桥的 504 米主跨，到铜陵长江大桥的 630 米主跨，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 1092 米主跨，创造了高铁桥梁跨度的新纪录。

高铁为何“桥”为王

为何我国高铁桥梁占比高？为何高铁多建在高桥之上？对此，铁路专家道出个中原委：

跨越江河湖海、高山峡谷等，自然要采用桥梁。

为了高铁线路的平直、平顺，避免太多太急的弯道，为了截弯取直而采用桥梁建设；避免太多太大起伏，为了降低坡度而采用桥梁建设。如合福高铁南平建溪特大桥，最高桥墩达到 20 层楼高。

节约土地资源，力求少占田地。如京沪高铁八成线路是桥梁，比传统路基少用土地至少 3 万亩。

遇到不良地质地段，减少线路大的沉降。高铁桥梁的桩基一般较长，可有效控制沉降。

提高线路的安全、封闭性，解决与等级公路、城市道路等现有道路交叉和行人过道问题，减少风险等。

高铁上的架桥“金刚”

高铁“以桥代路”可以提高行车安全、加快高速铁路建设速度。架桥技术和施工设备的进步，则有效地提高着高铁桥梁的架桥速度。

有这样一段高铁架桥机铺设桥梁的视频，曾经起到“刷屏之效”：一台巨大的机器从隧道里缓缓驶出，这一庞然大物长 93 米、64 个轮子像蜈蚣的脚一样密密麻麻，“前腿”带动挂载混凝土桥梁的“身躯”，悬空中从一个桥墩滑向另一个桥墩，直接架设着桥梁。

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是中铁十一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用 SLJ900 型流动式架

桥机架设桥梁的片段。随着高铁建设在全国的快速推进，丘陵和山区架桥机作业空间受限大。高铁往往桥隧相连，隧道口架梁、整孔箱梁架桥等工况复杂。SLJ900型流动式架桥机不但能运送整孔箱梁通过时速 250 公里和时速 350 公里的隧道，而且可在隧道口架梁。

正是因为我国高铁架桥设备不断创新和施工方法不断改进，保证了高铁建设更加安全快速地向推进。截至 2016 年，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两万公里。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显示，到 2020 年，我国铁路网规模达到 1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 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将形成“八纵八横”的高铁网。

高铁线路快速延伸，高铁桥梁也将实现新的跨越。

10 万危桥：公路桥梁进入“建养并举”新时代

截至 2016 年，我国公路桥梁总数接近 80 万座，其中大桥、特大桥将近 9 万座，桥梁数目和规模均居世界之首。与此同时，我国公路路网中步入维修期的在役桥梁日渐增多，有超过 10 万座桥梁为危桥。

我国桥梁工程技术发展，正面临“以建为主”向“建养并举”的转型。如何让桥梁健康地“出生”、少灾少病地“成长”，直至“高寿”？

垮塌事故时有发生 10 万危桥引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公路桥梁迎来大建设、大发展时期，大桥、特大桥快速增加。与此同时，桥梁垮塌事故也时有发生。

现代大桥结构宏伟、跨江越海、荷载巨大，如果因质量问题出现垮塌，其结果可想而知。

相关统计显示，2007—2012 年间，国内有 37 座桥梁垮塌，平均每年超过 6 座“夺命桥”，导致 180 多人丧生。这些垮塌桥梁中，近六成为 1994 年之后所建，桥龄还不到 20 年。

与此同时，经过 30 多年的公路大发展，步入维修期的桥梁数量日益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6 年我国公路路网中在役桥梁约 40%服役超过 20 年，技术等级为三、四类的带病桥梁达 30%，超过 10 万座桥梁为危桥，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就大桥、特大桥而言，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此前曾指出，从近年来建成通车

的桥梁看，造价越来越高，有人工、材料上涨因素，也有桥型选择追求“长、大、高、特”等因素。反观桥梁使用寿命，很多桥梁质量没有与工程造价的增长成正比，有些桥梁建成没多久就出现大修、有些通车几年就重新进行桥面铺装。

对中小桥梁来说，业内人士指出，在庞大道路交通体系中承担重任的中小桥梁，面临材料劣化、地基沉降等渐变型风险和车船撞击、车辆超载、地质灾害等突发性风险，使得桥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桥歪歪”劣质工程与“重建轻养”弯路

针对“桥歪歪”等劣质工程的出现，一些专家表示，我国桥梁建造存在“抄近路”现象，即有的桥梁不严格按照要求建造。本应该是百年大计的大桥，因为“抄近路”只数年时间就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导致桥梁垮塌或快速老化，需要整修或拆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量大幅增长，行车密度及车辆载重越来越大，如何保障桥梁的安全性、耐久性和使用功能，已成为目前桥梁工程界的巨大挑战。

时任武汉二航路桥特种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王蔚撰文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桥梁存在一定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的不堪重负，使用状况不容乐观，加上桥梁类型样式复杂多样，未来桥梁养护管理任务十分艰巨。

“在国内桥梁建设过程中，我们曾走了‘重建轻养’的弯路。”王蔚说。

建管并重，让桥梁更“高寿”

对于桥梁建设，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指出，质量安全是工程建设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大桥建设，受到施工工艺复杂、深水、高空等条件约束，容易引发质量安全生产事故。在桥梁方案选择上，要把质量安全当作首要因素考虑，决不能刻意追求“新、奇、特”的桥型结构，以防止出现质量安全隐患。与此同时，改进桥梁养护技术，全面提升桥梁服役性能。

这位负责人表示，桥梁工程技术发展面临以建设为主向建养并重转型，需要我们在桥梁养护理念、方式、设备与材料、养护设计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进。我国公路桥梁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建养并重”。

王蔚表示，桥梁全寿命周期中，建设期仅仅占桥梁寿命不足 10%，其他均属养护期。桥梁的长期正常使用，不仅取决于建造质量，更依赖于后期的管理养护水平。

“在桥梁建设过程中，我们曾走了‘重建轻养’的弯路。‘建养并重、管养分离’，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特点。”王蔚说。

英国桥梁专家巴里·科尔福德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桥梁界对大跨度桥梁的维护关注度还不够。桥梁的维修养护问题，必须在桥梁设计建造之初就高度重视。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中国的桥梁行业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以后中国新的桥梁需求可能会相对减少，但老桥却需要维修，这个问题便显得越来越重要。”科尔福德说。

随着桥梁跨度日益增大，总长 1000 米或单跨 150 米以上的大型桥梁的安全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由于结构复杂、检测困难、数据量巨大等因素，长期以来，工程人员想要了解大型桥梁的安全状况，只能限时检测大桥的部分部件和一些特定环境，很难及时有效地掌握桥梁的整体状况。

如遇突发的外力影响，大桥会不会“生病”？“生病”后从哪里下手治疗？

由中交公规院研发的西堠门大桥、金塘大桥结构安全监测综合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将结构监测、巡检、养护和管理技术进行同平台研究应用的系统。在项目设计阶段，公规院将监测养护系统融入设计方案，指导施工作业，2009 年 12 月随大桥建成通车同步投入运行。

专家认为，设计、施工、养护管理，是桥梁生命中的 3 个重要环节，建设百年桥梁，靠建更靠养。因此，桥梁在设计之初就应“谋长远”，充分考虑后期的养护需求。

“按照规范的要求，桥梁每 1~3 年要进行一次定期检查。每个月要进行一次经常性安全检查。在桥梁遭遇地震、台风等特殊灾害时，还要进行特殊检查。”中交公规院董事长兼总经理裴岷山说。

中铁大桥局建设的“桥梁医院”——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将重点研究如何让桥梁更“高寿”。

“以我们的远程监测系统为例，一座主跨 460 米的桥梁，全线会敷设 300 多个监测点，几乎密布全桥。桥面哪个部位有超载、超速车辆，该系统都可以精确地感应出来，并在远端的监控屏上以警示标识显示。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精准发现，并利用云计算手段开出养护修理‘药方’。”中铁大桥局桥梁科学和研究副总经理、桥梁结构健康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带头人钟继卫说。

中铁大桥（南京）桥隧诊治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华认为，保障桥梁安全，必须深入开展桥梁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治理；强化桥梁的养护管理责任，做到及时消除桥梁的病险病害；加大治理超限超载的力度；严格在建桥梁的安保工程、监督管理。

城市桥梁：是“地标名片”，还是“病灶梗阻”

从建成时万人蜂拥上桥体验并闻名全国，到如今“拆声不断”，广州人民路高架桥 30 年间遭遇的巨大差异，是我国城市桥梁发展历史转变的一个侧影。

曾几何时，城市桥被各地引为交通拥堵疏散利器，倾力建设。一座座城市立交桥和高架桥，在发挥城市交通功能的同时，也成为一道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如今在一些城市，有些桥梁却被认为是拥堵点和城市“伤疤”，被呼吁拆除。

我国城市桥梁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存在着哪些问题？正在呈现怎样的新发展趋势？记者于 2016 年下半年在广东、北京、贵阳等城市进行了深度调查。

桥之盼：迈向世界第一

对现代城市而言，高架桥、立交桥，以及城市内的跨江、跨海桥，是化解城市交通症结的关键所在。

在广州生活了近 60 年的老司机梁平回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多座大型跨江桥梁建成之前，广州市民从珠江北岸去南岸时，常要轮渡，一水之隔的交通往返动辄需要一天时间，“城里来回跟出差一样，有时还要住一晚”。

在深度参与过广东省城市规划工作的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看来，和全国其他大中型城市类似，借助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技术、资金和观念优势，广州城市桥梁建设首次彻底解决了珠江南北交通难题。大批跨江桥梁的出现，使这座城市的南北两岸融为一体，带动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广州大规模兴建高架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这也是北京、上海等一

批大中城市发展的共同路径。据广州市交通研究院介绍，过去 30 多年里，广州市先后修建了一大批高架桥和立交桥，主要项目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完成，这些高架桥和立交桥明显缓解了广州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提高了城市运转效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大城市都曾经历过一个较大规模的城市桥梁建设阶段。”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说。

北京市数十年来人口和车辆急剧增加，带动城市桥数量急剧增长。时任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城养处处长郭朝辉告诉记者，截至 2014 年，不含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桥，北京市城市桥梁已有 2464 座，其中立交桥 422 座。

在广州，各种跨江桥、高架桥、立交桥数量同样过千，从历史悠久的海印桥、人民桥、解放桥、海珠桥到形式新颖且技术含量高的番禺大桥、猎德大桥、琶洲大桥，大桥成了广州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在这种建设高潮的带动下，我国城市桥梁数量迅速攀升至全球首位。

对不少城市而言，桥成了地标性建筑乃至“城市名片”，很多居民视名桥为城市的骄傲。1987 年，广州第一条城市高架桥——人民路高架桥建成，曾轰动一时。开通当天，全城举行了万人欢走大桥活动。北京市建国门立交桥、三元桥等建成后，成为全国观摩的对象。

“三元桥建成之初，很多城市都来学习。”中国桥梁设计大师、北京三元桥设计者之一罗玲说，在那个年代，桥梁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交通发展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的标志。

袁奇峰等人认为，我国城市桥梁的兴盛有两个因素驱动，一是客观上的交通需求，二是精神层面的物化需求。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桥梁承载了公众对现代化都市建设的愿景和想象。一些没有实际需求的城市也建高架桥，以示已迈入现代化。

桥之堵：“肠梗阻”与“迷宫”

就在对城市桥梁的一片欢呼声中，一些城市居民发现，原本给自己带来方便与美感的桥梁，已成为难以舒缓的痛点。

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到位，使一些城市桥梁面临“建了就堵”的尴尬。对北京、

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来说，上桥堵、下桥也堵，堵在桥上、堵在桥下，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生活常态。如一些市民“吐槽”的北京西直门立交桥，多重原因造成的堵和绕积重难返，被戏称为“迷宫”。

一些二、三线城市甚至比这些特大型城市更少享受城市立交桥的疏通便利。西部城市贵阳，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建的花果园、三桥等一批立交桥，当时成为市政建设腾飞的重要标志。但是，仅仅过了十多年时间，就变成了如今的城市交通拥堵点。在贵阳市开了几十年车的职业司机夏正贤告诉记者，曾经的立交桥在市区道路与快速道路间起到了很好的衔接作用，但花果园立交桥等如今则是贵阳市最拥堵的路段之一。

地处贵阳市西出口重要节点的三桥立交桥，是连接贵黄、贵遵高速的联络线，由于坡度大加急弯、路面摩擦系数小，仅 2013 年以来有统计的较大交通事故就达 19 起，小事故更是不断。

旧桥问题多多，新桥也不例外。贵阳市相继新建的环城高速、二环路等一批快速干道，增添了数十座新式立交桥，但因设计和管理缺陷而成为交通事故高发点。2015 年 9 月，贵阳市西二环中坝立交路段发生 13 车连环车祸。

在北京养护集团卢九章等专家看来，城市桥梁发生的这些问题，既有交通需求增速过猛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也与城市整体规划设计、桥梁质量把控等相关。

桥之害：影响城市肌理和商业环境

高架桥发挥交通功能的同时，带来的噪声、采光污染，以及对一些城市商圈环境、城市肌理的伤害也难以改变，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记者在广州采访时发现，环市路高架桥是这座城市最主要的高架桥之一，其建成后给两边的居民区带来严重的噪声污染，投诉不断。为解决噪音污染问题，广州市曾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加装隔音屏，但隔音屏的遮蔽又带来采光困难的新问题。位于环市路旁边的环市路小学，被环市路高架桥、东豪涌高架桥夹在中间，噪声直接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因而不得不搬迁，成为全国第一例因噪声污染而搬迁的学校。

广州人民路商圈的没落，则是城市高架桥对城市肌理和商业环境产生影响的典

型。人民路商圈曾是广州最繁华的商圈和金融中心，但在人民路高架桥建成后，商圈日益没落。

袁奇峰说，人民路商圈的没落，虽然也有广州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变化等因素，但人民路高架桥是一个主要因素。

“从宜居角度看，大型城市桥如果规划不当，有可能会割裂人跟人、人跟建筑之间的亲近感。”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说。

桥之变：从建到拆

随着城市桥弊病的不断暴露，以及广州、北京等一线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桥的建设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整体上看，主要呈现3个新的趋势：

从“大干快上”到理性谨慎。2003年，《广州市生态城市规划纲要（2001—2020年）》提出，在城区不再规划新建高架桥。广州市中心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沈可说：“现在广州原则上能不建的就通过隧道等替代方案解决，只在不得不建的地方才新建高架桥。”

从重建到重“养”。大批量的桥梁建成使用一段时间后，对城市桥的养护日渐成为重点。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副局长侯小明说，北京有市管城市桥梁1587座，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桥梁约占总数的15%，这些运行超过30年的城市桥已进入维修期，维修需求逐年增加。

“过去业界注意力多集中在建设，对于养护与设计的衔接关注不够。”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业务总工秦大航说，现在需要关注桥梁的全生命周期，将设计、施工、管理、养护统筹进行考虑。

从大建到慢拆。近几年，广州市从官方到民间，对一些负面影响严重的城市桥的拆改已提出整改意见，相关业内人士也开始呼吁拆除一些负面影响严重的高架桥。2011年，《广州人民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提出，在时机成熟时将拆除人民路高架桥，恢复人民南路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历史风貌。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拆除立交桥改建隧道的步伐已经迈开。2014年，广州市启动东圃立交桥改隧工程，计划拆除大量匝道，并在快速路上“加盖”将其变成隧

道，隧道上方建成公园，两边则建设大型住宅楼。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王世福认为，这一趋势是城市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转折，也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城市桥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如美国波士顿著名的“big dig”工程，主要目的就是将波士顿城内一条沿海湾而建的高架快速干道全线埋入地下，以消除高速路产生的噪声等影响。韩国首尔清溪川也拆除了其原来的所有城市高架桥，重塑亲水空间。

“城市桥作为路的一个部分，在关键交通节点上解决大容量交通的作用不容忽视。”侯小明说，从国际一些大城市的治堵历程来看，应结合公交优先战略多措并举，提高科学化管理水平，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交通承载能力。

“孤岛贫困”热盼多修“村桥”

近些年，依靠大桥、特大桥支撑，全国各地建成了四通八达的现代化路网。但记者 2016 年深入湖南、贵州等地山乡、水乡调查发现，两省农村桥梁“缺、陋、危”问题突出。千千万万山乡人、水乡人眼看着高速公路、高铁借助大桥从身旁甚至头顶“飞”过，自己却还靠溜索、渡船、危桥过河。

村桥“灯下黑”，催生了特殊的“贫困孤岛”。相关专家和百姓呼吁，改革财政投入机制修好村桥，让山乡、水乡群众共享交通大改善成果。

“大桥从头顶过，我们却靠渡船、溜索和危桥冒险过河”

武陵山深处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山高林密。近年县城通上高速公路后，区域交通环境大为改观。但记者 2016 年在泸溪县潭溪镇采访，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与一条大马路隔着峒河的上扯旗村、中扯旗村、下扯旗村 3 个村数以千计的人，每天靠渡船过河。

在上扯旗村渡口，满头白发的老船工向明粮和妻子摇着木桨摆渡。向明粮说，渡船配了柴油引擎，渡口开支由村里东挪西凑了一点钱“包干”。开了柴油引擎就会少了生活费，不到万不得已他都摇桨摆渡。

在附近另一个渡口，渡工站在船头靠手拉一根跨河铁索行船。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描绘 20 世纪初叶的“拉拉渡”，在此不是旅游风景，而是生活场景。渡口下游，还有对岸群众运输农产品等较重物资的溜索。货物从河对岸“溜”过来，吊斗晃动，河面到处是掉落红红的芦柑。

据了解，为了改善上述地方群众的出行条件，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为渡口配置

了新的机动渡船。但在当地群众看来，渡船无法和桥梁相提并论。

滇黔交界处的贵州省威宁县斗古乡中关村位于牛栏江边，一块小平坝上，居住着威宁县海拉乡和云南省会泽县火红乡总共 5 个村 2700 多人。几根钢绳跨河，成了当地村民跨江出行的唯一交通设施。

贵州省桥梁研究专家吴正光说，贵州省境内毕节市、六盘水市和遵义市的大山里还有不少“溜索渡”。“抬头见山，低头见河，老百姓出行只能靠危险的溜索。”

“溜索很少人敢坐，我只坐过 3 次，有 2 次是为了出诊，一次家里有急事。每次坐我内心都感到很恐怖。”中关村村主任刘万良心有余悸地说，“有次溜索运货两根钢绳绞在一起，货斗直冲山底，里面的一条烟竟摔成了烟末，人下去肯定有去无回！”

记者看到，溜索险，通往溜索的山道更险——有的地方窄到只能容一人通过，双脚不能在原地换脚，只能抓住石头慢慢向前挪。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看一眼都让人心惊胆战。

在贵阳市开阳县毛云乡毛云村棉花渡，85 岁的摆渡老人曾启祥说，当地渡口水深漩涡大，要三四个人一起用绳子牵住船才敢渡。

2015 年年底，贵阳至瓮安的高速公路总投资 15.4 亿元的清水河大桥建成通车。但对大桥脚下的棉花渡村民来说，它非常“高大上”——要上桥必须绕到十几公里开外的毛云乡匝道口，且村民和他们的三轮车、摩托车不能上高速公路。

记者在湖南省和贵州省等地采访时，发现农村地区危桥、“陋桥”不少。有的桥狭窄仅容一人蹬着高高的台阶过，连栏板都没有，当地人称为“跳岩”；有的桥桥板开裂、桥墩歪斜，扭曲的形态如同在跳舞，被人称为“跳舞桥”；还有的桥，不过是路面下掏个涵洞。遇上雨季，车辆和人员特别是一些急着赶路上学的小孩需要冒险涉水，有群众没好气地称之为“要命桥”……

“不把桥建起来，‘孤岛贫困’就很难精准扶到点子上”

据贵州省交通厅统计，截至 2015 年年底，全省共有各类公路桥梁 1.7 万余座，其中高速公路桥梁 5000 余座 122 万延米，而村道桥梁仅 6000 余座 15 万延米，许

多沿江沿河百姓至今仍饱尝溜索摆槽摇桨之苦。

统计显示，2016 年中国公路桥梁有约 80 万座，但全部桥梁半数以上的总长度，属于特大桥和大桥。“大路大桥多，乡村小桥少”，是中国桥梁建设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站在湖南省一个靠渡船进出的乡镇，记者发现山上已经成熟的水果无人采收，熟透掉落的果子在地下腐烂。

当地村民说，当地又甜又靓的芦柑只要过了河、进了城，就能卖几元一斤。但没有桥，村民们只能靠溜索运输，运量小、风险高，很多货只能白白烂掉。很多村民当年满怀希望种芦柑，如今因为运不出去，有人干脆把果树砍了了事。

在黔南州都匀市石龙乡至平塘县掌布镇，联合村甲斗组布依族村民耿明勤说，没有桥的时候过河摆渡一次每人要 2 元，摩托车要 10 元，货车根本进不来。虽然镇里鼓励养殖豪猪和种植茶叶，但由于桥不通路况差，年轻人几乎都外出务工了。

湖南省、贵州省很多被山水阻隔的“孤岛”，居民房舍与河对岸相比仿佛是“两个世界”。这些“世外桃源”即使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但靠摆渡、溜索过河，费事、费时、费钱、费力，很多深陷“富饶的贫困”。当地一些对“孤岛贫困”深有感触的基层干部说，近年来国家、省市和相关职能部门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如果不把村桥建好，扶贫就很难精准到点子上。

“与其逼基层‘变通’，不如改革阳光公共政策”

据统计，2001—2012 年，全国共投入资金 438.8 亿元，改造危桥 21610 座。2015 年，交通运输部共安排 875 亿元车购税资金支持全国农村公路建设，其中 63 亿元用于危桥改造工程，实现了危桥总数和比重两项指标双下降。

一些基层干部在受访中也对记者大倒苦水，称村桥如今是“百姓呼声强烈‘不修不得了’，财政投入杯水车薪‘修也不得了’。”

湘西一位交通专家介绍，政策规定类似扯旗村这类乡村渡口改桥梁，享受每米 1 万元的补助。如此拟议中的扯旗村峒河水泥平板桥，可享受几十万元补贴。而实际工程耗资，需要大约 800 万元，资金缺口巨大。而在泸溪县，类似这样“嗷嗷待

哺”的村桥项目，还有 20 多个。“一个村桥，喊了几届政府，换了三任交通局长都修不起来。”

时任威宁县交通局副局长马勋介绍，根据《“溜索改桥”建设规划（2013—2015 年）》，四川、贵州、云南等 7 个省（区）约有 290 对溜索需要改造成桥梁，但项目在一些偏远的山村，溜索改桥和桥梁建设的需求依然供不应求。2016 年，威宁县成功完成了一批溜索改桥项目，但有的改桥项目资金仅够建桥，两边的公路改造需要的资金更为庞大，交通部门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办法，分步提升道路等级。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改革国家和部门、地方对农村桥梁建设的财政支出制度，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将“村桥”建设视为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以下（含县）特别是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地区、水乡地区的配套。此外，通过制定针对山乡、水乡旅游公路、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为相关地方村桥建设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一些干部群众说，只有帮山乡、水乡老百姓圆过桥梦，大力推动“贫困孤岛”，扶贫和全面脱贫才能精准到点子上。

古桥现状调查：留住“人间彩虹”

中国是个“桥的国度”。遍布各地的历代桥梁，跨越山水，便利交通，将建筑、艺术与科技和谐相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记者 2016 年在浙江、江苏、福建、湖南、江西、贵州、四川、北京等地采访发现，由于政府和民间的努力，一些古桥焕发生机，成为美不胜收的“人间彩虹”。与此同时，由于年久失修、建设性破坏、保护性破坏等原因，我国古桥总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古桥保护刻不容缓。

“历史‘活化石’的丧失令人痛心”

古桥“十不存一”，祖宗留下的遗产，在一场暴雨、一次狂风之后，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古桥顷刻荡然无存。

2016 年 9 月 15 日，台风“莫兰蒂”带来狂风暴雨，温州泰顺 3 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廊桥——薛宅桥、文兴桥与文重桥被洪水冲走，福建省闽侯县境内 4 座文保单位古廊桥被洪水冲毁，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泉州永春东关桥也被大水冲毁。

廊桥又称风雨桥，是在桥面上建有廊屋能遮风挡雨的桥梁。近年来，台风引发洪水冲毁古桥的例子并不少见。2005 年 9 月，台风“泰利”袭击浙江，景宁和泰顺普降暴雨引发山洪，一夜之间损毁了 5 座百年廊桥；2006 年 8 月，受台风“桑美”影响，浙江庆元县 9 座古廊桥被洪水冲毁……

在风雨桥较多的贵州等地，暴雨引发洪水冲垮古桥的事件同样不少。2004 年 7 月 20 日，百年不遇的洪水，将黎平县“国宝”地坪风雨桥冲毁。

除了洪水，更有多种自然灾害造成古桥的破败、荒废乃至消亡。

湖南省炎陵县城城西的安济桥，建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明清时期不时修缮，成为当地最古老的石拱桥。记者慕名前来探访时看到，安济桥如今蜷缩在民宅、杂树、菜园和垃圾之间。当年以花岗岩、石灰、桐油砌筑而成的石拱桥，出现了能插进粗木桩的大裂缝，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人行便桥。在安济桥头住了几十年的一位老者说，安济桥“沦落”至此，他和邻居们感到痛心。

在武陵山脉深处的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年届花甲的镇文化站站长李炎雄带着记者雨中调查古桥现状。在一个土家族村寨口，记者看到一座建于清代的风雨桥桥墩歪斜成了“Z”字状，桥亭屋檐四处漏雨，桥板裂开的大缝能清晰看见桥下奔涌的河水。

“古桥破成这样，也许一阵大风、一场暴雨后就可能变成废墟。”李炎雄说，类似危在旦夕的明清风雨桥，当地还有几座。

沧桑融入古桥，岁月记录文明。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中国古桥，在造桥技艺上，有着系统原创性、发展延续性和品类完整性的特点，呈现出让世人赞叹的科技水平、艺术美学和文化内涵。然而，在强大的时间面前，无法抵挡岁月的风雨沧桑，许多古桥残破不堪，乃至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中国地面上，真正原建的千年以上建筑文物已经很少，最多的就数古桥。然而，目前很多古桥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自然灾害和年久失修，导致众多古桥自然消亡。”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古桥保护专家罗关洲说。

据已故古桥专家罗英估计，中国“有名有姓”的古桥有四百余万座。然而，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所作的《中国古桥研究》课题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古桥消亡速度加快，现存真正意义上的古桥不到一万座。

“人为的‘非正常死亡’令人惋惜”

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正在成为中国古桥“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除了自然消亡，决定古桥生死的还有人为因素。战乱时期，很多古桥难逃生死

大劫。和平年代，古桥同样面临着大量的损毁和“非正常死亡”。

南京市光华门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桥瓮横跨于秦淮河上。地处交通要冲，桥下是大吨位轮船穿行、偶有碰撞，桥上重型卡车驶过、不堪重负，这座有着近 600 年历史的古桥，再也无法适应新的运输通行。2008 年，一场“大手术”随即展开。

“整修时，将七桥瓮的桥面石、桥栏全换成新的了，桥身用钢筋混凝土构筑，古桥的文物价值大大减损。”罗关洲说，桥栏、桥面局部破损，可以局部修理，不能全部用新部件更换古部件。

破坏性保护造成的古桥价值减损，全国不在少数。一些被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古桥，在修缮过程中使用现代材料和工艺改建、重建，致使古桥的文物价值减损乃至实质消亡。

业内专家指出，如何保护修缮文物桥梁，桥梁管理者、桥梁工程师和文物管理机构之间有时所想各异：一些桥梁管理单位嫌麻烦怕风险，希望拆除重建；一些桥梁工作者从理念中没有把这些桥当文物看待，更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文物管理机构则缺少详细严格的标准，一句“修旧如旧”的标准，执行起来弹性大，保护的力度偏弱。

如果说修复古桥容易造成“破坏性保护”，那么，对古桥造成的“建设性破坏”，则是古桥面对的主要威胁。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茅玉麟至今仍然对呼吁保护江西黄洲桥未果而痛心。

2014 年 8 月底，基金会得知江西崇仁县一座由文天祥题写桥名的黄洲桥将被拆除，立即组织了 4 位专家赶赴现场。黄洲桥是座始建于南宋、多次重建重修的 9 孔石拱桥，桥基、桥墩和桥拱大部分构件为清代道光年间原物。

茅玉麟说，我们为崇仁县政府详细分析了黄洲桥现存的问题和原因，同时提出了保护建议；江西省文化厅也要求“未经审批同意之前，该桥必须实行原址保护，不得擅自拆除”；当地很多民众反对拆除这座县城唯一的古桥。然而，这一系列努力并没能改变古桥的命运，当年 11 月 12 日，黄洲桥在挖掘机的隆隆声中被拆除。

崇仁县回应称，黄洲桥属于非文物保护单位。在“原址加固维修”方案行不通的情况下，慎重启动了拆除重建方案。

基金会黄洲桥考察组成员罗关洲说，这座价值很高的古桥，“为解决交通难题”被拆掉，非常可惜。黄洲桥已被登录为不可移动文物，其实完全可以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有时，认识古桥的价值有一个过程。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古桥，在认识到它的价值后，就可能成为文保单位。

在全国，像黄洲桥这类的古桥还有很多，不少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对古桥造成的建设性破坏，来自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以及各地开展的旧城改造和经济开发区建设。

“许多地方对新农村、新城市建设的‘新’字产生了偏见，将‘老’的都变成新的，古桥在新农村、新城市建设、开发区建设中被大批拆除。现在提‘美丽乡村建设’，对消除这种偏见有好处。”茅玉麟说。

此外，随着道路变迁、河流改道，一些古桥失去了原有的交通功能，或自然废弃或被拆除。一些古桥随着道路拓宽和航道改造，失去实用价值后被当作地基、铺路，乃至被一些地方的古桥买卖公司收购。一些位于交通道路上的古桥，由于交通工具的变化，使古桥难以承受汽车沉重的压力和震荡，破损严重，甚至成为危桥。

中国古桥快速地消亡。一同消失的不仅有古桥本身，还有它的营造技艺；被割裂的不仅有历史文化，还有它与当地民众的情感纽带。

“护住传统文化的根基”

对文化遗产的敬重，让他们舍弃身家千方百计保住古桥，政府、民间齐上阵，让古桥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江西德安县博阳河上的樟榆桥，是一座长 46 米的四墩五孔石拱桥，自清朝乾隆年间石门村人何步蟾投资兴建以来，一直由当地村民维护修缮，方便着往来行人，同时守护着一份历史。从 2015 年 8 月开始，这座德安现存最早的古桥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像樟榆桥一样，全国已有一大批古桥的保护工作，从民间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授予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专门保护和分级管理。

从 1961 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州桥、安平桥、卢沟桥、泸定桥、永通桥成为“国宝”开始，到 2013 年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包括 14 座近现代桥梁在内的 94 座桥梁入列。同时，一大批古桥成为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在湖南省桃江采访时了解到，近年来，湖南省启动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交通遗产的抢救性修复。经湖南省交通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协调，桃江县政府拨出专款，于 2010 年修缮了始建于唐元和十年（815 年）的湖南现存最早石梁桥——桃江牛剑桥，恢复了“楚南第一蛮桥”的历史原貌。

保护古桥的意识和行动，民间同样在不断觉醒和展开。

2004 年 7 月 20 日，洪水冲毁黎平县“国宝”地坪风雨桥后，当地 500 多名侗族百姓自发与洪水抗争，从洪水中捞回了七成多桥梁构件，从而为风雨桥的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最终国家文物局批准修复，从而地坪风雨桥按照“修复如旧”的原则得到恢复。

在张家界市王家坪镇马头溪上，一座造型别致的风雨桥与邻近两座石桥呈品字形排列，与青山绿水、土家吊脚楼交相映衬，桥头功德碑上刻满了名字。李炎雄告诉记者，碑上刻的是为修桥捐款的当地民众的姓名。没有国家和省里的财政拨款，当地群众自发集资 80 万元并投入劳力修桥。

“80 多岁的龚桂梅和老伴拿出用来给自己做棺材的上好木料，请人送来工地修桥。一对夫妇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动弹，还专门出钱雇人上工，为修桥出力。”李炎雄说，“我们土家人祖祖辈辈在风雨桥上行路、贸易、对歌、纳凉、避雨、相亲，对文化遗产的敬重，让王家坪人舍弃身家也要千方百计保住古桥。”

一些民间组织也在保护古桥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自 2009 年成立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以来，就古桥的研究和保护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在一些“桥乡”，民间自发组织的“护桥运动”不时出现。在江西和湖南，甚至有古桥附近居民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如一日，像孝敬家族长辈一样守护乡间古桥。

在浙江绍兴，有“古桥卫士”之称的罗关洲，则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热爱，奔走于各地，慧眼识珠，发掘古桥的价值。绍兴的悬链线拱桥迎仙桥、玉成桥，正是他从普通的古桥中发现，填补了我国古桥技术史的空白，并成为省级文保单位。绍兴拜王桥更是在他的保护下，摆脱了被拆除的命运，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发现和保护古桥的同时，罗关洲出版古桥文化书籍，创办桥文化网站，更将古桥营造技艺带进校园。2015年以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罗关洲“结缘”，学校为他设立工作室，并建成古代石桥模型展馆，罗关洲则开设“石桥营造技艺”课程，与在校师生探讨石桥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古桥保护刻不容缓”

保护“历史活化石”，让古桥成为从此岸抵达彼岸的“人间彩虹”。

“我们完成的‘中国古桥研究’课题，对目前古桥保护和破坏情况总的评估是：古桥消亡速度非常快，保护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茅玉麟说，尽管近年来政府和民间的古桥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保护措施不断升级，但古桥保护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相关专家指出，古桥保护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家底不清。全国范围内缺乏系统的古桥普查。

保护乏力。文物部门没有挂牌的古桥尤其如此，文物部门只管文保单位古桥，其他与古桥相关的交通、城建、水利、农业、规划等部门，并没有明确保护古桥的具体责任；一些被纳入地方文物保护范围的古桥，在与当地经济建设发生冲突时，文物部门的保护有时往往成为“橡皮图章”和“一纸空文”。

投入不足。绝大部分未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处于交通部门不管、文物部门不管、民间无力管的尴尬境地，呈现出加速破败的趋势。

“古桥是人类文明千百年来积淀的‘活化石’，是中华乡土文化印象中最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小桥流水人家’，有桥就有乡，有桥就有家。‘像保护祖坟一样’保护古老桥梁，不能够再耽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编志办主任蒋响元说。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留住古桥的生命？留住“人间彩虹”的美丽呢？

业内专家指出，保护古桥必须从源头做起，理顺体制，创新保护方法：

古桥普查，摸清家底。我国古桥分布广泛，数量和种类多，应进行古桥普查，全面评估，建立古桥档案。

建章立规，科学保护。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受《文物保护法》保护，大量没有列入文保单位的古桥，在管理主体、管理方法、管理责任、管理经费等方面没有明确的法规条文，应制订和颁布“古桥保护和利用条例”，科学系统地保护古桥。

部门协调、统筹规划。加强文物、城建、交通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农业、水利、城建等部门在规划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对古桥的保护。

开辟渠道，增加投入。增加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数量和资金投入。同时，鼓励民间资金和国内外慈善资金投入古桥保护。

重视环境，开发旅游。将古桥作为旅游资源，在开发古桥旅游事业中保护古桥。同时，重视古桥周围环境的保护，保护与古桥组合的优美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

针对古桥的“保护性破坏”，专家指出，可考虑制订“古桥保护修缮规范”。古桥修缮不应采用“拆除重建、异地重建”等简单处置方式，应优先按照“修复如旧”的原则进行古桥维修加固。

“从保护文物的角度来说，古桥不仅不能拆除，而且不宜搬迁，因为古桥与当地文化联在一起，搬迁它处，桥还是原来的桥，但文物价值已经不完整了。”88岁的古桥研究专家孔庆普说。

在茅玉麟、罗关洲等人看来，将中国古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推动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因此，应考虑将中国古桥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将河北安济桥、广西永济桥、北京卢沟桥等古桥纳入，进行捆绑式申遗。

“申报世遗是手段，保护古桥才是目的。”茅玉麟说，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将持续努力，探索和配合中国古桥的申遗工作。

守望丝路“钢铁驼队”

▾ 导言 铁轨上的亚欧大通道

▾ 丝绸之路上的“钢铁驼队”

刘诗平 郭久辉 何宗渝 杨 迪 李晓玲
屠国玺 齐中熙 石志勇 徐海波 于 嘉 刘巍巍

▾ 中国更多列车驶向欧洲

刘诗平 于嘉 郭久辉

导言 铁轨上的亚欧大通道

历史上，横跨亚欧大陆的古商道，因为中国盛产的丝绸长期占有主要的位置而被称为“丝绸之路”，驼队则是活跃在丝路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如今，列车飞驰的轰鸣声替代了响彻千年的声声驼铃。

钢铁驼队，来来往往运输的都是什么？怎样展开跨越上万公里的旅程？对内陆开放造成怎样的深远影响？又将怎样改变中欧经贸版图？还面临哪些“成长的烦恼”？

作为重大调研选题，在第1000列中欧班列到来之际，刘诗平提前一个多月深入重庆、成都、郑州、阿拉山口等不同班列始发地和沿途口岸，和当地同事一起，找寻中欧班列开行背后的故事。

数码通信器材、机械设备和汽车配件、鞋帽、家具、灯具、德国啤酒、法国葡萄酒、西班牙橄榄油、荷兰牛肉、奔驰和宝马轿车……都是这些国际列车的“座上宾”。

中欧班列只有海运时间的1/3、航空价格的1/5，同时班列化、客车化开行的组织方式，为客户提供了良好的物流体验。

借助中欧班列，像重庆一样，成都、郑州、武汉等城市正在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

丝路上的“钢铁驼队”

27岁的司机王铭杰快步登上机车驾驶室，按响汽笛，载着笔记本电脑等51个集装箱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重庆团结村站，驶向1.1万公里之外的德国杜伊斯堡。

2015年10月15日11时45分出发的这趟中欧班列，是第1000列往来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国际货运列车。它将在随后两周左右的时间里，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最后抵达目的地杜伊斯堡。

中欧班列的开行，被视为铁轨上的“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实施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背景下，这些丝路上的钢铁驼队，怎样展开跨越上万公里的旅程？又将怎样改变中欧经贸版图？一个多月来，新华社记者深入不同班列始发地和沿途口岸，找寻中欧班列开行背后的故事。

中欧班列：铁轨上的亚欧大通道

2015年9月的最后一天。新疆阿拉山口口岸。

2时43分，重庆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向杜伊斯堡；13时28分，成都中欧班列从这里驶向波兰罗兹。

此前一天，重庆出发的中欧班列载着灯具配件、服装等从这里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武汉、郑州的中欧回程班列载着汽车零部件、通信设备等从马拉舍维奇返回国内，先后抵达这里。

“这是中欧班列奔驰在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缩影。从开通中欧班列到现在，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的国际货运列车已有17种。”时任阿拉山口火车站站长萧蔚说。

萧蔚见证了中欧班列的最初开通。四年半前的 2011 年 3 月，自重庆发出的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境，驶向杜伊斯堡。从此，铁路开始成为海运、空运之外连接欧洲的第三条运输大道。

“一带一路”启动实施后，中欧班列开始“换挡提速”。成都至罗兹（蓉欧）、郑州至汉堡（郑欧）、武汉至波兰（汉新欧）、苏州至华沙（苏满欧）、义乌至马德里（义新欧）等更多中欧班列开行起来，一趟趟国际列车驶向欧洲。同时，一列列国际列车从欧洲不同城市驶向中国。数码通信器材、机械设备和汽车配件、鞋帽、家具、灯具、啤酒、葡萄酒等，都是这些国际列车的“座上宾”。

历史上，横跨亚欧大陆的古商道，因为中国盛产的丝绸长期占有主要的位置而被称为“丝绸之路”，驼队则是活跃在丝路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如今，列车飞驰的轰鸣声，替代了响彻千年的声声驼铃。

“2011—2012 年，中国和欧洲之间出现铁路运输，这种运输方式发展势头喜人，并开始转移一部分运输量。随后，开通了新线路、新的始发城市，增加了运输车次。”法国《回声报》工业版副主任德尼·凡西尔贝在题为《新丝绸之路》的文章中写道。

新丝路上，钢铁驼队的身影日益增多、变快。从第 1 列中欧班列开行到第 200 列，用时 3 年零 3 个月；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从第 200 列到第 800 列，用时仅一年零两个月；从第 800 列到第 1000 列，只用时两个月。

“‘丝绸之路’正如同丝绸一样，有时是一股一股的丝线，延伸开来；有时又像一张大网，涵盖广阔，时时出现绚烂的织锦。因此，不能死板地看待‘丝绸之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说。

就中欧班列而言，中欧之间目前有 3 条“钢铁丝路”：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入境的西部通道、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入境的中部通道和经满洲里口岸出入境的东部通道。

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中欧班列线路截至 2015 年共有 21 条。重庆、郑州、苏州等 11 个城市已开行中欧班列，并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向外延伸覆盖到全国主要经济区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中欧班列已可到达汉堡、华沙、马德里等 11 个欧洲城市。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铁轨上的丝绸之路，向着辽阔的远方延伸。

钢铁丝路：道路畅通促进经贸相通

这是全世界运输旅程最长的货运班列：一头连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一头连着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西班牙马德里。

2014年11月，载有82个集装箱小商品的义乌中欧班列，首次从义乌出发，历时21天、行程13052公里，最后抵达目的地马德里。

两个多月后，回程列车带着西班牙火腿、红酒、橄榄油等商品回到义乌。

义乌中欧班列运营方、天盟实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过去双方物流基本依靠海路和空运，现在铁路成为新的引擎。”

从2015年6月开始，义乌中欧班列实现每周发车一次的常态化运行，并新增华沙、柏林、杜伊斯堡、巴黎4个上下货站点，回程班列已开行3列。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来到西班牙商品进口馆——盟德进出口公司的摊位前，西班牙红酒、橄榄油、饼干等商品琳琅满目，“义乌中欧班列产品”已成为颇受欢迎的品牌。

对往常进出口运输以海运进行的盟德公司来说，海运一般要花上45天，义乌中欧班列只需21天。海运要先抵达宁波，再通过二次运输抵达义乌，而义乌中欧班列直抵义乌，只需转运到仓库。成本降低了，盟德公司的红酒和橄榄油标价也比以前低了。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一直是中国经济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主要通道和外贸重心。如今，中国的外贸格局随着“钢铁丝路”的出现而发生着改变。

早在20多年前的1990年9月，兰新铁路西段在阿拉山口与哈萨克斯坦土西铁路接轨，从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全长1.08万公里的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然而，使亚欧大陆桥繁忙起来，真正实现经贸相通、物流大发展，则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

“没有大通道，就谈不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路贯通后，还需要有物流。”时任阿

拉山口岸管委会副主任狄永江说。

如今，亚欧大陆桥上，有多个国家参与运输，运向也由单向西行变为东西双向运行，过境集装箱货物量节节攀升。

“‘阿拉’，突厥语意为‘花色’。阿拉山口市昔日茫茫戈壁，如今已多点开花，成为以进出口贸易、加工业、中转货物为主的口岸新城。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铁路货运也同样多点开花，已有 17 条国际班列经此出入。”狄永江说。

“中欧班列大量开行，为中欧之间进出口货物提供了全新的物流模式。”中铁集装箱公司副总经理钟成说，中欧班列只有海运时间的 1/3、航空价格的 1/5，同时班列化、客车化开行的组织方式，为客户提供了良好的物流体验。

内陆开放：从“腹地”变“前沿”

重庆中欧班列的开行，源于跨国公司笔记本电脑运送到欧洲的运输需求。作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全世界每生产 3 台笔记本电脑，重庆就占了 1 台。惠普、华硕、宏碁等全球巨头，都将大量订单放在重庆。

重庆中欧班列的开行，让更多企业看到了一个高效的全球化样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加快，由过去单一制造业转移逐步扩展到整个产业链的转移。”时任重庆市口岸办副主任王济光说，近年来，重庆一方面通过产业升级，让‘重庆制造’在国际市场展现竞争力；另一方面打通国际铁路大通道，走出内陆，成为开放前沿。

重庆市社科院副院长王胜分析认为，近年来重庆经济增速名列前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发展。2015 年上半年，重庆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增速分别为 19%和 12.2%，利润增速达到 30.4%和 43.5%。

“要诀在于这两大产业的集群优势，降低了配套成本；渝新欧班列则为零部件进口和产品出口提供了便捷通道，形成大通道促进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的良好格局。产业的快速发展，又反向促进了渝新欧班列的稳定运行。”王胜说。

同样得益于重庆中欧班列这一欧洲进口商品便捷的运送通道，2014 年以来，

重庆跨境电商快速发展，2015 年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金额达 2.05 亿元，在重庆注册的跨境电商企业超过 100 家。借助中欧班列，像重庆一样，成都、郑州、武汉等城市正在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内陆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物流成本高、效率低。成都不沿江、不靠海，货运过去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要把货物从成都拉到沿海港口，再从港口向全球分拨。蓉欧班列的开行，为成都建设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生产基地提供了物流平台支撑，打破了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依赖港口的桎梏。”成都市物流发展办公室主任陈仲维说。

连接南北：对外经济走廊建设新推手

中欧班列越开越多，铁水、铁空、铁公联运，开始成为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的重要推手。

2015 年 8 月 16 日，从厦门出发的中欧班列（“厦蓉欧”），载着显示器、芯片、高档服饰等商品，开始首次“丝路行”。这是厦门首个到达欧洲的班列，也是全国四大自贸试验区首个到达欧洲的班列。

厦门中欧班列打通厦门—成都—新疆—欧洲集装箱线路，使物流成本降低，厦门乃至福建的发展腹地向西大大延伸。“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得以扩大。

业内人士认为，厦门中欧班列使厦门成为连通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节点城市，将大陆、台湾与欧洲紧密相连，将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与欧洲紧密相连。例如，欧洲美食 15 天直达厦门，再一天海运，即可抵达中国台湾；中国台湾的产品通过海铁联运，也可直达欧洲。

郑州中欧班列运营方、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依托郑州的铁路、公路、航空交通枢纽便利条件，以“海—公—铁”国际多式联运模式，吸引部分日本、韩国的转口贸易，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

“公路、铁路、航空无缝对接；海港、陆港、丝路沿线信息对接，打开了多式联运的新局面。目前，郑州中欧班列输出的货物有来自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

全国 23 个省份，以及日本和韩国的转口货物；回程货物则覆盖了德、法、比利时等十多个国家。”陆港公司总经理赵文明说。

利用交通优势，开展多式联运，郑州中欧班列越开越密：从 2013 年 7 月首列开行，郑州中欧班列已从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一条线路、到经阿拉山口口岸和二连浩特口岸两条线路出境，从每月开行一班到每周去程 3 班、回程 2 班……

依托班列，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沿线国家的铁路或物流企业分别与陆港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开展物流和贸易合作。

横贯亚欧：是“金丝带”更是“金桥”

50 岁的甘肃省武威市农民孟泽智最近很忙。武威市 200 多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2015 年组建联合会，他当选会长。平日里“单打独斗”的这些西部农民决定抱团发展，将农副产品直销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甘肃省农产品营销管理办公室调研发现，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市场蔬菜需求量大，河西走廊出产的洋葱、土豆广受欢迎。

“我们也发现了这种商机，但单独靠一两个农业合作社很难打开市场。”孟泽智说，只有抱团才有竞争力，而且时机已经成熟——从当地出发的中欧班列，可将产品直接运到国际市场。

孟泽智说，2015 年春季，他们已在 10 多个乡镇种植对接俄罗斯市场的 30 万吨洋葱。目前，正在印制俄语版产品宣传册，30 多个农民将去俄罗斯等国推介。

当武威的洋葱即将销往俄罗斯市场时，搭乘中欧班列来到中国的德国啤酒、法国葡萄酒、西班牙橄榄油、荷兰牛肉，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一些大街上也多了搭乘中欧班列而来的奔驰和宝马轿车……

因为中欧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此前未曾耳闻的波兰语意为“无奇”的城市——罗兹。这个波兰的第三大城市，已成为多条中欧班列的中转站，来自中国的货品由此运往欧洲各地，欧洲的商品汇集于此运往中国。同时，一些商机应运而生。

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不只是贸易联系，也是东方和西方文明的桥梁。中欧班列也不只是一条贸易“金丝带”，更是一座增强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金桥”。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因为有了中欧班列的开行正在加快。

丝路之光：创造更加通畅的旅程

横跨亚欧大陆的万里征途，并非一路畅通。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火车站驶出后，下一站是 12 公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火车站。火车停靠稳当后，巨大的吊臂开始运行，将中欧班列上的集装箱由准轨列车搬运到宽轨列车上。

中哈两国铁路分别采用准轨和宽轨。列车行进到波兰后，进行另一次换轨。前往马德里的义乌中欧班列，还需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伊伦进行第三次换轨。

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后，沿途经过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是宽轨铁路，波兰、德国和中国一样是准轨，准轨和宽轨轨距分别为 1435 毫米和 1520 毫米。从二连浩特和满洲里口岸出境的中欧班列，因为蒙古国和俄罗斯均为宽轨，同样需要由准轨换为宽轨。

对于中欧班列的运营方来说，旅途中的换轨算不上烦心事，因为慢则两三个小时、快则半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真正让他们烦心的，是中欧班列“吃不饱”——货源不足，回程尤其明显。

货源不足，火车拉着没装满的集装箱跑，成本当然会上升。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海运相比总体运价较高、货源尤其是回程货源不足、国内尚未形成合力、沿途运输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种种问题，成为中欧班列“成长的烦恼”。

业内人士建议，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打造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与沿线各国政府部门、铁路、企业加强沟通，加快中欧班列协调机制的建设。

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以构建国际国内铁路大通道和铁路国际物流体系为目标，铁路系统加快推进铁路通道建设，提高铁路国际运输能力和效率，推动我国铁路整体走出去，充分发挥铁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作用、促进作

用和带动作用。

“中欧班列下一步发展，将建立健全全程定价机制。”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将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班列，优化全程运行图，压缩全程运行时间。加强与沿线国家铁路协商，压缩全程运输成本。推进与国外铁路的信息交换，与海关信息共享，拓展国际联运市场，加大回程货源组织力度。同时，推进跨境电商、国际邮包货物运输。

就在第 1000 列中欧班列驶出重庆团结村站的同一天，武汉中欧班列从武汉出发，驶往欧洲；第二天，义乌、武汉、郑州开行的中欧班列将分别从当地出发，驶往欧洲。钢铁驼队日益频密地行进在新的丝绸之路上。

中国更多列车驶向欧洲

2015年9月18日11时30分，一列载有43个集装箱的国际货运列车缓缓驶出二连浩特火车站。这列由郑州始发的国际列车，将经由蒙古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在约13天后抵达目的地德国汉堡。

这是郑欧班列2013年7月开行以来的第201列。从2015年9月14日起，郑欧班列出境列车由原来的每周2班增至3班。

中国驶向欧洲的列车快速增加。自2011年3月19日正式开行以来，中欧班列已经超过800列。其中，2014年开行308列，同比增长285%；2015年1—7月开行328列，超过2014年全年列数，同比增长221%。

“2014年途经二连浩特的郑欧班列一个月不足一班，现在一个月能达到八九班，出口货物也由少数几种产品，拓展到包括台灯、变压器、衬衫、棉服、电脑硬盘等各类商品。”二连浩特凯晟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总成说。

正是看到这趟班列的发展潜力，郑欧班列运营方、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正在加大投资力度。该公司公路部部长何安钢说，公司计划在二连浩特设置上下货点，更多周边客商可直接在二连浩特上货、提货，进一步促进班列的市场化。

班列开行前，刘总成拿着报关单、铁路装载清单、出口票据单等货物出境申请材料，在二连浩特“一站式”服务大厅办理相关手续。不到3小时，手续全部办理完毕。“每个部门对郑欧班列的服务保障都非常重视，办理效率高，收费也合理。”刘总成说。

为保证郑欧班列高效通关，二连浩特市政府多次与铁路、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边防检查等部门沟通、协调，促成了一系列通关便利化政策的出台和执行。

郑欧班列除了经由二连浩特前往欧洲之外，还开行途经新疆阿拉山口、终点同为汉堡的班列。截至 2015 年 9 月，中国已构建了 3 条中欧铁路物流通道，分别为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入境的西部通道，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入境的中部通道和经满洲里口岸出入境的东部通道。

在中国境内，已有重庆、成都、武汉、苏州等十多个城市开行中欧班列。以这些城市为中心，中欧班列向外延伸并覆盖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域。在境外，中欧班列可到达 7 个国家 11 个城市，包括德国杜伊斯堡、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西班牙马德里、荷兰鹿特丹等。

对二连浩特口岸来说，2014 年仅接发 8 列中欧班列，但 2015 年增幅明显，截至 9 月 11 日已接发 41 列。有关部门透露，从武汉等地始发的中欧班列也有望尽快取道二连浩特口岸所在的中部通道。

守望公路“搬运工”的未来

▾ 导言 谁“解”3000万全社会“搬运工”之痛

赵文君

▾ “十二五”发展甩挂运输节约物流成本近300亿元

▾ 2015：公路货运为每个中国人运货22吨

赵文君

▾ 公路货运业：如何重塑新生态

赵文君 齐中熙

▾ 车轮之上的“苦与痛”

赵文君 齐中熙

▾ 消除痛点才能打通堵点

齐中熙 赵文君

导言 谁“解”3000万全社会“搬运工”之痛

这是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群体，这是一个在车轮之上讨生活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就是3000多万名货车司机。他们是全社会的“搬运工”，而他们的生存状况却鲜有人关心。

合法的标准化车辆几乎没有市场，而超标、非法改装车辆却大行其道，造成行业“运价越超越低、市场越超越乱”的现象……

运价水平从2012年以后几乎维持不变，而成本每年上涨10%~20%，意味着运价实际上在下跌……

公路货运量在各种运输方式中位居榜首，支撑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但这一领域，多、小、散、乱、弱局面长期存在，货运信息不对称、运价体系不透明，严重制约了公路货运发展。

一辆奔跑的货车承担的是一家老小的生计，但在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眼里，就是一块“唐僧肉”。交警、路政、运管、高速公路管理、城管、环保、工商、卫生、动物检疫等约10个部门，都可以进行执法。

……

面对公路货运为每个中国人运货22吨的事实，新华社记者聚焦于“人”，走近货车司机这个大多数人陌生的人群：要知道这个人群之大令人咋舌，竟然多达3000多万；而且在他们身上，背负着的是约1亿人的生计。

2015年12月，记者赵文君、齐中熙深入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等地调研发现，恶性压价的市场竞争、雁过拔毛的重重关卡、层层剥皮的行业“潜规则”等，都是扎在货车司机心中深深的苦与痛。

这个行业，也难逃互联网大潮的冲击——货运行业出现了平台模式、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车货匹配模式等新模式、新业态，不仅有聚集效应，还有助于将多层分包的运输业务透明化。

为了了解货车司机，赵文君还跟车体验了“移动的家”……

报道呼吁，混乱的执法管理、无序的市场竞争是货运行业的痼疾，更是货车司机难以承受之“痛”。只有通过改革创新，规范货运行业，消除货运司机的“痛点”，才能打通行业运行的“堵点”。

要改善货车司机的生存环境，优化运输行业的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改革挖掉“病根”，通过创新营造规范的市场秩序。

相关部门要拿起“手术刀”，从体制机制切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依据、明确处罚标准、整合执法主体，建立起权责清晰、监管有力、执行高效的综合执法体系。还应在公路货运行业内部打造公平透明、风清气正的运营秩序。

“十二五”发展甩挂运输节约物流成本近 300 亿元

2015 年 12 月 28 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十二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在全国组织实施 209 个甩挂运输试点项目，累计拉动社会投资约 278.6 亿元，为全社会节约燃油约 21 万吨，节约物流成本近 300 亿元。

甩挂运输包含牵引车和挂车。牵引车就是车头，挂车相当于货箱。牵引车将挂车甩留在目的地后，再拖带其他装满货物的挂车驶离。采用甩挂运输方式的货物，可以直接由城市配送车装到干线运输挂车上，不用进入仓库后再倒装到货车上，减少了一次装卸环节，车辆运行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2015 年，全国已有山东、江苏、浙江等 9 个省份开展了省级甩挂运输试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甩挂运输试点企业较传统运输模式平均单位运输成本下降幅度达 10%~20%。货运车辆日均行驶里程平均达到 380 公里，车辆平均里程利用率超过 80%，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单车年均完成货物周转量达到 351 万吨公里，是行业平均水平的 2.5 倍。

2015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降低 6 大类企业成本，其中包括物流成本。时任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巡视员徐亚华说，发展甩挂运输，可以大幅度提升车辆使用效率，单位运输成本和能耗下降，推动全社会物流成本降低，推动行业节能减排发展。

徐亚华表示，“十三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以甩挂运输为引导，带动多式联运、城市配送、车型标准化、运输组织创新等全面发展。到 2020 年，形成服务能力强、运输效率高、节能效果好、安全事故低的公路甩挂运输体系。

2015：公路货运为每个中国人运货 22 吨

2015 年前 3 季度，全国公路完成货运量 257.3 亿吨，增长 6%，其中一、二、三季度分别增长 6.4%、6%和 5.7%。

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公路货运业 1453 万辆货车共完成了全社会 76%的货运量和 33%的货物周转量，全行业 745 万家运输业户，全年完成总产值约 3 万亿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贺登才说，统计显示，公路货运业平均每天在途货运量 8400 余万吨，平均每吨货物运输 180 公里，服务 4.3 亿个家庭，平均每年为每人运输和接收 22 吨货物。

时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表示，公路货运业具有运输总量大、吸纳就业多、惠及民生近、关联影响强等特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服务性支撑作用。

公路货运业：如何重塑新生态

公路货运量在我国各种运输方式中位居榜首，在综合运输体系中超过 75%，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庞大的数据背后，是 3000 多万名货车司机夜以继日的辛劳。

是什么造成了货车司机的苦与累？破解顽疾的药方在哪里？2015 年年底，新华社记者深入北京、江苏、山东等多地货运市场调研发现，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促进货运业向集约化、互联网化转型升级，正在重塑货运市场新生态，引领货车司机走向高级蓝领。

3000 多万货车司机背负着约 1 亿人的生计

这是我国最早开放、高度开放、门槛较低的行业。20 世纪 80 年代交通部提出“有路大家行车”，只要会开车、有车开，谁都可以进入市场。

“市场准入门槛低，所需技能简单，很多货车司机找不到别的方式就业，只能开货车，致使恶性竞争激烈。这是货车司机生存状况艰难的根源之一。”时任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巡视员徐亚华说，货运市场自从 1986 年放开以来，近 30 年来的高度市场化，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 3000 名货车司机的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司机年龄在 26~35 岁、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村户籍，其中不少司机为失地农民，有的拿土地补偿款买货车跑运输。

“货运业是一个草根行业，即使是“航空母舰级”的大品牌物流公司，大多也是分包给众多小微企业运作，而真正承担运输作业的，是 3000 多万名货车司机。”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合肥维天运通公司 CEO 冯雷说。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运业总体货源趋紧、成本不断上扬，而运价却持续低迷。徐亚华认为，货运业处于整个社会产业链的末端，处于分散状态的货车司机，面对货主，没有议价话语权，这是造成货车司机之痛的又一根源。

“运价水平从 2012 年以后几乎维持不变，而成本每年上涨 10%~20%，这意味着运价实际上在下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志成说。

国内一家卡车门户网站、卡车之家的 CEO 邵震给出了几个运价实例：从吉林梅河口到上海，约 2000 公里路程，运输大米每吨 300 元，总运费 11400 元。回程从上海到长春，运输钢材每吨 400 元，总运费 15200 元，总计来回 4000 公里左右，运价折合每吨公里 0.175 元。“欧洲的货运价格每吨公里为 0.2~0.3 元人民币，但其车货总重最大只有 40 吨，相比国内 55 吨最大总重要轻不少，成本也更低。”邵震说。

“5 年前一辆车每个月纯收入最高可达两三万元，现在不可能了。”山东威海的“车老板”孙石磊说，以三口之家为单位计算，3000 多万名货车司机背负的是约 1 亿人口的生计。

周志成告诉记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调研中发现，97%的司机表示，养家糊口比起 5 年前更困难。

5 年内建成货车车型标准化体系

30 年的公路货运市场问题积重难返，如何改变行业格局、破茧重生？

“运输组织效率需要提高，行业规范运营环境需要完善，行业安全发展水平需要提升。”徐亚华说。

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是促进物流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交通运输部提出，以“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改善物流服务”为目标，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公路货运市场物流组织分散低效，货源、运力、站场等物流资源缺

乏集约配置和有效整合，整体组织效率较低。效率低在哪儿？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截至 2014 年年底，全国共有载货汽车 1453.36 万辆。货运市场 90% 为个体户司机，10% 为企业。

“公路货运市场长期以来呈现‘多、小、散、弱’的局面，因为弱而小、小而多、多而散，深层次问题是弱。”周志成说。

“10 多年来，货运业的经营模式没改变，服务效能低。”物流货运互联网平台“卡行天下”总经理钱珏认为，在传统公路货运产业链中存在诸多问题。物流企业与货车司机之间的合作方法，选择、议价、货物交付、时效管理、结算等基本没有改变。原始的交易方式、不完备的运输协议、没有信用保障的交易与高价值的货物标的、远距离的货物运输形成了巨大反差。

“车辆的保养、轮胎的更换、加油的多少，都是可以钻的漏洞。车辆大多数都在个体司机手上，难以监管。”南京兆鑫物流负责人朱永忠说，由于一直缺乏比较有效的诚信认证操作模式，致使行业内一直存在着假证骗货、中介骗取押金、虚报发货信息等乱象。信用的缺失也直接降低了交易效率，增加了公路物流成本。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合法的标准化车辆几乎没有市场，而超标、非法改装车辆却大行其道，造成行业“运价越超越低、市场越超越乱”的现象，难以可持续发展。

“公路货运业吸纳就业多，点多面广，从整车大宗物流运输到绿色农产品运输，各种车型非常复杂。”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货运与物流管理处处长战榆林说，交通运输部已经开展车型标准化建设，争取在 5 年内建成货车车型标准化体系。

战榆林表示，针对货运车辆普遍违法违规使用的现象，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谋划，各部门一盘棋，采取坚决措施集中治理；严格车辆生产改装、检验检测、注册登记、营运准入、路面管理等全链条的管理；通过货车车型标准化，逐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效遏制非法超载超限等运输行为，净化市场发展环境。

“通过优胜劣汰，让不合规的企业或个体司机退出，让留下来的司机能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环境。”战榆林说，政府部门的规章体现在安全和公平竞争两个方面，要以完善的法律法规推进货运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

货车司机高级蓝领化是未来行业趋势

“从 2009 年起，国家已经 3 次出台专门针对物流业发展的文件，均以物流业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为导向。”徐亚华表示，改变道路货运市场长期粗放式的发展形态，加快推进全行业提质增效升级，是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迫切要求。

在互联网冲击下，货运行业出现了众多新模式、新业态——有平台模式，本身不参与运输交易，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还有车货匹配模式，以一款 App 将货主和车辆直接连接起来。这些新模式不仅有聚集效应，还有助于将多层分包的运输业务透明化。

“集约化、互联网化或将成为影响整个货运行业变革的重要因素，可以改变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当然也包括货车司机的命运。”徐亚华说。

冯雷说，货运行业期待一个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进行公平的市场评估。同时，要打破关系订单，做到信息透明开放、分工合作，促使产业升级。

在浙江传化物流信息港，车与货的匹配，每单只需要 0.5 秒。通过互联网的线上线下载联动，构建起一张货运诚信体系网络。每个发货方、每辆货车、每个货运司机都经过实名认证、资质审核；每张承运订单的货物数量、运费金额、行驶路线、准点到达率、信誉度，乃至货运司机的住宿、饮食、购物习惯等消费痕迹都会产生数据标签，通过对这些“标签”的积累和分析，无论是货主、物流公司、还是货运司机，其发货规律、运输能力、诚信度等信息一目了然。

我国最大的货运民营企业德邦物流拥有 5000 辆货车，而美国世能达公司有 6 万辆挂车、1 万辆牵引车、1 万名职业司机，每天调度几万家小企业进行物流运输。这种货车巨头企业借助规模和资源的高效，吸引了相对较多的货源，使得其平台上的货车司机都资源共享。

“一辆大货车可能有十几个变速箱，如何熟练操作将油耗降到最低，货车司机这个行业面临技术淘汰的压力。”邵震说，尽管个体货车司机数量多，但大型物流

企业需要的熟练司机还有 80% 的缺口，具备高技能的熟练司机很难找，因而货车司机高级蓝领化是未来的行业趋势。

业内人士表示，货主满意、司机高效，是货运市场健康的标志。只有实现货运行业的生态重塑，才能让货车司机更体面、更有尊严地生活。

车轮之上的“苦与痛”

一杯牛奶，一个苹果，一台电脑……每年运送 330 亿吨货物到你我的身边，占全社会货运量的 3/4 以上……

这是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群体，这是一个在车轮之上讨生活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就是 3000 多万名货车司机。他们是全社会的“搬运工”，而他们的生存状况却鲜有人关心。

2015 年年底，新华社记者深入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等地调研发现，恶性压价的市场竞争、雁过拔毛的重重关卡、层层剥皮的行业“潜规则”等，都是扎在货车司机心中深深的苦与痛。

痛点一：竞相压价，市场混乱

江苏南京的大货车司机凌杰 40 多岁，和妻子搭档开车快 20 年了。两人轮换着开，人休车不休，尽管也是“蛮拼的”，但他俩感觉 2015 年尤其货难找、钱难挣。

为了找货源，凌杰夫妻俩已经在北京通州区马驹桥的一家物流园等了两天，为省钱吃住就在车上。凌杰带记者参观了他们“移动的家”：驾驶室后排有上下铺，空间比火车硬卧还要小些，车里被褥、酒精炉、锅碗瓢盆俱全。一年之中，夫妻俩差不多有 300 天要在这个“家”里生活。

凌杰四处转悠找货源，仍一无所获。“现在货运市场竞相压价，把市场搞得越来越乱。有一次装上货都跑出 60 多公里了，货站打电话不让拉了，原来另一辆车要价比我便宜了 100 块钱。”他无奈地说。

南京中储智运业务经理吴九全说，租个门脸、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电

话，就是一个“物流公司”，业内人称之为“配货黄牛”。“仅从南京到广州一条线，就有近 20 家公司在跑。一旦有人愿意低价接活，那些物流公司就会借机把价格压得更低。”

山东威海的孙石磊干个体司机多年，他告诉记者，现在工厂的货源基本被物流公司垄断，个体司机拿不到货源。很多所谓的“第三方物流”甚至连道路从业资质都没有，就是通过把控货源，再层层转包到个体司机手里，运费直逼成本极限。

孙石磊明显感到了恶性竞争的压力。“从威海到广州，单程成本就要 1 万元，正规公司一趟往返少于 2 万元不敢接，但是‘配货黄牛’出价只有 1.5 万元，怎么竞争得过？”

一面是市场的混乱，另一面受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货运价格持续低迷，是货车司机的最大“痛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公路物流运价指数显示，即使在“双 11”的拉动下，2015 年 11 月的指数仍比 10 月回落 2.6%，比 2015 年年初回落 2.7%。

“公路货运量在各种运输方式中位居榜首，支撑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但这一领域，多、小、散、乱、弱的局面长期存在，货运信息不对称、运价体系不透明，严重制约了公路货运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说。

痛点二：多头执法，雁过拔毛

一辆奔跑的货车承担的是一家老小的生计，但在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眼里，就是一块“唐僧肉”。究竟有多少部门可以分到这块“唐僧肉”？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不仅有交警、路政、运管，还有高速公路管理、城管、环保、工商、卫生、动物检疫等约 10 个部门执法。

货车司机被罚款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有的货车在车身上焊根铁棍，路政说这算更改车型，一罚就是三千”“车身不干净甚至是驾驶室不明亮，城管说影响市容市貌，一罚就是好几千”……

不同地方和单位对货车司机的违法违规处罚标准不统一，让司机无所适从。同样是超载，交警叫“超载”，最低罚 200 元；路政部门叫“超限”，最高罚 3 万元；

城管叫“超重”，最高罚2万元；运管叫“超越许可”，最高罚款1万元。这些部门的罚款互不相认，只能叠加。

孙石磊告诉记者，两个月前，他公司一名司机开着一辆载重34吨的货车拉了32吨萝卜，因为遮雨布把车辆反光条遮挡了一部分，在湖北某收费站被拦下，被罚款200元。

“如果去交罚款，司机得下高速，绕道当地的收费窗口交。但是拉着一大车萝卜的大货车又进不了城，司机也不可能放下萝卜去交费，或是再专程跑一趟交罚款。”孙石磊说。

由于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和完善的执法监督，司机宁愿采取“私了”“不开票”等灰色方式逃避执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车队老板说，他的车队每年为路上的罚款支出十几万元。在不违章不超载、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平均每辆货车每年罚款“预算”约6000元。

痛点三：“潜规则”里层层扒皮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然而，运费拖欠、油卡抵运费等业内潜规则又“扒”了司机们一层皮。

在北京新发地物流集散地，山东威海的司机刘光禄拉来了一车苹果。货主催得急，老刘路上不敢休息。900公里的路程，他一口气跑了10个小时，中间只吃了碗方便面。货是运到了，可货主前面的一车货还没卖完，就是不给老刘结账。

“货不卖完货主就不结账，一拖就得好几天。”刘光禄回想起第一次拉的“绿色通道”货物：那是一车蔬菜，可以免收过路费。700公里的路程，运费3000多元，扣去油费1000多元，估摸着收益还不错。可是等上货、卸货，再到货主最后结账就耽搁了3天，算了算多出的开销还是没挣钱。

“哪个货车司机手里没有几万元的油卡？”一名货车司机说。

物流公司用油卡给司机冲抵运费，已经是货运行业见怪不怪的潜规则。司机普遍反映，大家都在用油卡，也在挣油卡。平均下来，一辆货车每年至少要收四五万元的油卡。一趟活儿下来，有的司机收的全是油卡，有的甚至连过路费和保

险都没钱交。

“我兜里现在就有9万元的油卡。”孙石磊说，从威海到广州一趟往返运费，物流公司至少要抵扣1万元面值的油卡，而往返广州一趟的油费只需要9000元。用不掉的只能贱卖，他通过微信朋友圈对外卖，面值1万元的中石化油卡，一般只能卖9000元。

物流公司为什么要用油卡抵运费？吴九全开过10多年货车，自己也经营过物流公司。他说，油卡可以抵税，有些物流公司就借此来维持生存。

有的司机贪图便宜买了这种油卡，却不知这样的油卡必须当月用完，否则就会被物流公司“冻结”。吴九全告诉记者，如果油卡当月没有用完，按规定就不能抵税了。因此，有些物流公司一到月底就会把油卡挂失，司机再没办法使用。这种司机上当受骗的情况在各地比比皆是。

痛点四：“变形金刚”拿命开

“珍爱生命，远离大货”——这是民间对大货车安全隐患最直观的看法。

在国道、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可以见到超长超高的大货车行驶。车身超长，司机从后视镜根本看不见车厢后部，基本是凭着感觉开，危险系数极高。这类超标车辆，社会称之为“大祸车”，货车司机称之为“变形金刚”。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普通的货车车型有6.8米、9.6米、13米、15米不等。车身加车头，总长如果超过18米就算超限了。

按国家相关规定，17.5米长的货车早在2007年起就不再审批。但一名货车司机告诉记者，市场上超过18米的“变形金刚”还是有的。“虽然规定不给上牌，旧车年审也比较难。但新车都能买到，总有地方可以上牌、年审。”

改装过的“变形金刚”，最长能到30多米，主要用来运输大家电、汽车等。“谁都知道开这种车很危险，真是拿命在干。但是为了挣钱，还是有很多司机开。”一名司机说。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2013年我国货运车辆仅为全社会汽车保有总量的10%，

守望：与新华社记者共同“感知中国”

而货运车辆万车肇事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为全社会平均水平的 2.8 倍、4.6 倍。事故频发与车辆标准化程度低、技术落后直接相关，货车非法改装现象严重、非法超载超限等问题突出。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 2015 年货源不足的情况下，货主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运输成本，想尽办法多装多运，“你不超载有人超载，你不运有别人运”，结果就是“变形金刚”越变越庞大。

消除痛点才能打通堵点

混乱的执法管理、无序的市场竞争，是货运行业的痼疾，更是货车司机难以承受之“痛”。要改善货车司机的生存环境，优化运输行业的发展格局，必须通过改革挖掉“病根”，通过创新营造规范的市场秩序。

货运行业改革需要相关部门拿起手术刀，从体制机制切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依据、明确处罚标准、整合执法主体，建立起权责清晰、监管有力、执行高效的综合执法体系。

除了消除体制机制弊端，还应在公路货运行业内部打造公平透明、风清气正的运营秩序。目前，货运行业的特点是“多、小、散、乱、弱”，信息不对称，运价不透明，市场恶性竞争严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要整顿货运市场，业内需建立货运公司及货车司机“黑名单”制度，把欺行霸市、不正当竞争的“害群之马”驱逐，让不合规的企业或个体司机退出。

公路货运虽然是个传统行业，但必须主动创新，适应时代变化。目前，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之间的合作方式、管理方式基本停留在 10 年前，早已不能适应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货主、物流企业、货车司机相互不信任，行业缺乏监管、漏洞百出。因此，构建行业“大数据”、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同时应借助互联网，把整个货运链条纳入监管，做到公开透明。

为保障行业的良性运转，行业主管部门也需大力简政放权。一方面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物流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做好事中和事后监管，把货运行业管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只有通过改革创新规范货运行业，消除货运司机的“痛点”，才能打通行业运行的“堵点”。

后记 众声喧哗中，找出症结所在

李 斌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若干年前，美国著名新闻人约瑟夫·普利策这样说。

事实上，在舆论纷杂、幻像频出的时代，事物的关联性、系统性和复杂度，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对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是从一个方面有所了解，而对这一系列重大复杂问题，必须认真、全面、客观、多维地加以调查、研究，以此为基础得出总体结论，指出问题痛点，提出对策建议，也就是需要眺望，更需要守望，需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守望的前提是守护——深入调查，全面、客观、立体地展现事实，守护真相，守护未来。

例如，针对“外资撤离潮”的传闻，我们的记者深入珠三角、长三角和西南地区，发现了中国仍然是机遇之地、在华外资正在构建“新版图”的真相。

例如，针对妖魔化导游的现状，我们的同事调研发现，伴随近年来旅游市场竞争加剧，导游生存状态急剧恶化，“三无问题”（无合同、无工资、无社保）、“两黑一差”（黑导购、黑购物点、服务差）时时困扰着 80 万导游群体，他们的酸甜苦辣迫切需要社会倾听、关注。

例如，面对中国桥梁屡创“第一”，我们的同事奔赴北京、武汉、广东、四川、贵州、湖南等诸多地方实地查看，大量的采访和访谈，使人们对中国桥梁的认识更

加全面客观：虽然在跨径、塔高等指标上摘取诸多“第一”，但在桥梁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成套施工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当然，面对未来，只要不盲目自满，在国际化程度上继续努力，中国桥梁有机会从大国逐步走向强国。

.....

“未来”，是一个充满想象，也充满不确定性的词。人人都关心自己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更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人们所关心的。

憧憬未来，不如创造未来。对于传播人来说，无论是眺望，还是守望，就是要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和大力传播，守护自己的未来，也是守护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

新华社老社长、至今在新闻界影响犹存的穆青说要：“调查研究是记者的生命线”。我们常说，调查研究是新华社记者的基本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谈不上对当下的准确把握，更遑论对未来和趋势的驾驭？

无线电波、卫星电视、移动互联网……一次次技术革命，首先在传媒界产生冲击乃至颠覆，站在 21 世纪的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无论什么样的技术手段、传播工具，真正能穿越的，都是通过手段和工具所要呈现的内容、真相。而获取这些内容和真相，前提就是调查研究，在众声喧哗中，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厘清前进的方向。

正如《如何成为顶尖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指出的那样：“你仍然要搜集事实，那些基本的事实，你仍然要与每个人交谈。你仍然要努力发掘所有的东西”“调查类新闻包含以下 3 个基本要素：提出可能引起不快的问题的胆量；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线索的能力；坚韧不拔的毅力。”

很多时候，我们的报道也聚焦重大问题或热点焦点问题，但是更多地满足于浅尝辄止，或者采访不够、深入不够。而在选题上，我们要更多聚焦于既是中央领导关心、更是人民群众揪心，同时长期拖而不决的“痛点”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不失语、不缺位，方能体现国家通讯社的担当和使命，才有可能产生强烈共鸣，推动问题向正确方向解决。当然，这样的调查报道必须建

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综合各方意见，客观作出判断，才能不人云亦云，才能有思想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来自“提出可能引起不快的问题的胆量”，这种胆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职责和使命——作为 80 多年前我们党创办和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新华社记者敢于直面问题，善于直面问题，正是在全面客观的调查基础上拨云见雾，展现客观事实。

思想的力量，来自“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线索的能力”。事情往往错综复杂，而如何从中找到真正具有价值的线索、提出有价值的建议，是对记者能力的考验：在线索找到后顺藤摸瓜、深度挖掘，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1939 年，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题词“多想”，这两个字如今在一些新华人的办公室里还能见到，就是提示人们遇事要多想想，要深思熟虑。

思想的力量，来自“坚韧不拔的毅力”。问题往往暴露的是“冰山”一角，这就需要长期不懈的跟踪、持之以恒的追问，就像我们前两年那次“解码青岛制造”调研——前后历时整整 3 个月，其中在北京的前期采访和准备进行了半个月，后来三赴青岛，尤其是第二次去青岛，半个月时间里展开了地毯式采访，召开 20 多次座谈会，采访 35 家企业，有的企业一去就是三四次；几乎每天晚上到 10 点或 11 点，大家都要开会讨论，深化认识；主打稿数易其稿，几昼夜连续苦熬……

新闻是有品格、有力量的！这品格，这力量，来自于求真务实的作风、忠诚坚定的气质、旗帜鲜明的立场、勇于担当的精神、一心为民的情怀。

穆青说，勿忘人民。只有做到这一点，从这个初心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在纷繁复杂、乱花迷眼中守护真相，迎接一个光明的未来……

最后，要感谢新华社副社长张宿堂，感谢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秦杰主任，感谢编委会成员，感谢参与创作的所有同事，感谢每一个对此书出版给予帮助的人，尤其是出版社和编辑。郑重说声：谢谢！